



公司

The Corporation

对利润与权力的病态追求

[加拿大] 乔尔·巴肯 著 朱近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Corporation

一档电视节目吹捧通用制造的卡车在二战期间支持盟军修路架桥的贡献，但是它却没有提及，这个公司同样也为敌军制造战车；而IBM为纳粹工作的动机，“跟纳粹主义毫无关系……它只与利润有关。”这与公司非道德的本性是一致的……

在乔尔·巴肯看来，股份公司是吞噬文明的恶魔，贪婪、剥削成性、不可遏止。我们都是潜在的受害者，因此我们必须弄清股份公司是如何使其危害变得无法控制的。

阿兰·德肖维茨

——哈佛法学院，费里克斯·弗兰克福特法学教授

这是一部难得的佳作，洞察、激越、知识面广、分析透彻。巴肯揭示了公司这个被法力无边的现代国家造就的邪恶工具的主要特征。国家把人的权利赋予了公司，但无论从法律上说还是从本性上说，它都是病态的，现在它的权利甚至已经凌驾于有血有肉的人之上。它一步步碾碎了民主、自由、权利和自然人的本能，然而人们想要体面地生活、甚至存活下去都必须仰仗它。我们应该细读这项透彻的研究，并进行深入的思考。正如作者所描绘的那样，这本书将激发人们力所能及的建设性行动。

乔姆斯基

——著名语言学教授、《9·11》作者

上架建议：大众财经

ISBN 978-7-208-07586-3



9 787208 075863 >

定价 25.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文景网：www.wenjingbook.com



公司

The Corporation

对利润与权力的病态追求

[加拿大] 乔尔·巴肯 著 朱近野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司：对利润与权力的病态追求 / (加) 巴肯 (Bakan, J.) 著；朱近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书名原文：The Corporation: The Pathological Pursuit of Profit and Power

ISBN 978-7-208-07586-3

I. 公… II. ①巴…②朱… III. 企业管理—研究 IV. F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5218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管鹏鹏
装帧设计 海云书装



世纪文景

公司：对利润与权力的病态追求

[加拿大] 乔尔·巴肯 著

朱近野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154,000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586-3/F·1711

定价 25.00 元

献给 Marlee

目录 | Contents

序言	1
1. 股份公司的帝国之路	5
2. 新的形象,旧的公司	29
3. 外部化的机器	61
4. 民主有限	89
5. 公司无限	115
6. 估算未来	145
注释	175
部分参考文献	205

序 言

当一串一串的公司 CEO 们戴着手铐、垂头丧气地走过我们的电视屏幕时，博学多闻的学者、政治家和商业领袖们迅速对此作出回应，信誓旦旦地保证，与制度无关，那些贪婪、腐化、堕落的人们才是造成华尔街惨状的罪魁祸首。最近，ABC 电台“本周快报”（*This Week*）栏目的山姆·唐纳森（Sam Donaldson）采访纽约股票交易所前头目理查德·格拉索（Richard Grasso）：“我们是否只需要谈论这些坏苹果？是不是这个制度本身哪里也出了问题？”格拉索这样解释：“山姆，我们的确有很大的失误，我们也竭尽全力来铲除那些坏分子和不良行为。但是，不管问题的数量是 1 还是 15，必须要认识到，基数都是超过一万家的上市贸易公司。当然，一个世界电信（WorldCom）或者一个安然（Enron）就已经够多了。”尽管有这样的保证，但是今天的公民——包括很多商业领袖在内——都已经明白，股份公司本身存在的问题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华尔街悲剧所能表现出来的更加深刻。对体制本身问题的关注正是本书的焦点所在。

关键在于，股份公司本身是一种制度结构——一种独特的结构，一套为其内部的行动者提供行动指导的规则。它同时也表现为一套法律制度，股份公司内的每一个人的存在意义和能力都有赖于法律的安排。股份公司的法定目标就是追求公司的自身利益，不带感情，没有

例外，绝不考虑对他人可能造成的损害。结果就是，我认为，股份公司是一种病态的制度，它拥有强大的力量，对公众和社会构成威胁。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我将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进行详细分析。股份公司如何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巨无霸（第一章）？股份公司病态特征的本质是什么，这暗示着什么（第二章和第三章）？公司对社会的权力表现在哪里（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减少股份公司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危害（第六章）？以上就是本书的核心内容。通过揭示对所有股份公司来说都存在的制度性规则，以及股份公司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我希望揭示出，在人们试图理解和从事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事务时，还存在着至关重要但长期以来未被充分认识的一环。

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全球管理思想的泰斗，或许也是第一个将股份公司当做制度来分析的人。^{*}德鲁克在他于1946年出版的惊世骇俗之作《公司的概念》中，认为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所有的股份公司都具有同样的制度秩序和目标。然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股份公司运作的日常细节往往会模糊我们对于整体运作机制的观察与理解。和辉瑞制药（Pfizer）的CEO 汉克·麦金内尔（Hank McKinnell）一样，我们“很难认识到股份公司是一种制度”。相反，我们主要还是在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微观区别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股份公司——跨国公司与本地公司、高科技公司与重工业公司、著名公司与虾米公司、好公司与坏公司，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所有的股份公司，至少所有的上市交易公司，都具有同样的制度结构，正因如此，讨论抽象的公司制度而非具体的公司个案才成为可能。当被问到“什

^{*} 见彼得·德鲁克的《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1946），简体中文版由慕风丽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3月。——译注

么是股份公司?”时，哈佛商学院的荣休学者乔·巴达拉科（Joe Badaracco）说：“这真是很好笑，我教了一辈子商学院，好像从来没有被问过如此尖锐的问题：我认为股份公司到底是什么。”^[1]

本书旨在探讨作为一种制度的股份公司到底是什么。当然，制度必然包括人，本书中的许多内容都基于对人的原始访谈材料，其中包括公司世界的玩家们，深入分析公司制度的专家权威，以及关注公司制度的危险和问题的解决之道的批评家。在风格和叙述语气方面，我尽量避免不恰当地使用专业与技术术语。我的目标是让这本书能够同时给门外汉和专业人士阅读，当然它仍然建立在翔实的研究，以及我作为一名法律学者的学识和眼界的基础之上。本书中，我使用“股份公司”来描述大型盎格鲁-美利坚的上市交易商业公司，以区别于小型的非股份制商业模式，以及其他各种非赢利性、私有的商业模式。本书之所以集中关注盎格鲁-美利坚模式，是因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股份公司都在美国，而经济全球化已经将这些企业的影响力扩展至国境之外。盎格鲁-美利坚模式的元素正在不断塑造它在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特别是在欧洲和日本。^[2]因此，本书所作出的分析和论断对于其他国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股份公司的帝国之路

短短 150 年间，股份公司就从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一跃成为当今世界最具支配力的经济组织形式。今天，股份公司统治着我们的生活。它们决定我们吃什么，看什么，穿什么，在哪工作，做什么。我们被股份公司的文化、符号、意识形态所环绕，无处可逃。它们就像当年的教会或者君主一样，摆出一副一贯正确的、全能上帝的姿态，用辉煌的建筑和精致的陈设来制造自己的光辉形象。股份公司渐渐开始获得对本负有监管职责的政府发号施令的权力，并且接管了原本深深植根于公共领域之中的社会。股份公司惊人的崛起和当前的绝对统治地位是现代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特别是它那不祥的开端。

远在安然丑闻曝光之前，股份公司还只是经济组织的一个非常新的变体时，它就已经被卷入各种腐败和弄虚作假的丑闻当中。在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股票经纪人，也就是俗称的掮客，逡巡在后来变得声名狼藉的伦敦交易所咖啡馆，穿梭于伦巴底街（Lombard Street）、康希尔区（Cornhill）和伯青街（Birchin Lane）之间错综复杂的小道，等着幼稚轻信的投资人出现，好卖掉他们手上皮包公司的股票。这种皮

包公司总是昙花一现，做点投机买卖，然后马上倒闭。在1690年到1695年之间从事交易的93家公司中，到了1698年，就只剩下20家。1696年，英国贸易委员会（the commissioners of trade for England）的报告认为，股份公司已经“完全堕落”，因为他们将公司的股票卖给“对公司一无所知的人们，这些人被编造出来并故意散播的股票声誉所吸引，所关心的只是股票的市值是否持续增长”^[1]。尽管贸易委员会对股份公司的恶行感到恐慌，但他们可能并不觉得惊讶，仿佛一切都是意料之中。

从股份公司在16世纪诞生的那一天起，生意人和政客就对这种组织形式抱有怀疑态度。当时流行的公司组织形式是合伙制，采取这种组织形式的企业牵涉的人员相对比较少，企业依靠个人之间的忠诚和互相信任来维持，成员以自己的全部财产为企业承担无限责任。与此不同，股份公司将所有权与管理分离开来，一群人充当董事和经理人，负责公司的运作，另一群人则充当股东，他们投入资本，对公司享有所有权。这种独特的设计被广泛认为腐败和商业丑闻大开了方便之门。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一书中警告说，因为管理者不可能对“其他人的财产”付出十二分的关心，“管理疏忽和挥霍浪费”毫无疑问会成为股份公司运作的必然后果。事实上，到1776年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股份公司在英国已经被禁止长达50年之久。1720年，英国议会受够了股份公司的胡闹在交易所造成的间歇性动荡，宣布股份公司为非法（只有极少数例外情形）。正是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倒闭丑闻促使这项法案最终获得通过。

1710年，为了与南美的西班牙殖民者合作进行垄断贸易（包括贩奴贸易），南海公司成立。它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是一个骗局。它的管理层统统来自政界的显赫圈子，对南美洲一无所知，只有非常疏远的

关系（他们中的确有一个人的表兄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且他们本来就应该清楚，西班牙国王不可能把他的南美殖民地贸易权授给外国人。其中一位董事曾被迫承认，“除非西班牙人昏了头……放弃自己的生意，扔掉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惟一有价值的地盘。总而言之，一心要跟自己过不去，”他们才可能放弃在自己的殖民地上拥有的贸易垄断权。然而，南海公司的管理层仍然向投资者许诺说会有“丰厚的回报”，堆积如山的金银唾手可得，就等着英国出口日用品来交换，比如柴郡奶酪、封蜡和盐渍品。^[2]

投资者囤积公司的股票，后者的股价在一年之内戏剧性地翻了六番。然而一旦持股人清醒过来，意识到这个公司其实毫无价值，恐慌之下迅速抛售，股价马上急剧下跌。1720年，欧洲大瘟疫的爆发使得公众的焦虑被激发起来，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他们“被一种迷信的恐惧所控制，认为瘟疫是上帝对人们的拜金行为的惩罚”^[3]。在这种背景下，南海公司迅速倒闭。大笔财富化为乌有，人们的生计毁于一旦，公司董事之一约翰·布兰特（John Blunt）被一名愤怒的持股人枪杀身亡。暴民包围了威斯敏斯特宫，国王不得不马上从乡间回到伦敦处理随之而来的危机^[4]。因为存在“恶意欺诈和违背诚信原则”^[5]的行为，南海公司的董事全部受到议会的审判，被处罚罚金，部分人遭到监禁。甚至有一名议员要求将他们塞进装满蛇和硬币的布袋，一起扔进河里淹死，当然他们还是免于此类酷刑。^[6]至于股份公司，1720年议会通过“泡沫法案”，该法案宣布，凡是创立“被认为是股份制”的公司，并且在无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发行“可转让股票”的行为，皆为非法。

今天，与当年的南海公司泡沫事件类似、甚至同样恶劣的公司丑闻正在重现，但政府通过类似的禁令却已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即便是

非常温和的改革方案——比如说，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公司在提交财务报告的时候列出雇员期权状况，以便在某种程度上避免造成当前诸多丑闻的误导性正面财务状况声明——对于今天的美国联邦政府来说，也已经是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后者在面对丑闻的时候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口头上严厉，却拿不出同样严厉的对应措施。尽管2002年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纠正了股份公司管理和会计实务中存在的一些浮夸问题，至少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一些有益的补救措施，^[7]但联邦政府对股份公司丑闻的整体态度始终是迟钝而懦弱的。与1720年英国政府面对股份公司丑闻时的态度对比，我们会发现，过去的300年间，股份公司已经获得了非常强大的权力，以至于削弱了政府对它的控制力。在1720年还是一个被立法机关说禁就禁的新兴机构，现在的股份公司制已经统治了我们的社会和政府。

它究竟是怎样变得如此强大的呢？

股份公司作为商业形式发展史上的天才成果，它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迅速崛起的原因，就在于它整合资本以及无数个人经济力量的能力。合股公司（joint-stock company）出现于16世纪，当时，由于资本来源只限于那些有能力运作企业的人，合伙企业很明显无法适应工业化带来的新兴（尽管并未流行）的大规模生产方式。1564年，皇家矿产公司（the Company of the Mines Royal）成立合股公司，由24位股东联合出资，每股相当于1200美元；1565年，矿产机械公司（the Company of Mineral and Battery Works）通过回购之前已经发行的股票来增加注册资本；1606年，新河公司（The New River Company）成立合股公司，将新鲜的水运往伦敦，而在此之前，已有相当一部分公用事业

部门采纳了此种形式^[8]。1688年，英国共有14家股份公司，但没有一家的股东数超过三位数。17世纪最后十年，股份公司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当这种新的商业形式成为殖民产业融资的有利工具时，以股份公司的形式进行投资的资金总额翻了一倍。尽管合伙企业仍然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商业组织形式，但是股份公司正在稳步地逼近并超过合伙企业。

1712年，英国人托马斯·纽柯门（Thomas Newcomen）发明了用于煤矿抽水的蒸汽机，因此开启了工业革命时代。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蒸汽机加速了英国和美国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发展，扩展了各种产业的发展空间，例如采矿业、纺织业（及相关产业如漂白、印花、染色，以及研光）、压榨、酿造和蒸馏业^[9]。这些大规模生产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合伙制无法满足此类需求，而股份公司借机扩张。工业革命后的美国，在1781—1790年之间，采取股份公司制的企业翻了10倍，从33家增长到328家^[10]。

在英国，1825年“泡沫法案”被废除，组建股份公司再度成为合法行为，此后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股份公司急剧增多，秘密交易和股价泡沫在商业世界再一次成为普遍现象。正如小说家司各特所观察到的，合股公司很快就成为“时代所向，大势所趋”，也成为讽刺小说的对象。司各特挖苦说，通过买某家公司的股票做公司的股东，一个投资者靠花钱来挣钱（事实上，他认为公司很像一台机器，耗掉的能源又能为它的运行带来新的动力）：

有这样一个人，一个投资者，他从自己拥有产权的面包公司买面包，从自己拥有产权的牛奶公司买牛奶和芝士……为了通用酒类进出口公司的利益多喝一瓶酒，当然他也是这个公司的股东

之一。每一桩行为，本来都可能被定义为铺张浪费，但对这个人来说……铺张就等于节俭。即使他消费的物品都过分昂贵，质量都不怎么样，但因为这个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自己的顾客，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得强迫自己消费。不仅如此，如果殡葬行业的合股公司要和医药企业联合……如果他成为这个死亡和医生公司（Death and Doctor）的股东，那他可能会拼死保证他的遗产要拨出很可观的一份，用于他的灵床和葬礼花费。^[11]

当时，司各特语含讽刺。然而，现实中的股份公司已经做好准备踏上统治经济与社会的上升之路。在一种新式蒸汽机器的帮助下，它实现了这样的飞跃。这种机器就是蒸汽机车。

美国 19 世纪的铁路大王一生毁誉参半，但他们正是现代股份公司时代的真正缔造者。要运作铁路产业这样的庞然大物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铺设铁轨，制造机车，运转并维修整个铁路系统，整个产业很快就必须依赖股份公司的形式来寻求资金支持。在美国，铁路修建在 1850 年代蓬勃发展，内战后又再度兴起，1865 年到 1885 年之间建成了 10 万公里的铁轨^[12]。在产业发展的同时，股份公司的数量也在快速增加。英国也是同样的情形。在 1825 年到 1849 年之间，为铸造铁路而投入的资本主要都通过股份公司来获得，从 20 万英镑增长到 2 亿 3 千万英镑，翻了超过 1 000 番^[13]。

据《铁路和资本市场发展杂志》（*Railways and the Growth of the Capital Market*）的 M.C.里德观察，“最重要的副产品之一就是铁路系统的引入和扩展”，也就是说，它在帮助形成全国性的企业证券市场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4]。无论是在美国还是英国，铁路行业都要求更多

的资本注入，而这是 19 世纪初对公司进行投资的窄小富人圈所无法提供的。到了 19 世纪中期，当铁路股票在所有国家大肆发行的时候，中产阶级第一次开始投资公司股票。当时，《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宣布：“所有人都在买股票……穷困潦倒的小职员、穷学徒、没人要的服务生、破产的家伙——全都进了能靠钱生钱的阶级。”^[15]

但是，对大众更多地参与股票市场来说，还存在一个障碍：不管投入的是多是少，只要一个人投资了某家公司，他就必须无限制地对这家公司的债务负责。投资者的房子、存款，以及其他一切个人资产都可能被债权人夺走。如果这家公司倒闭，就意味着投资人仅仅因为拥有这家公司的股票就要搭上全部身家。除非这个风险被取消，否则投资股票不可能成为对普遍大众真正有吸引力的选择。到了 19 世纪中期，商业领袖和政客广泛呼吁改变立法，将持股人的责任限定在其对公司投资的总额之内。他们主张，如果一个人买了价值 100 美元的股票，那么他应当被免除这 100 美元以外的债务，无论这家公司日后发生怎样的变化。“有限责任”（*limited liability*）的支持人为这种制度辩护说，它对于吸引中产阶级的投资人进入股票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英国的合伙人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Partnerships*）声称，“有限责任制将允许那些谨慎投资的人与他们富有的邻居一起分享公司的股权”，同时，反过来，又意味着“他们的自尊被维护，他们的智力得到鼓励，并有额外的动机去维护秩序并尊重关于财产权的法律规定”^[16]。

委员会在后来的声明中曾委婉地暗示，将工人吸纳进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终结阶级冲突，这也在扩大潜在投资者的经济原因之外，构成了有限责任制度的政治合理性依据。《爱丁堡日报》（*Edinburgh Journal*）1853 年的一篇评论里提到：

工人并不理解资本家的立场。对比的补救措施就是，让他们在实际经验中获得与资本家同样的立场……一旦工人获得与资本家一起行动的机会，马上，他们与资本和劳动相关的所有观点就会经历一个巨大的转变。他们将会明白，就算只是勉强经营一家很小的商号，也是一件极度辛苦和令人焦灼的差事……在合股原则的帮助下，中产实干阶级将创造大量的物质和社会财富。^[17]

然而，在大西洋两岸都有人极力批评有限责任制，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道德层面。因为它允许投资者在公司遭遇困境时全身而退，他们相信这将会从根子上破坏几个世纪来形成的商业世界。借助有限责任制，投资者能够毫不顾惜投资公司的未来，鲁莽行事。在吉尔伯特(Gilbert)和苏利文(Sullivan)创作的一首尖锐讽刺歌曲里，戈德博瑞先生，一个虚构的公司推销者如此解释这家“乌托邦有限公司”(Utopia Ltd)：

你会变成罗斯柴尔德，
即使你的公司破产，
清算人说：“没关系，债不要你还，”
明天新公司就能再开张。

某位阻止在英国实施有限责任制的议员认为，人们担心有限责任制会攻击“商业立法的首要原则和根本法则……即，每个人必须以自己的能力为自己所订立契约的所有债务负责”，同时它还会“允许人们以极小的风险进入贸易领域，却坐拥获利的无限可能”，这样就是在鼓励“一个堕落的完全不顾将来的投机体系”。^[18]

尽管存在以上的反对意见，有限责任制还是在公司法中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在英国是在1856年，在美国则是19世纪后半期。投资股票的风险就此消除，至少投资人不用再担心自己投资金额之外的银行存款会面临强制执行的风险。大众开始更大规模地进入股票市场，投资人也开始广泛持有各种股票、债券，公司发展的道路被廓清。但尽管如此，直到19世纪末，公开上市的股份公司在美国仍然很少见。除了铁路产业，其他的大公司往往仍由家族掌控。即便它们也发行股票，但却仍是以面对面（person-to-person）的方式进行股票交易，而不是依赖股票市场。然而，到了20世纪早期，公开上市的大型股份公司已经成为商业世界的固定成员。^[19]

从1890年开始，在短短的20年里，股份公司经历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而这一变化的开端就是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20]以废止公司法中不受欢迎的限制为代价、吸引有价值的公司型企业落户该州的举措。这些举措包括：

- 撤销了限制性条款，企业注册成为股份公司不再受到特定宗旨、存续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 实质性地放宽了对公司合并和取得的控制；
- 废止了公司之间不能互相持有股票的规定。

其他州不想在争夺公司型企业的斗争中落败，于是很快也推出了类似的法律修改措施。这些变化造成了一场骚动，商业领域的公司机

构开始努力要求获得新的自由和权力。然而很快，当取消关于公司合并和取得的限制这一影响深远的政策公布之后，大量的中小型股份公司迅速被一小部分的超大型股份公司所吞并——1898年到1904年间，1800家股份公司合并成157家^[21]。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经济从以私人企业自由竞争为主迅速转变成由少数超大型企业占主导地位，这些企业由大量的持股人共同所有。股份公司制的帝国时代就此开启。

“每一根枕木就代表着一个小股东。”著名的反垄断主义者和铁路改革家牛顿·布思（Newton Booth）在1873年担任加州州长时这样说。他的意思很明确：对一个大型股份公司来说，股东们拥有的权力和控制力其实是非常小的，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在20世纪早期，典型的股份公司都拥有数千、甚至数万名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小持股人。因为个人的力量实在过于稀薄，这些持股人根本无法影响公司的管理决策；因为分布过于零散，他们也无法集体行动。他们因此丧失的权力和对大股份公司的控制权实际上就被管理者唾手而得。1913年，一个由国会议员阿瑟恩·普若（Arsène Pujo）领导的国会下属委员会成立，负责调查“资金信托”（money trust）计划。这个委员会的报告指出：

没有一位被传召的证人能够指出在任何国家的历史上曾存在这样的先例，持股人成功地推翻任何一个大股份公司现任的管理层，或者曾经成功地进行对现任管理层的调查，以确认该管理层是否良好或诚实地运作……在有无数个分散持股人的大型股份公司里……管理层事实上是能够使自己永远存续下去的，并且利用事实上的任命权、持股人对管理的漠不关心以及其他影响力来控

制绝大多数的股权。^[22]

由于各种现实存在的原因，持股人对于他们所拥有的股份公司其实可以说毫无影响。

既然持股人——真实存在的自然人在股份公司完全消失不见，法律不得不找出另外的人来承担这个实体进行经济运作所必须承担的法律权利和义务。这个“人”就是股份公司自身。早在1793年，一位股份公司专家就大概描绘出公司人格的逻辑要点，他对股份公司的定义是：

一群人结合成的统一体，在一个特定命名之下，以人的组织为基础，具有稳定的承续性，经法律授权，有若干方面的行为能力，作为个体，尤其具有获取与出让财产、履行契约责任、指控与被控、共享权益及其共同免除等方面的行为能力。^[23]

1825年，另一位学者指出，在合伙企业中，“法律凝视的是个人”，然而在股份公司中，“法律凝视的只是执照所创造的幻影，是公司的躯壳，它对个人一无所知。”^[24]

截至19世纪末，经过这场古怪的法律魔术，法院将股份公司彻底转变成“法人”：有自己的身份，与有血有肉的持股人、管理者、雇员完全分离开来。跟自然人一样，法人以自己的名义来运作公司，需要资产、雇员、缴税，可以在法院主张自己的权利，为自己辩护。至少在法律上，法人取代了拥有股份公司的自然人。现在，法人被视为一个实体，正如一位法学教授在1911年所强调的，法人“不是想像的，虚构的，也不是模拟的，它是自然存在的”，法人就是一个自由的

独立的存在。^[25]古老的“授权理论”被抛弃，这种理论认为公司只不过是政府政策制造出来的一种工具，政府创造了公司，并赋予它们功能。与授权理论相联系的所有基本原理也都随之被抛弃，政府不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设置各种严格的限制来阻碍公司的发展。既然公司被看成是与自然人相同的法人实体，现在的逻辑就发生了变化，新的逻辑贯穿在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的立法提案当中，也体现在最高法院1886年的决定之中：因为公司是“法人”，所以公司应当受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法律的正当程序”和“法律的平等保护”等条款的保护。尽管，这些条款由宪法中引申出来原本是为了保护被释放的奴隶。^[26]

随着股份公司的规模和权力逐渐增大，缓和人们对其抱有的恐惧心理的需求也逐渐提高。在20世纪早期的合并风潮兴起时，股份公司就遭遇到第一次全面的合法性危机。当时，很多美国人第一次意识到股份公司已经演变成一个庞然大物，甚至有吞没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危险。当时，股份公司在广泛认为是没有灵魂的利维坦——冷漠、没有人性、缺乏道德感。突然，它们无力抵挡弥散的不满情绪和有组织的异议（特别是来自日渐扩大的劳工运动），人们要求更多的政府管制，甚至越来越普遍地开始出现废止股份公司的要求。商业领袖和公共关系专家很快意识到，维护股份公司这一组织形式的新权力和新特权需要一种新型的公共关系战略。

AT&T 是当时美国最大的一家股份公司，也是贝尔系统（Bell System）的母公司，在美国电信业占据垄断地位。它在1908年发起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广告战役，试图说服充满疑心的公众逐渐喜欢并接受股份公司。和法律将公司变成“人”以弥补自然人缺位的方式很相似，

AT&T 广告战为了克服人们认为公司是没有灵魂非人类的物体的印象，努力用人类的价值观从头到脚地包装公司。AT&T 的一名总裁忧虑地说，“庞大的组织”容易让人们相信，“人类的理解力、同情心、接触力和自然的人类关系”都与股份公司无关，公众已经确信“股份公司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物体”。而另一名 AT&T 的管理人员则相信有必要“让人们理解并且爱上公司。不仅仅是在意识上依赖于公司，而且是爱上它——对它保持真正的感情”。从 1908 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AT&T 通过它的广告运动赋予自己人类的特征，将自己塑造成人们的“朋友和邻居”，试图让自己拥有人类的面孔。雇员的形象，特别是电话接线员和线务员，和持股人的形象一样频繁出现在公司的广告上。一则冠名为“我们的股东”的杂志广告以一名看上去像在孀居的妇女为主角，她的两个孩子仰着头看她，而她正在翻看 AT&T 的股票证书。另一则广告则宣称 AT&T 是“公有制下的新型民主”，它“由人们直接拥有——不是被个人控制，而是由所有人一起控制”。^[27]

其他大型股份公司迅速开始模仿 AT&T。比如，通用汽车也开始大做广告。用广告商的原话来说，它们意在“通过称公司为一个‘大家庭’来使组织机构人格化”。通用当时负责企业广告的 CEO 阿尔弗莱德·斯韦恩（Alfred Swayne）说，“‘股份公司’这个词未免太冰冷，没有人气，容易被误解和遭受不信任，”但“‘大家庭’这个词听上去非常的个人化、人性化、充满友好。这才是我们通用汽车的形象，一个融洽的大家庭”。^[28]

到一战结束时，美国的一些主要股份公司，比如通用电气、柯达、安迅收款公司（National Cash Register）、美标石油（Standard Oil）、美国橡胶（U.S. Rubber）和固特异轮胎公司（Goodyear），都忙



于打造自己对社会负责的慈善形象。“新型资本主义”常被用来描述以下趋势：股份公司承诺做一个良好的“公民”，保证会营造更好的工作环境，以此来使自己的形象不断美化。当人们要求政府限制股份公司的权力时，当退役的一战老兵因为自己在战争中遭受的巨大风险要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条件、造成劳动矛盾大量激化时，新型资本主义的倡导者就试图证明，即便没有政府和工会的强制推动，股份公司一样能够保证其善良本质。^[29]

新资本主义运动的领袖之一保罗·利奇菲尔德（Paul W. Litchfield）曾在 20 世纪中叶管理固特异轮胎公司长达 32 年之久，他相信，资本主义如果不能以劳资双方的平等与合作代替双方的对立与斗争，就将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尽管被一些竞争对手攻击为社会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利奇菲尔德仍然稳步推进各项规划，帮助提高工人及其家庭的健康、福利以及教育，让工人在公司事务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他最自豪的成就之一就是工人代表的参事议事会，它完全模仿参议院的模式建立，负责裁断有关劳动合同的相关事宜，包括工资问题。利奇菲尔德认为，他的慈善方针是固特异公司成功的必要条件。他说道，“固特异拥有人类所拥有的各种品质，正是因为固特异的商业活动中渗透着这些人类的品质，才能在美国的工业界如此快速地崛起。”^[30]

股份公司的社会责任理论在 20 世纪 30 年代再次爆发。当时，股份公司正遭遇负面的公众评论，许多人相信正是股份公司的贪婪和管理不善导致了大萧条的出现。他们同意联邦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丁斯（Louis Brandeis）在 1933 年最高法院判决中的观点，认为股份公司是一个有巨大作恶能力的“弗兰克斯坦怪物”（Frankenstein monster）。^[31]为了反驳这一观点，商业领袖们大肆宣扬股份公司的社会责任感。他

们相信这是重建人们对股份公司的信任的最好策略，以改变他们逐渐增长的对大政府的迷恋。当时的通用电气主席杰勒德·斯沃普（Gerard Swope）道出了大公司领袖们的共同情绪。他在1934年说：“如果我们认识到有组织的产业对雇员、对公众、对持股人所承担的责任的话，就应当承认，有组织的产业应当成为社会的领导者。民主社会不应当依赖政府来运作。”^[32]

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和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Means）在1932年就已经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经典著作《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当中，他们论证道，股份公司制“即便不是现在，也可能在未来成为现代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组织形式”；公司的管理者已经成为“产业之王”，而公司的组织机构与联邦的权力机构差相仿佛。因为已经积聚起了相对于社会的巨大力量，股份公司及其管理者现在必须要为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自己的股东服务，虽然前者曾经只是政府的责任。他们写道，“对大股份公司的控制应当发展成为一种纯粹中立的技术专家政治，以平衡社会各群体的不同诉求，要以公共政策而不是私人的贪欲为基础来分配收入的每一个部分。”伯利和米恩斯警告说，“如果股份公司想要继续生存下去”，很可能就不得不采用这种新的方式。另一位研究股份公司的杰出学者埃德温·多德教授（Edwin Dodd）对股份公司的社会责任则持更为怀疑的态度，但他也相信，如果股份公司没有社会责任感，或者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都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话，它们就可能失去自身的合法性以及相应的权力。多德1932年在《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上撰文指出，“现代的大规模工业给大股份公司的管理者以巨大的权力，保持现有权力的欲望会鼓励他们采用并散布这样的观点，即他们不仅仅是那些缺席的所有者的仆人，



而且是股份公司有关利益的守护者 (guardians)。”^[33]

尽管股份公司的领袖们声称他们能够管住自己，罗斯福总统还是在 1934 年通过了新政，试图以一系列的管制改革措施限制股份公司的权力和自由，来重建经济安全。作为对股份制公司实施管制的第一次系统性尝试，罗斯福新政受到当时的商业领袖们的痛骂与指责，其中甚至有一撮人发起密谋试图推翻罗斯福政府（第四章将对此进行深入分析与讨论）。尽管密谋最终败落，但其中体现出来的商业界对罗斯福的深深恨意仍然非常重要。无论如何，罗斯福新政的精神和众多管制措施一时大行其道。在它诞生后的 45 年里，人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重建，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股份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的权力被抵消，至少部分是被政府管制、贸易联盟以及社会工程的持续扩展所抵消。但接下来，与 100 年前蒸汽机和铁路、新的法律以及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创造了股份公司这一巨兽 (behemoth) 相类似，技术、法律以及意识形态的新一轮结合——经济全球化——缔造了一个新的潮流，这不但逆转了对股份公司实施更多调控的趋势，并且赋予了股份公司不可预期的权力和影响力。

1973 年，由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的成立带来的油价动荡撼动了整个经济基础。以卡特尔 (cartel-like) 形式运作的 OPEC 控制了全球的石油供应。高失业率、通货膨胀以及大衰退纷至沓来。当时占优势地位的经济政策与罗斯福新政一脉相承，倾向于实施管制以及其他形式的政府干预。由于无力处理危机事宜，这一政策导向受到持续的攻击。整个西方世界随后开始采纳新自由主义，这种经济理论与它的前驱自由放任主义一样，倡导个人和股份公司的经济自由，要求政府在经济中扮演有限角色。撒切尔夫人在 1979 年成为英国首相，里根在

1980 年接手美国政府，很明显，由罗斯福新政的理念和政策所开启的经济时代已经走向终结。在接下来的 20 年间，政府以不断增长的热情制定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经济政策，比如解除管制、私有化、削减政府开支，以及减轻通货膨胀。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已经成为经济正统观念。

同时，运输业和沟通技术方面的技术创新极大地提高了股份公司的灵活性。大型快速喷气飞机和集装箱使得海洋运输和铁路以及公路运输连成一体，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运输的速度和效率。由于长途电话、电传、传真技术，以及最近的网络的发明，通讯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股份公司如今不再被限定在本国内发展，而能够实现全球设厂全球发展，以足够低的成本进行生产或者提供服务。他们能够在贫穷国家购买劳动力，将产品销往富裕国家，当地人们的可支配收入能够保证他们以合理的价格来购买这些产品。自 1948 年以来，高昂的关税已经在逐步降低，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成立之后，股份公司能够利用他们新获得的这种灵活性，而不会受到金融制裁。

在脱离了地区的限制、获得更多自由之后，股份公司现在甚至能够操控政府的经济政策。正如加拿大一家业内领先的高科技公司北电网络（Nortel Networks）的副总裁克利夫·阿伦（Clive Allen）所说，公司“没必要对加拿大效忠……因为我们在这里诞生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永远待在这里……要让我们有兴趣一直待下去，这个地方必须一直保持足够的吸引力”^[34]。保持足够的吸引力，不管是为了保住国内的投资，还是为了吸引新的投资，现在在政府之间不得不展开竞争，让股份公司相信它们能够提供对生意更为有利的政策。最终，“回到底线”，会发现他们不得不放弃管制制度——特别是保护工人利益和环境的条款——减税、撤销社会福利项目，通常还对其后果悍然无视。^[35]

1993年，随着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立，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解除管制的逻辑进一步被深化。加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既有标准如今有了新依据，而为了防止那些可能妨碍全球贸易流动的管制制度，还产生了新的标准。WTO成为各国经济主权的一副镣铐。到了1999年，成千上万的人们涌上西雅图的街头，抗议WTO官员和成员国代表的会议，因为这个组织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强大却不公开的、并且深受股份公司影响的监工，阻碍了各国政府保护自己的公民和生态环境不受股份公司伤害的努力。^[36]

安然公司崩溃，当会计公司安达信（Arthur Andersen）在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被揭露之后，人们呼吁对会计业建立更好的监管体系。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因为加入WTO，美国政府已经放弃了解决此类问题所需的部分权限。“管制对于贸易而言并非必要，反而会在无意中成为贸易的障碍，”^[37]在这种理念的驱使之下，为了回应工商业者的强烈游说，WTO在20世纪90年代末建立了一整套“规则”来确保成员国不会以“合理目标所需之外的限制”来管制会计业。^[38]1998年，包括美国在内的成员国同意遵守新的规则，虽然这些规则在2005年之前并不会正式生效，但这些成员国既然接受了这些被强加的标准，也就意味着不久后他们就要听命于一个外来的、不民主的机构了。^[39]

首次审核这些规则的时候，美国代表们询问WTO官员，这样一种法律是否可以不受其限制：这种法律能够限制会计事务所同时以一家公司的咨询者和审计者的身份出现，从而防止安然/安达信崩溃事件重演——同时它已经作为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一部分生效了。^[40]然而对这个问题的最终答复必须等待这些WTO规则正式启动之后再由WTO进行裁决，而这很可能要在某个成员国对美国的这一法律提出投诉时再以法庭裁决的形式进行。但是，连这样的问题都需要询问

WTO，这种情况本身就表明了这些 WTO 规则是如何潜在地影响政府对会计业进行管制的权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主权。^[41]

会计业管制问题并不是惟一能让 WTO 插手各国政府决策权力的领域。在不计其数的情形之下，该组织以实施制裁为要挟，要求国家修改或者废止用以保护环境、本国消费者以及其他公共利益的法律。^[42]比如，美国法律禁止从不使用海龟保护措施的国家进口海虾，但这条法律被裁定违反了 WTO 标准^[43]；又比如说，欧盟颁布措施禁止用人工激素喂养牛，也禁止此类牛肉进口，也遭到同样的裁定。然而，WTO 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这还不能仅仅通过它的正式规定来加以衡量。正如所有的法律标准体系一样，WTO 规则通过非正式的渠道施加其最强大的影响力：政府可能会对自己的行为实施自我审查，以确保自己不会违反 WTO 规则。美国马里兰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马里兰州曾试图通过一项法律，希望禁止政府与在尼日利亚从事商业活动的公司开展采购业务（当时尼日利亚处于残忍的独裁统治之下）。后来该州放弃了这项法律提案，因为美国国务院警告说，此项法律可能会使得美国受到 WTO 的挑战。^[44]除此之外，政府还会运用 WTO 标准对其他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方改变政策，如果对方拒绝，即威胁要启动 WTO 投诉。美国和加拿大就曾以此要求欧盟放弃其预期采纳的管制措施，该措施企图禁止进口被猎兽夹捕获动物的皮毛以及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的化妆品。^[45]

考虑到产业集团在 WTO 中享有的优势地位和举足轻重的影响力，WTO 的政策和各项决定倾向于维护股份公司的利益，这一点实在是无须大惊小怪。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所说，代表各成员国的贸易和商业部长们通常“与发达工业国家大企业的商业和金融利益紧密关联”，因此很容易就成为股份公司施加影响的目

标。^[46]股份公司和产业集团都乐意同 WTO 的上下官员保持密切的关系。“我们希望既不用做 WTO 的秘密情人，也无需走侧门就能进入 WTO，”这是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一个对 WTO 颇具影响力的组织——的一位成员对他所在的组织（亦可推广至整个产业群体）和 WTO 之间的特殊关系所做的描述。^[47]

尽管远比国家年轻，但 WTO 已经成为阻碍国家保护自己的公民免受股份公司侵害的重大羁绊。更普遍来说，经济全球化（WTO 仅仅是它的一个元素）已经相当客观地提高了股份公司规避政府权威的能力。“股份公司已经拥有足够的能量，能对政府构成威胁，”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ion）主席威廉·尼斯卡宁（William Niskanen）说道，“特别是跨国公司。它们对特定政府的立场的依赖性更小，因此也更缺乏忠诚度。”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企业政府中心（Center for Business and Government）的前主任艾拉·杰克逊（Ira Jackson）认为，股份公司和它们的领袖已经“取代政治和政客们成为……现代体系里新的大主教和统治寡头”。另外，固特异轮胎公司前 CEO 萨米尔·吉巴拉（Samir Gibara）认为，政府“与之前相比，在与股份公司的关系问题上已经变得虚弱无力”^[48]。

现在，股份公司控制社会的程度可能比政府更大；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正是通过经济全球化获得的权力让股份公司变得格外脆弱。就像任何一种统治制度一样，股份公司现在广泛招致公众的不信任、恐惧，并被要求负起责任。今天的股份公司领袖明白，和他们的前辈一样，他们必须要重新获得并且维持公众的信任。他们也和前辈一样正在试图通过展示公司人性化、慈善和具备社会责任感的形象来努力柔化股份公司的公众形象。“最根本的是，今天股份公司人性化

的一面毫不逊色于其他特征，”博雅公关（Burson-Marsteller）的CEO，公众关系专家克里斯·科明萨拉夫斯基（Chris Komisarjevsky）说道，“聪明的股份公司都清楚，人们总是把不同公司当做一个个人来进行比较……因为这是人们思考的方式。我们正是以非常个人化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假如你带着个照相机和麦克风在街上走，随便拦下个人问一问……他们都会像描述人一样描述股份公司。”

今天，股份公司运用“品牌”来为自己创造独一无二、具有吸引力的个性特征。品牌战略超越了仅仅将公司和自然人联系在一起的宣传方式——就像AT&T早期的活动，它以工人和股东为自身形象，或者就像更晚近的对于名人代言（例如乔丹给耐克做的广告）和公司吉祥物（比如麦当劳小丑、汤尼虎、米其林轮胎人和米老鼠）。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品牌事务所朗涛协会（Landor Association）主席克莱·蒂蒙（Clay Timon）说，股份公司的品牌形象是对于“它们是谁，从哪里来”的“人格化”。迪斯尼的“家庭魔法”（Family magic），惠普公司的“创新”（invent），都乐的“阳光食品”（sunshine foods）正是蒂蒙称之为“品牌驱动”的一些经典案例。“以品牌形象存在的股份公司……是有灵魂的。”蒂蒙认为，这让股份公司们能够在与包括消费者、雇员、股东以及管制者这些它们赖以生存的群体之间创造出“理智与情感的纽带”。^[49]

蒂蒙提出朗涛为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以下简称“BP”）定制的品牌驱动方案——“进取、绩效驱策、绿色企业、创新”——作为一项例证，说明股份公司的环境保护意识以及社会责任感在今天如何越来越成为关键的品牌主题。然而，他说，即便是那些并未像以上公司那样明确制定自身品牌形象的公司，现在也必须拥抱社会责任感了。“出于必要，无论公司主动与否，它们都不得不担负起



某种社会责任。”这也是它们成为支配性的组织形式这种新状况本身的要求之一。它们现在必须展现出，政府对它们放松管制以及让它们参与社会治理都是值得的。“股份公司需要变得更加值得信赖，”作为社会责任先行者的萨姆·吉巴拉（Sam Gibara）说，“权威已经从政府移交到股份公司手中，后者有必要承担起责任……有必要确实如这个世界的公民一般行动，有必要主动进行自律——以往这些要求是由政府来提出的。”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反对股份公司权力的群众示威和责难声震撼了北美和欧洲的大城市。作为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公民运动的一部分，包括非政府组织、社区联盟以及工会在内的抗议者们盯住了股份公司对工人、消费者、社区以及环境的伤害。他们的关注点与为安然事件担忧的人截然不同，对后者来说，相对于堕落的管理者而言，股东的脆弱性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但这两个群体也有共通之处：他们都相信股份公司已经成为权力和不负责任的一种危险的混合体。公司的社会责任今天被提出来回应上述责难。当然这是一种市场手段，但并不真的只限于此，它会显示股份公司对社会而言，是负责任且光明磊落的，并由此把合法性带给股份公司的新角色——社会的统治者。^[50]

2.新的形象，旧的公司

今天的公司领袖会说他们的公司关心的不只是利润和亏损，他们对社会整体而不仅是股东们负有责任。公司的社会责任是他们的新信条，是对以往公司只为贪婪所驱动的形象的一个自觉矫正。尽管有这样的转向，但公司自身其实并未发生变化。正如它在19世纪作为一项现代商业制度产生的时候一样，它仍然是一个法律拟定的“人”，生来便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利润，而与道德考虑无关。大多数人会发现它的所谓“人格”对人类来说格格不入，甚至有些变态。但令人好奇的是，我们仍然接受它成为社会最具影响力的组织形式。今天以安然事件为开端的华尔街难题，部分可以归咎于股份公司本身作为组织形式的缺陷，但股份公司并非惟一具有此类缺陷的组织形式。事实上，所有公开进行贸易活动的公司都存在此类问题，即便是其中声誉最好、社会责任感最强的企业也不例外，比如辉瑞制药。

1849年，查尔斯·菲泽（Charles Pfizer）和他的表兄查尔斯·埃哈特（Charles Erhart）在威廉斯堡（Williamsburg）建立了一个小化学公司，当时威廉斯堡是布鲁克林的郊区，与曼哈顿只能靠渡船交通。在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这家小公司已经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制药公司——辉瑞制药。威廉斯堡，现在可以通过布鲁克林大桥和海底隧道与曼哈顿相连，同样历经了繁荣与衰落，现在部分因为辉瑞的原因，也在经历某种程度上的复苏。

某个夏日的中午，辉瑞的高级副总裁汤姆·克莱因（Tom Kline）带了一个纪录片团队来走访威廉斯堡被他的公司原厂址包围的社区。克莱因是高个的中年白人男子，穿着整洁的蓝色便裤以及搭配得当的免熨短袖T恤，在这个主要是低收入阶层的社区内，看上去很扎眼，但他明显觉得非常自在，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整个走访过程中，他跟路上遇到的陌生人问好，就好像他们都是他的老朋友。他向当地一位妇女保证，“跟你、辉瑞和我们的伙伴们一起工作，我们将会让这里变得更好，”他甚至还在与另一人短暂交谈之后，便亲昵地说出“我爱你”）。整个走访从法拉盛（Flushing Avenue）地铁口开始，这个地铁口的楼梯入口正好和辉瑞工厂入口那条街交错。克莱因开始解说，描述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某个晚上，他下班回家在这个地铁站的月台上差点被抢劫的经历，当时他是这个工厂的一个小经理。他从这些疑似劫匪的人身边逃开，跑到轨道远端，满心害怕地藏在那里。但同时他也被自己的遭遇所激励，决心要做些事情来阻止犯罪和吸毒的蔓延以及对当地社区的破坏。就在那个危险时刻，他下定决心要撤销辉瑞关闭工厂的计划，相反，他要努力促成“一个改变，让这个社区变得更好”^[1]。

今天，工厂依然存在，多亏克莱因和辉瑞，这个地铁站变得安全很多。克莱因向拍摄组展示了一个黄色的盒子，它被装在地铁月台候车区的墙上，与一个智能的安全系统相连，该系统也由辉瑞出资建造并维护，能够让遭遇危险的地铁乘客向附近的工厂保卫人员求救。从这个地铁站出发，走过一个街区，就是辉瑞最早的公司总部地址，现

在这里是克莱因创建、部分由公司来资助的小学。尽管这个学校是纽约市立公共学校系统的一个正式组成部分，但校长索尼亚·杰拉多（Sonia Gerrardo）说，通过辉瑞的指导老师和志愿者们，“孩子们和公司的确一直保有联系。”这个社区里还有一个惠及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开发计划，由公司的再开发项目牵头，并由公司和市政同时管理。^[2]

克莱因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提高美国城市的整体状况，我们这些生意人……必须承担起责任。”他的行动表明，这些绝不是空谈。就像辉瑞的前 CEO 汉克·麦金内尔所说，克莱因是“让一个极度荒废的社区恢复活力的动力”。^[3]

然而，麦金内尔希望辉瑞所做的不仅是拯救城市。他说，“辉瑞应该比全球任何一家公司为更多的人做更多事。”每年公司在全球都要捐赠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产品和资金，如该公司所说，它要成为“美国最慷慨仁慈的公司之一”。麦金内尔特别感到自豪的是公司消灭颗粒性结膜炎的努力，这是一种传染病，每年导致上千万的人失明。辉瑞生产出阿奇霉素，一种每年只需服用一丸即可防治颗粒性结膜炎的药物，每年辉瑞都向非洲国家捐赠大量这种药物。麦金内尔宣称这种药物已经将非洲的感染率降低了一半，并且有可能在 2020 年完全消除这种疾病。“我们辉瑞从未停止寻找社会问题的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公司在官方网站上这样宣布，“无论是向有需要的人们捐赠药物，还是为员工子女提供学校，或是重建我们最老的比邻社区……我们致力于达到公司的目标：帮助全世界的人们更健康、更有建设性地生活。”^[4]

股份公司一直是博爱的。它们向慈善机构提供捐赠，资助小联盟的球队，帮助兴建剧院。从传统上来说，这样的慷慨是非常实用主义的，肯定是服务于它们的主要目标，即赚钱。然而现在，辉瑞这



样的大公司已经将“公司做好事”放在商业计划的核心位置。一种对社会、而非仅仅对股东的责任感已经被用于界定公司的本性——它应当是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做什么。现在公司往往被寄予希望，提供善（good），而不仅仅是商品（goods）；追求价值，而非仅仅是金钱。公司应当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在20世纪80年代，仿佛受了激素刺激般的公司们曾经像尚斌公司（Sunbeam）的阿尔·邓拉普（Al Dunlap）一样行为乖张，他出现在一家杂志的封面上，挥舞着一支机枪，象征着他不留俘虏的管理风格，页面底行上的文字把他吹捧得像个英雄和无畏的骑士。这些人现在看来好像野蛮人，笨拙又易怒，和他们身上的红背带一样可笑。今天，领先企业的CEO们努力树立新的形象：具有同情心、真诚关心公司行为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不是仅仅关注股东的利益。他们说自己必须达到的底线包含社会和环保方面，而非仅仅在金融方面。正如固特异轮胎的萨姆·吉巴拉所说，今天，“公司已经不仅仅代表它的股东了……公司受到更多的制约，必须顾及更多的需要。”它的义务已经不再局限于为投资者挣钱，如公司社会责任的先行者亨利·福特的孙子，福特汽车公司主席威廉·福特所说，“公司能够成为，也应当成为解决21世纪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一支主要力量。”^[5]

前哈佛商业学者艾拉·杰克逊相信以上态度预示着资本主义的一个全新阶段的开端，他将之称做“有良心的资本主义”。有例为证。公司现在纷纷在它们的网页和年度报告里自夸在社会和环境方面取得的成就，所有的部门和管理层人员都投入到这些活动中。商业出版物总是要花很大力气来强调社会责任，并且按照这些方面的成果对公司进行排名。商学院开设了关于社会责任的新课程，大学创设了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中心（在诺丁汉大学，烟草巨头ABT捐助了700万美元建

造了一个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无论是何种商业会议，社会责任都在会议的议程之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瑞士、WTO 首脑会议、业界研讨会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峰会，公司之间相互竞争，争夺道德的制高点。^[6]

现在，无论是在电视台、图片杂志，还是在报纸上，虔诚的社会责任主题广告正在跟带有性暗示的广告争夺广告标王的位置。壳牌最近的一个电视广告就是很好的例子。广告里自称环保主义者的罗曼蒂克的弗朗西丝·阿博特—瓜尔蒂欧拉乘坐直升机环绕美丽的群山和湖泊飞行，同草棚里的土著居民对话。她疑惑的目光随着满载的卡车穿过这片自然风景，“她想要保护脆弱的环境，不让它们因为石油和天然气而遭受破坏，”一段抒情的苏格兰口音旁白：她肯定是个反公司的绿色和平之类组织的成员，我们想。这时，一个壳牌公司的地质学家说，“正好相反，她并不是石油公司的敌人，她就是石油公司”——哦，我们深受启发。

就跟大量类似的广告一样，这里传达的信息很清晰，公司关注环境与社区，而不是毫无心肝地追求利润；它们是世界疾患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始作俑者；它们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盟军，而非敌人。

杰克逊说，就在几年之前，当他向一位 CEO 建议他的公司应当遵守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时说，“要是不带武装保镖，就会被轰赶出办公室。”但是最近，在纽约，来自世界最大公司的百名 CEO 与绿色和平与大赦国际等 NGO 的领导人以及各国大使召开会议，签署了一项承诺，声明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原则。杰克逊说，这并非关于公司新良心秩序的惟一例子。他与许多其他商业评论作者一起，

为那些支持公司社会责任价值的大商业领袖们欢呼，并预告不这样做的大商业的领袖们必将失败。^[7]

现在，就连布什总统也在说，公司的社会责任是一项根本性的商业价值，实际上，是爱国之责。“美国正在进入一个责任的时代，迎来一种恢复个人责任感的文化，”他在一场关于安然崩溃的演讲中这样对一群顶尖的商业领袖们说，“这种新文化必须包括一种复兴的公司社会责任感……商业关系就像所有的人类关系一样，必须建立在正直诚信的基础上。”

然而，并非每一个人都相信公司具有社会责任的美德，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相信商业中的新道德主义说到底是与道德无关的。

当弗里德曼答应我的访谈时，他的秘书警告说如果他发现我的问题无聊，就会拂袖而去。这让我在他的办公室的休息室等待的时候很忧虑。我想，这肯定就是多萝西在小狗托托拖走窗帘露出奥兹国真正巫师时的那种心情。在我心目里，弗里德曼是位充满智慧的巨人，令人既敬又畏，或被神化，或被诋毁，总之不一般。所以，当他微笑着走进屋子时，我感觉到一阵放松：他是一个迷人的小个子，就好像巫师，刚刚超过五英尺高。弗里德曼打量着休息室，当时那里被布置成了一个嘈杂的临时电视演播室（这次访谈是为一个政府资助的电视纪录片准备的）。照明灯和摄像机凌乱地摆在房间里，电线铺满了地板。摄制组两个成员站在一边，手持棉球，用来擦去这位伟大人物鼻子上会反光的汗水。弗里德曼有些被这阵势惊呆了，抱怨道：“ABC 前些天来过，就两个人一台摄像机。今天，我们看到政府的臃肿和最严重的

浪费了。”

弗里德曼认为公司对社会有益（同时，太多政府是有害的）。然而，当谈及公司应当尽力为社会谋利时，他退缩了。“公司是股东的财产，”他告诉我，“它的利益就是持股人的利益。现在，公司能够超过这个限度，把股东的钱用来承担那些与赚钱这一底线毫无关系的社会责任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弗里德曼认为，对于公司的管理者来说，只有一个“社会责任”：他们必须为持股人创造尽可能多的回报。这是一个道德原则。管理者一旦选择利润之外的社会和环保责任——也就是说，努力更道德地行事——事实上反而是不道德的。

然而，弗里德曼认为，只有在一种情形之下，公司的社会责任能够被容忍，那就是当它只是表象的时候。当管理者将社会和环保责任当做持股人财富最大化的手段，而非最终目的的时候，他们就没有错。这就好像“卖汽车的时候在车前面安排一个漂亮女孩一样，并不是为了传播美，而是为了更好地卖车”。公益目标就是漂亮姑娘，目的是为了能更好地卖出商品。弗里德曼承认，纯粹从策略角度来看社会责任，会把高贵的理想贬低为伪善者的炫耀。但是当伪善服务于公司的根本目标时，它就是美德，而反之，德行也会是一种恶。^[8]

尽管弗里德曼的观点遭到善辩的生意人的抵制，他们认为这样的挖苦已经过时，卑鄙而且脱离实际，但他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质疑还是得到了一些很有分量的支持。前福特经济学家、卡托研究所主席威廉·尼斯卡宁认为，他“不会投资在社会责任方面太过出风头的公司”。他说，“我认为福特汽车公司仍然在制造好的汽车和卡车，但我认为这一任福特先生的（强调社会责任的）行为很可能毁掉该公司对所有者的价值。”^[9]商业理论宗师彼得·德鲁克相信弗里德曼“可能是仍然健在的最好的经济学家”，他回应弗里德曼的观点，认为公司的社

会责任是商业原则的一个危险的扭曲，“如果你发现一个管理者试图承担社会责任，就快点解雇他。”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德博拉·斯帕（Deborah Spar）坚持认为公司“设立的初衷并非是要建立一个道德实体……它们作为机构只有一个使命，那就是增加持股人的价值”。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弗里德曼的精神敌人——也同意弗里德曼的观点，认为公司必须“只为它的持股人考虑，而非为社区、员工或什么别的东西”^[10]。

公司由法律创造，其目标也由法律规定。法律决定了公司董事和经理们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必须干什么。同时，至少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根据法律而创建的公司，非常近似弥尔顿·弗里德曼关于机构的理想模型：它要求管理者把他们的公司以及持股人的利益置于其他一切之上，禁止他们变成一项社会公益事业——至少本质如此。

1916年，亨利·福特以一种痛苦的方式体会到了以上事实，并且在无意间甚至可以说违背本意地扩大了法律对公司的社会责任感的宽容尺度。

福特相信他的福特汽车公司应当不仅仅是一个赚钱机器。他给他的工人远远高于当时普遍水准的薪水，并通过T型车的年度降价来回馈消费者（这款车的最初价格超过900美元，而到1916年猛降到440美元）。据报道，他曾这样说，“我不觉得应当在我们的车上牟利太多。一个合理的利润就很好，不需要太多。”^[11]

约翰·道奇和霍勒斯·道奇两兄弟在1906年以10500美元帮助福特建立了他的工厂。他们是大股东，而约翰·道奇更成为公司的董事。兄弟俩许诺他们在芝加哥的机械工厂会专供部件给福特，此前他

他们还拒绝了根基更牢靠的奥兹莫比尔（Oldsmobile）公司的专供要求。但是，到了1916年，道奇兄弟有了更大的野心。约翰·道奇辞去了福特董事会的职务，计划与他的兄弟一起建立自己的汽车公司，他们希望依靠手里福特股票分发的季度红利来支持这项投资，但计划却被福特的决定打乱。在那一年，福特取消了分红，T款车的折扣更大，以此来让利给消费者。道奇兄弟因此将福特告上法庭。他们认为利润属于股东，福特没有权利将他们的钱让给消费者，无论他的初衷是多么善良。法院支持了他们的诉求。法官恢复了分红并申斥福特——后者在法庭聆讯时说，“商业是一种服务，不是金钱之源，”而且公司的运行应当仅仅“以赚钱为第二目的”——认为福特忘记了“一个商业公司首先是为持股人的利益而组织起来并运作的”，运行一家公司不可以“只顺带为持股人谋利，却以使他人受益为第一目标”。^[12]

道奇诉福特一案仍然体现着这样一条法律原则：经理和董事有法律义务将持股人的利益置于他人利益之上，没有法律权利服务于其他利益群体。这一原则被称为“公司最高利益”原则，它为在此案发生140年前亚当·斯密所深深忧虑的公司结构中的一个破绽提供了法律修正。斯密在后来成为经典的1776年的《国富论》一书中表达了他对于公司组织结构的疑惑。由于公司的所有者，即它的持股人并不亲自经营，而是将此项任务授权给职业经理人。他写道，后者不可能像管理自己的财物那样对他人的钱财也“如履薄冰”，“因此在对股份制公司的管理过程中，疏忽和浪费在某种程度上必定盛行。”

“公司最高利益”原则如今在大多数国家都是公司法的固定组成部分，强迫公司决策者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公司以及公司所有者的利益，以此来消弭“斯密的忧虑”。法律禁止公司利益之外的任何利益成为公司行动的动机，无论是帮助工人，改善环境，还是帮助消费者节省金

钱。公司管理者可以用自己的钱、用公民的身份来做这些事情，然而，作为公司职员，其他人财产的管理者，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权利将这些事物作为目的本身来追求——除非将之作为促进公司利益的途径，并进而最大化其持股人的财富。

公司的社会责任因此是非法的——至少纯粹的社会责任是如此。

公司律师罗伯特·辛克雷（Robert Hinkley）辞去了他的工作，在跟公司和公司法打了23年交道之后，他终于意识到，“目前的法律事实上不允许经理们和公司具有社会责任感。”他说：

全世界数以百计的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架构基本上是一致的……公司的实际运作人员对持股人有法律上的义务，这个义务就是为他们赚钱。不履行这一义务就会使得董事和经理人陷入被持股人起诉的境地。公司法认为公司即是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实体（并将公司的自身利益等同于持股人的利益），而非由公司对公共利益的责任感构成……公司法因此将伦理与社会考量抛诸脑后，认为它们与公司的根本使命毫无关联，甚至只是绊脚石。^[13]

这是否意味着当前的大公司纷纷拥抱社会责任感的行为——稍举几个例子，比如辉瑞、福特、固特异、BP——是非法行为呢？也不尽然。再想想弥尔顿·弗里德曼的信念：当社会责任感可以服务于公司自身利益的时候，追求社会责任感是可以被容忍的。在这一点上，他与法律的原则正相契合。

发生在英国19世纪的“休顿 v. 西科克铁路公司”一案奠定了相关的法律原则。一家叫做班顿（Bandon）的公司收购了西科克铁路公

司。当西科克铁路公司宣布将为它即将裁撤的董事们提供数千英镑的红利时，班顿公司的持股人将西科克铁路公司告上法庭。他们认为红利的现金来源现在归他们所有，所以不能被用来惠及他人，在本案中即是西科克铁路公司的董事。听审本案的法官之一欧文法官支持了他们的诉求，但他也同时认为公司的慷慨行为在某些情况下是法律所允许的。“例如，一个铁路公司，或者该公司的董事，可以由公司出钱让车站上所有的搬运工都去乡下休闲喝茶，有何不可呢？”总之，欧文法官观察到，由于“如果一家公司总是严酷地对待员工，除了合同规定的以外一毛不拔，就很快会被人唾弃”，公司能够从自身的慷慨行为中获得可观的回报。因此，欧文法官总结如下：

法律并不禁止公司为员工提供福利，但此种福利应为公司自身利益所必须……但是，为了实施者的利益而实施的慈善活动，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的形式（不包括纯粹的乐善好施）下，是可以施行的，但不能为其他目的。^[14]

今天，法律并没有改变：公益行为必须服务于实施者自身的利益——即公司自身以及它的持股人的利益。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强调：“尽管允许董事考虑其他人的利益，但法律要求他们必须找到此种考虑与持股人长期利益之间的合理关联。”^[15]这条规则现在已经在公司文化中得到完全贯彻，所以持股人几乎很少需要诉诸法庭，就像道奇兄弟在1916年所不得不做的那样。正如博雅公关的主席克里斯·科明萨拉夫斯基所言：“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他们总是期待能够确保公司的动力就是制造利润，制造回报，然后交还给投资人。所以极少出现公司的公益行为损害公司在财务方

面表现的情形。”^[16]

公司的存在只是为了最大化给它的持股人的回报，这项规则是不可动摇的。财经记者玛乔丽·凯莉（Marjorie Kelly）这样说过：“这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戒律，是不可挑战的真理。”^[17]今天，即使是最有使命感的公司社会责任运动的领袖也遵循着这一规则。

1999年4月22日，地球日，纽约的联合国大厦。世界第二大石油公司和美国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单一供应商BP公司主席约翰·布朗（John Browne）获得一次奖励。他掌舵短短四年就重建了这个昔日巨人的辉煌。英国女王曾经因为他的成就而授予他骑士头衔，商业领袖们把他奉为名人，华尔街记录着BP股价，以此表彰他的成功。但是布朗并非因为力挽狂澜而得到这些荣誉。令人惊讶的是，身为一个被环保主义者仇视的产业的领袖布朗，竟然获得了欧盟颁发的属于环保领袖的奖项——按照丹尼斯·海耶斯（Denis Hayes）（他所属的环保组织联盟地球日联盟[Earth Day Network]与联合国一起颁发此奖）的说法，他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领袖。^[18]

1998年，布朗认识到温室气体的释放可能造成地球变暖，对于一个石油工业的管理者来说，这是一个离经叛道的说法。此后他签署了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帮助全球气候联盟走出困境——该组织已经花费了数千万美元来游说反对议定书——并且保证他自己的公司将超过，而不仅仅是达到京都目标。到1999年，BP已经“抛弃了石油产业的老教义”，如布朗本人在回答一个合作石油商对他的谴责时所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绿色”石油巨人。^[19]

布朗是个有点矮但总是打扮得无可挑剔的人，不大像人们印象里强壮硬派的石油商。他定期听歌剧，看芭蕾，收集哥伦布到达前的美

洲艺术品，是剑桥大学物理系顶尖的毕业生。他说话声音很小但颇具权威感，传达出一种雄辩而激动人心的感觉，就好像他在接受联合国奖项时一样。“我们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新世纪的边缘相聚，”他这样开始他的演说：

关于新世纪，有种让人颤抖的恐惧感。当然，很多恐惧来自于对自然环境的未解决的挑战……我知道有一种观点，它简单地认为商业是造成许多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但我希望我们能够超越此类争论……我们必须帮助人们跨过粗暴的选择题：要么选择经济增长与污染……要么就拥有一个干净的环境但是经济毫无增长。这个选择题我们不能接受。^[20]

当他 1999 年作出这一演讲时，许多产业内人士仍然将布朗视为边缘分子，一个特立独行者。但就在一年之后，按照 2000 年世界石油会议主席、卡尔加里石油商吉姆·格雷（Jim Gray）的说法，布朗成为“今日世界的石油与天然气先生”，前者邀请布朗担任该会议的主发言人。在那短短的时间里，布朗的绿色议程成为整个产业的议程，得到壳牌石油以及其他大石油公司的支持。吉姆·格雷解释道：“伦理问题正在开始成为以社会责任感为名的重大问题。约翰·布朗先生说过，如果你在这些领域内不具有社会责任感，那你就是生活在史前时代的恐龙。你生活在过去。而事实上，我们生活在明天。”^[21]

“商业是否能够超越利润？”布朗风格的 BP 广告这样问道。“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布朗先生的信念与公司的绿色产品形象一起，暗示着一个承诺：公司的环保价值取向绝不只是口头功夫。他们至少把它放在与利润平起平坐的地步，在一个“多层底线”（布朗最爱用的一个

比喻)下并置,而不是单纯地置于财务表现的单一底线之下。布朗的远见说明公司以及运作公司的人能够真心关心价值而不是利润。然而这确实是法律所禁止的,至少当这样的关注可能损害盈利的时候。真正的问题是,一个商业实体是否能够不那么关注利润?BP是否真的不仅仅能够超越石油(Beyond Petroleum)——正如它在广告战中所使用的聪明的文字游戏——更能够超越利润(Beyond Profit)?它是否真的能够牺牲它自身乃至持股人的利益来考虑环境以及社会福利?

不奇怪的是,当我问弥尔顿·弗里德曼布朗和他的绿色信念是否能走下去的时候,他的答案是“NO!”,他说:“你列举的那些关于为环保利益出力的事情,他当然可以用自己的钱来做。但如果他以企业的效益为代价来追求环保利益,那么我认为他是不道德的。无论他的职位看上去多么高高在上,他实际上只是持股人的雇员。因此,他对于持股人负有非常重的道德责任。”^[22]

诺尔玛·卡斯(Norma Kassi)希望弗里德曼是错的。她希望布朗对环境做正确的事情,即便对于公司来说并非如此。同时,对于她来说,布朗应当做什么,或者可以做什么,这绝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它关乎人类的生存。

诺尔玛·卡斯最近从距离北极圈北边60英里的遥远育空(Yukon)村庄赶到英国的伦敦,为了参加BP的年度股东大会。她只有一个目标:努力阻止公司“进入北极圈毁掉我们”。卡斯是哥威迅联盟(Gwich'in Nation)的成员之一,后者是千百年来生活在美加边境17个村庄的北极土著人。她相信在沿北极圈海岸平原上的钻探会将北美驯鹿群荡涤一空,同时还会毁掉持续了2000年的古老生活方式。^[23]

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可能就藏在沿岸平原的地下,巨大的利

润正在等待获得勘探与开采权的公司。如果美国政府取消在这一区域的探勘限制，BP 是极有可能获得勘探特权的公司之一。目前 BP 已经成为这一区域的主要玩家，它在附近的普拉德霍湾业已扎根，那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田之一（宇航员说他们从外太空就能看见油井点火的光亮）。沿岸平原也是北美驯鹿群的繁衍地，每个春天，驯鹿群迁徙 400 英里，跨越山脉、河流、苔原，穿过哥威迅村落，一直沿着其他驯鹿的足迹前行，让怀孕的母鹿能够在沿岸平原产下它们的幼仔。千百年来，哥威迅一直仰赖北美驯鹿维持生计。它们不但能够为哥威迅的居民提供衣食，一年一度的迁徙更是哥威迅居民文化与精神生活的支柱。

卡斯回忆了她的家庭如何在春天来到的时候整理他们的狗拉雪橇，奔向苔原地带等候驯鹿。他们会在厚厚的冰层上搭建帐篷，用云杉枝条铺地，用烧木材的炉子取暖。妈妈会从帐篷门上的小洞里一直留意驯鹿的动静。“有时候她会走出帐篷，询问乌鸦，‘驯鹿到哪里了？’”卡斯回忆说，“我看着她，看着她的脸，就知道驯鹿是否已经走近。”卡斯的祖父和其他的猎人一起跋涉到鹿群后方，猎获那些老公鹿，而不惊动前面的怀孕母鹿。猎人们返回营地之后，有时是三四天之后，哥威迅人会迎来节日，当驯鹿通过海岸平原时，村民们会虔诚地远望。“那是献祭的时刻，安宁无比，”卡斯说，“你一定要向驯鹿表示感激。我们向母鹿献上特别的感激。我们为它们祈祷，特别是妇女。妇女会与母鹿产生内在的关联，我们能够感觉到它们作为雌性与母亲的感受。”^[24]

哥威迅人说，在海岸平原上钻探会破坏驯鹿群的生活，同时毁坏与之息息相关的哥威迅人的生活。

BP 认为他们担忧的问题没那么严重。公司的最高管理人员之一约

翰·戈尔认为，“勘探和生产都已按照最高标准来进行，对环境的影响已被减至最低，并且与这些野生动物是可以和谐共处的。”^[25]驯鹿群不但不会被石油经济的发展破坏，反而可能得到繁荣。公司的网站上有这样的说明：“普拉德霍湾地区的北极种群驯鹿在今年一段时间内的头数增长率是70年代中期刚进行开发时的6倍。”^[26]然而，很多科学家认同哥威迅人的看法，认为沿岸平原的开发很可能会对哥威迅人和北美驯鹿造成巨大的不可逆转的影响。他们指出，驯鹿会被迫向邻近的山地迁徙，在那里，新生的幼仔会因为被猛兽猎食和缺乏食物而大量死亡。鹿群因此会大规模灭绝（尽管有人持更积极的观点，认为钻探对驯鹿群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科学家们仍然得出了这个结论）。因此，数百位科学家联合环保主义者、美国政界人士、加拿大政府以及哥威迅人，呼吁对这个区域实行预防原则——这是一项国际法原则，禁止会对人类或环境产生不可逆转损害影响的行为，即便目前并无有关损害的实际证据——来禁止对沿岸平原的勘探和开发。^[27]

约翰·布朗先生正是今日世界预防原则的倡导领导人之一。当其他的石油产业领袖强调温室气体的排放会导致全球变暖毫无现实根据，并努力抵制《京都议定书》的时候，布朗援引预防原则来为该协议辩护。他认为，尽管缺乏证据，“忽视对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变暖问题日益增加的证据和忧虑，这是极端危险的。”正因如此，他拥护该协议，并建议他的公司尊重这一标准。^[28]然而，布朗似乎并不愿意将预防原则适用于沿岸平原。他拒绝了要求BP退出开发行动的呼吁，尽管有很有力的科学证据显示，如果开发继续，灾难很可能会降临在哥威迅人以及驯鹿身上。

约翰·布朗可能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甚至可能是今天大商业领域关于社会责任感的最直言不讳的倡导者之一。但是他既不激进，也

未曾违反法律规定。他很好地理解了公司法的精义：社会价值和环保价值绝非目的本身，只是提高公司商业表现的策略资源而已。“这并非源自道德伦理的突然发现，或者对于既往过错的赎罪心理，”他谈及自己的绿色议程时说，“那是为了公司的长期利益——我希望这是我们更文明的结果，但其实还是自利。”BP的社会责任感在他看来是“一桩好买卖”，“由实际的商业现实和死硬的商业逻辑驱动。”公司的善就是“我们直接的商业利益”，“这不是慈善行为，而是我们称之为文明化的自利”、“冷酷的现实主义”、“对任何公司最基本的测试”。布朗说，“业绩。这才是根本的驱动力。”^[29]

也就是说，当可能会损害公司业绩的时候，社会责任感并不合时宜。这就是为什么BP必须开发沿岸平原的原因，如果考虑到一切相关因素，它对于公司的长期发展最有益处——利润最大。在公司决策的过程中，是否会破坏驯鹿群、北极环境，或者整个原住民的生活——至少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诸如此类是不会被考虑的。公司放弃开发的代价可能是巨大的。相比来说，顾客商誉或者正面的公关活动带来的好处则相对较小。所以，如果沿岸平原向石油产业开放，只要有利可图，BP必然会出现在那里。布朗实际上也别无选择。姑且不论他个人对于环境保护事业的投入多么真诚，作为一个公司的最高执行官，布朗必须将他的公司和公司持股人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

和拒绝开发沿岸平原不同的是，BP的绿色战略相对来说不是那样代价高昂，后者旨在提高业绩，并生产出超过成本的短期和长期利益。比如，BP完成了它的许诺，没有投入净开支就贯彻了《京都议定书》的标准。^[30]其他的BP项目，例如太阳能油站、学校资助项目，以及市区清洁空气构想，都以类似的方式帮助公司以较小的代价建立起绿色形象。这些构想对BP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布朗所言，它们

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公司形象，为 BP 提供了相对于其他公司的竞争优势，给了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者一个更加绿色的选择。他说，“当一个公司与它的消费者的利益和愿望心心相印的时候，它的业绩就会提高……公司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声望对于它的商业财富有直接的影响。”^[31]

然而，BP 还试图从它的绿色形象中获取另一种长期利益。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仍然深藏地底，未被开发，布朗很清楚地知道，开发这些资源意味着多么庞大的利润。然而，消费者可能因为环境方面的考虑放弃石油和天然气的使用，转而消费替代性能源。布朗曾经说过，他相信“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开发、生产、提炼、运输以及使用碳氢化合物是绝对可能的。你可以拥有一辆动力强劲驾驶感觉一流的汽车”，同时不必担心会破坏环境。他希望消费者也这样相信。尽管公司的口号是“超越石油”，而且努力发展太阳能和其他替代性能源，但在布朗的绿色议程背后的首要目标，我们可以看到，仍然是维持消费者对汽油的需求：

我们以往有一个被石油牢牢掌握住的市场，而这样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在能源市场的任何一个领域都有新的能源在提供，即使在交通领域，燃料电池技术的发展也有可能很快就能为汽车提供其他能源的动力。所以，我们必须投入竞争，确保石油仍然是燃料选择。^[32]

更关键的是，对于布朗和所有其他大公司的领袖来说，社会和环境目标都是，也必须是为他们的公司和持股人赢得利益的策略。这些社会和环境目标绝不会成为合理的最终目的。这看上去是一幅过分狭

隘的场景，特别是考虑到公司的社会与环境构想所能够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和环境收益。但是，所有上市公司的领导人中没有任何一个打算，或者说能够被法律准许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推至更远。

辉瑞的 CEO 汉克·麦金内尔曾经说过，他希望他的公司跟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公司相比，能为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但他也承认，公司的自身利益是，也必须是公司善行背后最主要的动机。谈到公司在法拉盛街地铁站所设的安全系统时，麦金内尔说：“对于辉瑞来说，这里面存在一个非常直接的利益，那就是，为了吸引最好的员工，我们需要营造一个安全的、舒适的工作环境。人们需要能够搭乘地铁上下班。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们都不敢停留的地铁站，那么很明显，会妨碍我们雇佣到最好的员工。”在临近郊区由辉瑞赞助的学校，以及其他一系列由辉瑞发起和资助的教育项目，也都是和“我们自己的企业”紧密相连的。麦金内尔说：“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庞大的按照我们的商业模式、科学和数学训练出来的雇员候选队伍，我们的生意不会这么成功。”^[33]

以同样的方式，麦金内尔解释了辉瑞的免费药项目如何使公司获得收益。他强调，公司只需投入少许——“药品的边际成本是很低的，所以如果我们将药送给那些本来就买不起药的人，这一行动对于公司利润的影响几乎是零。”然而，这一行动对辉瑞的好处却是实实在在的。这些项目让辉瑞在医生群体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而医生正是辉瑞产品的主要传播者。这些项目让医生们“意识到，我们一直和他们并肩工作，帮助他们解决难题”。这些项目在员工的问题上也帮助了辉瑞，例如他们的士气、创造力，以及对优秀工人的吸引力——这全都要看员工是否喜欢他们的公司。麦金内尔说，“既实现了高额的利

润，又为社会福利作出了贡献，这对在这里工作的人们来说很重要……这让我们的员工感到非常的骄傲，我们能够为本来无法获得治疗的人提供有效的药物。”^[34]

最后，辉瑞能够记下他们为慈善事业提供免费药物的数额，从而在税收上省回这笔钱。很难精确知道辉瑞到底节省了多少，汉克·麦金内尔也不打算公布这些数字。但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无国界医师组织估计，由于政府得给制药公司退税，比起通过援助项目直接发送药品来，实际上美国的纳税人花费了四倍的金钱来捐赠氟康唑给南非（假设这些公司已经降价卖药给各国政府）。^[35]

“我们的首要任务，”麦金内尔说，“是维持企业的运转，当然，这需要利润。”免费药物项目并未阻碍这一任务的实施，相反，它们促进了后者——真是一个行善得福的经典案例。“我有能力让持股人收益，同时也在实际上造福于许多地区。”他声称，“我们能够同时满足我们的持股人和穷人的需要。”但是，如果辉瑞的首要任务是维持企业的运转——促进企业的收益——麦金内尔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满足世界上穷人的需要呢？不会很多。因为，按照他自己同时也是公司的逻辑，只有那些能够让公司获利的药品种类才会被跟踪研究下去，而那些没办法带给企业利润的药品则不会得到继续开发。^[36]

这就是为什么无国界医师组织在非洲国家马里（Mali）建立自己的颗粒性结膜炎治疗项目的原因。它对辉瑞的免费阿奇霉素供应说“不”。相反，他们以购买的方式进口这种药的一个仿制版本。该组织的雷切尔·科恩解释说，“如果辉瑞哪一天决定撤离这个国家，或者撤销它们的援助计划，或者因为某种原因削减供应……我们能够确保这个国家的人们仍然可以获得这种药物。”其他免费药物项目在制药公司放弃生产特定药物的风险前也同样不堪一击。“如果持股人的意愿有所

变动，如果媒体的关注点不再集中于非洲的艾滋病，”柯恩指出，“如果辉瑞就此放弃大扶康或者氟康唑捐赠之类的计划，那么这里的人们该怎么办？”^[37]

对于公司帮助穷人的能力来说，援助的不可依赖性还不是惟一的、甚至最重要的限制。更根本的问题是公司的需求——辉瑞和它的持股人从治疗秃头和性无能的药物中赚的钱要比从治疗如疟疾和肺结核这些在发展中国家导致人们死亡的主要疾病中赚得多得多。辉瑞和其他制药公司可能拥有足够的技术和物质能力，在开发和制造治疗这些杀手病症的药物上投入更多精力。尽管这些药物更能造福世界，每年拯救百万条生命，但是对任何一个公司而言，开发这些药物的成本可能都要超过它们带来的收益。柯恩说，这是因为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占世界人口 80% 的人群仅仅占有全球药品市场的 20% 的份额（整个非洲大陆仅仅占有全球 13% 的市场）。相反，居住在北美、欧洲以及日本的占世界人口 20% 的人群则构成了全球市场的 80%。可以想见，1975—1999 年之间开发出的 1 400 种新药中，只有 13 种是专门用来治疗热带疾病（tropical diseases）的，只有 3 种用来治疗肺结核。2000 年，没有一种新药被开发用来治疗肺结核，同时却有 8 种用来治疗性无能或勃起障碍，7 种用来治疗秃头。开发治疗家庭宠物人格障碍的药物，看来比开发用来控制每年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的疾病的药物，更为有利可图。^[38]

无论关于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团体的话被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也无论领导医药公司的汉克·麦金内尔之流有多么善良的情操和目的，无论公司已经启动了多少善良的项目，无论多少人会因此从可怕的死亡中被拯救，追逐利润的公司生产药物还是为了利润。这是它们的底线。



因此，从汤姆·克莱因的故事中我们得学到点教训了，在节目中，他想演示辉瑞公司装在法拉盛大街地铁站的安全系统，当他按下黄盒子上的按钮，说“喂，喂，我是汤姆·克莱因”的时候，却没有任何回应。月台上别处的盒子也是如此。最后他放弃了，并且大声抱怨原本应当随时就绪的辉瑞安全系统到底怎么了。^[39]

公司的社会责任感就像这些呼叫盒。它承诺要提供帮助，好让人们放心，并且有时候确实会起作用。然而，我们不应当对它抱太多期望。一个公司只有在帮助自己获利的前提下才能做好事，这是它行善的一个基本限度。这也就是害怕沿岸平原的开发会带来毁灭性后果的卡斯和她的哥威迅族所面对的现实，也是因为必需的药物开发缺乏利润而死于无法医治的疾病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所面对的现实。那些关于社会责任的慈善言行，创造出了具有吸引力的公司形象，这可能也对世界有所助益。然而，它们不会改变公司根本的组织性质：它对自身利益永不动摇的追求。

大多数运作公司的人都是好人，是讲道德的人。他们也为人父母，是爱人，是朋友，在各自的共同体内都是出色的公民，他们经常拥有善良的、有时候甚至是理想化的意图。他们中的许多人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相信他们的工作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尽管他们有这样的个人品质和意图，但是，他们作为公司执行者的义务同样很明确：他们必须始终以公司的利益最大化为先，而非为了任何其他人的利益，除非这种关怀的表达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公司自身的利益。他们所管理和投资的金钱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如果动用这笔钱去治疗得病的人，拯救环境，救助饥饿的人群，那也不比给自己在托斯卡纳买别墅更有道理。

丹尼·谢克特 (Danny Schecter) 是一位曾为包括 ABC 和 CNN 在内的大公司工作过的知名记者，他的观点是：“公司由人组成，由人来作出决策。不是所有在大公司工作的人都是坏人，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欲望去剥削他人……但另一方面，这里有一个生意的逻辑，一个适用于所有公司的逻辑：如果一些价值被强调另一些则会被压制，而正是那些触碰底线的价值会被强调。”^[40]

正如道德哲学家亚历代尔·麦金太尔 (Alisdair MacIntyre) 观察到的，这一动态过程的结果就是，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道德关怀最好处于边缘地位，作为公民或者消费者、而非管理者的时候再考虑。”如果说商业人士的决定必须首先服务于他们所在的公司以及公司所有者的利益，这种说法很少有商业人士会反驳。就像固特异轮胎的前 CEO 萨米尔·吉巴拉所说：“如果你真的按照内心的想法和优先序列去做些事情，那你会与众不同。但是作为一个 CEO，你不能那样做。”^[41]

然而，安妮塔·罗迪克 (Anita Roddick) 相信，正是这种在商业世界和生活世界间的道德分歧造成了商业人士以及他们所运作的公司的堕落。作为 Body Shop 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她曾为自己逃脱这一宿命的事实而深感自豪，因此她为自己的书取了这样一个名字：“不寻常的商业：安妮塔·罗迪克的凯旋” (*Business as Unusual: The Triumph of Anita Roddick*)。然而，最近罗迪克听上去就没那么自豪了。“过去的三年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光。我失去了隐私，失去了能倾听我的人，这教给我谦卑。”^[42]

从在自家厨房里开设香皂作坊，直到成为 Body Shop 的领袖和世界上最成功的女商业人士，罗迪克始终拒绝将她的个人价值观与她的事业分离开来。正是这一点让她的事业变得与众不同。“我只希望在家

庭之外有片天地，我希望能够投入工作，”她说道，“我始终不把公司看成我的财产，而是看成我的知己。”Body Shop成为罗迪克激进世界观的一个平台。“如果将赚钱看成是商业的所有目标所在，你就是在背叛你的知己，可耻的背叛。在你的社区内做最好的自己，成为社区的灯塔。”她开创了一个又一个项目，支持了一项又一项事业——人权、环保、社会正义、妇女权利。^[43]

1982年，Body Shop的一项公开募股计划在伦敦股票交易所实施。罗迪克需要资金来发展Body Shop，公开上市是获得资金注入的最好途径。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投资者的压力下，Body Shop不得不检讨她的管理，并采纳了一个新的商业计划。帕特里克·古内（Patrick Gournay）开始执掌公司的领导事务，公司按照提高业绩与效率的方向进行了重组。当这些变动没有损及公司的激进价值观与行动时，罗迪克诚实地说：“他们参与并规范了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44]——现在回顾当初的公开上市（它不可避免地受到投资人的详细审查），就好像“跟魔鬼签约”，她说，“好，你的公司上市了，那么从此公司的动机就只是增长——根据一小群人的标准，一群赌徒般的金融投资人的标准增长……跟在赌场一样。”^[45]

WTO的西雅图示威抗议兴起之时，情况发展到了顶峰，仍然担任公司联合主席的罗迪克希望Body Shop在反抗WTO的队伍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于她来说，这是推行自己一贯主张的机会：以她的商业作为推广她的价值观的平台。但是公司拒绝了她的要求。“我想让我的每一家店都挑战WTO，但它们不会这样做。”这时，罗迪克才意识到她曾经离经叛道的、非主流的、不同寻常的Body Shop已经变得泯然众人。她希望重新获得对公司的控制权，她说，“我保证，我们将会再次变得私人化。”因为她相信，这是她，以及公司的社会责任再次凯旋的

惟一方式。^[46]

在罗迪克和我们交谈过不久，Body Shop 被挂牌出售，这是公司利润下降、股价下跌之后不得不走的一步。尽管她希望潜在的买家都能分享她的社会价值观，但公司明确表明，一共拥有公司 24% 的股份的罗迪克和她的丈夫戈登（另一位创始人伊恩·麦克格林拥有差不多的份额）必须对所有买家都一视同仁。公司一位发言人称，“他们非常在意他们对所有平等的持股人的法律、道德以及金融上的责任感。”一家墨西哥企业最终决定以 2.9 亿英镑买下这家公司，这次交易如果成功，会带给罗迪克夫妇 4 300 万英镑的收入，但是最后，由于未能提供可靠的财务保障，交易失败了。这次交易失败后，公司取消了出售计划，并进行重组以提高效率。罗迪克夫妇从联合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安妮塔保留公司的顾问职位，但只有一张为期两年、每年工作 55—80 天的合约。同时，新的执行主席艾德里安·贝拉米（Adrian Bellamy）像是跟投资者保证一样，宣布罗迪克的社会协作感不再是 Body Shop 的重要组成部分了：“我们相信社会责任感，但我们更踏实地关注利润。我们知道成功终究要靠企业基本面来衡量。”^[47]

罗迪克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管理者的道德关怀和利他倾向必须最终让位于公司的根本目标。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例子。公司以及公司所创造的文化绝不仅仅会扼杀良好的社会行为——它们滋养，并往往召唤与之相反的那些事情。

马克·巴里（Marc Barry）对此知之甚详，但他却并未受其困扰。

马克·巴里，一位竞争情报专家（“从本质上来说，我是个间谍，”他说），喜欢把自己说成是一个优秀的约会专家。“我喜欢能够不断外出，与其他人共享晚餐。在我的工作当中，有很多圈套和欺骗



的手段，都是我在私人生活中无论如何不愿意出现的。”巴里说，上班的时候，他是从事道德立场相当可疑的任务的捕食动物。公司雇用他从其他公司那里获取情报，交易秘密、市场计划，或者其他一切可能对客户公司有利的信息。在工作过程中，他说谎、哄骗、利用他人。他曾经开设一家假冒的新公司，桌子底下压着冒充他家庭成员的照片，打电话给竞争对手的执行官，许诺给他们更好的待遇。“当那个执行官出现的时候，”他夸耀地说，“他并未意识到……我确实代表一家竞争公司在听他说话……这是一个处心积虑要从他那里搜集竞争情报的大计谋。”巴里也曾经受一家庞大的跨国公司的委托，假装风险投资者从一个年轻发明者那里窃取关于在手机上传递视频的技术信息。对巴里来说，在办公室度过的任何一天，看上去无比正常，但实际上都充满了收买行为和道德败坏。^[48]

然而，巴里仍然相信自己是一个正派的人，因为他能够使职业与私人生活泾渭分明。“我不希望我的私人生活变成这样，”他说，“我正在寻找一种东西，它要更纯粹一点。”道德关怀在他的工作中缺位，但这并不妨碍它在巴里的私人生活起作用。尽管他承认：“会有一些女性满世界找我，然后告诉我，我还没有将工作与私人生活分得非常清楚。”但他的私人生活中的道德因素不会影响他的工作。“我能去迈阿密的一次会展上从某个执行官那儿偷点消息来，而不巧我就知道了这家公司六个月内就要出局，然后我能马上回家，并且睡得像个孩子一样香甜。你知道，这不是什么大事，因为这是生意。”他说，“要安身立命，就得过一种把不同范围的事情分割清楚的生活。”^[49]

令巴里感到还算安慰的是，他并不比那些雇用他的那些顶尖公司的CEO们更不道德（他承认曾经为财富世界500强中四分之一的公司工作过）。他说：“如果你是一个CEO，你认为你的持股人们会真的在

乎你究竟是不是天真善良吗？他们会真的希望你是一个好人多过希望你多放银子在他们的口袋吗？我根本不相信。我认为人们都需要钱。这才是底线。”贪婪和道德冷漠是公司世界的文化标志，巴里说，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生意这么红火的原因。CEO 们都背负着为持股人增加价值的重任，公司必须做一切可以做到的事情来变得更有竞争力。巴里说：“任何了解我的人都知道，在使用诡计和欺骗来弄到信息方面我是一把好手。”当 CEO 们雇用他并且告诉他要遵守伦理规则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他说：“我有个昵称，叫‘风筝’。就是说，我能让风筝飞得很远，收集我想要的任何信息。当暴风雨来临之前，也就是诉讼或者检察官之类可能找上门的时候，我必须剪断风筝线，让它随风飞去，不留痕迹。”^[50]

巴里道德分裂的生活正是安妮塔·罗迪克在 Body Shop 努力避免的，当然她没有成功。她和巴里可能永远不会成为朋友或者共进晚餐，然而，这两个人确实存在共同点：认为公司世界是无道德的。巴里接受这一点，而罗迪克对之表示遗憾。但无论态度如何，他们都相信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罗迪克批评说，“对利润最大化的信仰”导致商业的非道德化，逼迫原本善良的人们去做下流的事情。“因为必须利润最大化……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在追求这个目标的前提下才能被合法化，所有的一切……所以使用童工或开设血汗工厂、毁灭环境……在利润最大化的背景下都是合理的。同样，只要能使利润最大化，一次解雇 15 000 名员工，让整个社区陷入痛苦，也是合理的。”

做出这些事情的经理人们并不是洪水猛兽，罗迪克说。他们可能都是善良而富有友爱之心的人，是充满爱心的父母和朋友。然而，正如哲学家亚历代尔·麦金太尔所观察到的——巴里亲身经历的——他们把生活完全分成不同部分。在公司文化背景下，他们被允许，往往

是被迫让自己与自己所秉持的价值观分离。按照罗迪克的说法，公司“阻止人们拥有对人类处境的同情心”，它“让我们与我们的本性分离……”。她说，“它是一种漠不关心的、独善其身的、秘而不宣的、等级分明的语言。”它“在我们之中很多人身上传播着精神分裂”。^[51]

正如罗迪克以上评论所指出的，与法律或经济学相比，心理学可能会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关于商业经理人双重道德生活的解释。为此，我们咨询了罗伯特·黑尔博士（Dr. Robert Hare），一位国际知名的变态心理学专家。他告诉我们，当人们作为公司的执行者时，他们采取的态度以及做出的行为可以被归入变态心理学的范畴。作为公司的执行人员，你会努力“毁灭你的竞争者，或者想要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击败他们”。黑尔的观点与罗迪克和巴里如出一辙：“只要公众买你的产品，你根本不会特别在意这会对一般的大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然而，尽管经理人必须时常利用他人，并且伤害他们的利益，在追求其公司目标的过程中，黑尔并不认为他们是精神病人。这是因为他们在公司之外的世界里依然能够正常生活——“他们回家后，仍拥有温馨的家庭关系，他们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妻子，他们真诚地对待朋友，不存利用之心。”生意人能把身处公司内外时的道德需求截然分开，因此还能获得些安慰。正是罗迪克所说的这种精神分裂使他们免于成为真正的变态。^[52]

然而，公司自身可能并不会如此轻易地逃脱精神病的标签。与置身于其中的人不同的是，公司异乎寻常的自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感觉到对其他人的真实情感。因此，并不令人惊奇的是，当我们请黑尔博士运用他的精神变态特征检查表来诊断公司的机构特性时，他

发现二者是非常近似的。黑尔说，公司是靠不住的，因为“若要满足公司本身的目标，它会让其他所有人都置身风险当中”。公司都试图“利用一切事物，包括公众意见”。公司也是自大狂，总是坚持“我们是老大，我们是最好的”。缺乏同情心和亲近社会的愿望也是公司的关键特征。黑尔说：“它们的行为表明它们从不真正关心他们的受害者。”此外，公司时常拒绝为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它们从不自责，“如果公司被抓住违反了法律，它们会付出巨额罚款，然后接着跟以前一样。事实上，在许多案例中，对公司的罚金和刑罚相对于它们获得的利润来说，是微不足道的。”^[53]

最后，按照黑尔博士的观点，公司仅在非常表面的程度上与其他人产生关联——“它们的所有目标就是让自己以一种能够吸引公众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而事实上，这种形象根本不能代表这种组织的实质。”我们都知道精神病人会努力显得迷人，以掩盖他们困扰自己的危险个性。对公司来说，社会责任感可能扮演着同样的角色。通过社会责任感，公司能够将自己打扮成一个富于同情心并关怀他人的形象，尽管事实上，它们根本不能关心任何自己之外的人或事。^[54]

拿最大也是最知名的能源公司做个例子。它曾经是社会责任和公司慈善事业的模范，每年公司都会推出一份公司社会责任的年度报告。最近的一份，很不幸也是最后的一份，发誓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并且支持签订多边协议来帮助阻止气候变化。公司更保证要将人权、环境保护、原住民权益和透明度放到公司商业运作的核心位置，它还创造了一个人员精干的公司社会责任特遣小组来指导和完成它的社会责任项目。公司大力宣传它在寻找替代性能源方面的进展，以及它协助建立可持续能源商界发展委员会（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Energy）的事实。它为在南非发生的29 000桶石油的泄漏事故

表示深深的歉意，承诺它将永不会让类似的事件发生，报告说它已经与众多环保 NGO 组织结成了合作关系，帮助指导它的运作。它还描绘了它为自己所在城市的社区提供的慷慨支持，资助艺术组织、博物馆、教育机构、环保组织以及世界各地的各种事业。作为一直以来都被评为美国最佳工作地点的公司，它强力推进工作场所的多样性。报告宣称，“我们相信，公司的领导将会成为社会服务的典范。”^[55]

不幸的是，这个公司社会责任感的模范——安然，在管理层的贪欲、傲慢和犯罪行为下终于崩溃，已经不再能够继续这种善行。安然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公司精心打造的大好人形象和它的实际运作之间鸿沟是多么宽广，并且提示我们，至少，对公司责任感的怀疑主义很正当。

然而，从安然事件当中，人们除了学会对公司的社会责任感持怀疑态度之外，还能获得一个更大的经验教训。尽管人人都已熟知安然的傲慢和那些品行有问题的执行官，公司倒台的深层原因还是要追溯到所有公司的共同特征：迷恋利润和股票价格，贪婪，缺乏对他人的关怀，倾向于挑战法律规定。反过来，这些特征又都植根于公司自利、无视道义责任的制度特征。毫无疑问，安然将这些特征发挥到了极致——事实上，到了自我毁灭的程度——公司因此声名狼藉。然而这算不上什么偶然事件，因为安然一开始就具有这样的特性。毋宁说，安然的垮台最好被理解为一种直观的展示，告诉我们当那些被正常接受并且认可的公司特征被推到极端情况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换句话说，这并不像辉瑞的汉克·麦金内尔所描述的以及许多评论者所相信的那样，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相反，它是公司制度化特征方面先天缺陷的表现。^[56]

3. 外部化的机器

作为一个精神错乱的造物，公司既不能主动意识到道德方面的问题，也无法考虑这些问题以避免伤害他人。在追求自利目标的过程中，它的法定组织结构中没有什么能够限制它对其他人的作为，当损害他人的好处多过成本的时候，公司就一定会放手去做。只有关于它自身利益的实用主义的考虑，以及当地的法律才能限制公司的掠夺性本能，有时候甚至这些都不足以阻止公司破坏人们的生计、毁坏环境，甚至危及整个地球。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安然的倒台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司丑闻破坏了公司本身的利益，因为持股人作为法律规定的公司必须服务的人群，事实上也是惟一的人群，正是安然事件众多受害者中的首当其冲者。在公司的世界里，更为常见的是它们的病态趋向给其他人造成的伤害：工人、消费者、社区以及环境。这些一般被认为是公司行为的不可避免、可以接受的影响——用经济学冷酷的专业术语来说——“外部性”。

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说：“外部性就是一个交易对第三方所造成的影响……而这个第三方既没有赞成这笔交易，也没有参与进来。”公司无情但合法地追求自利的行为造成的对人们以及环境的损害，就这样被经济学家巧妙地归为外部性——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其

他人的事情。弗里德曼举了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一个人，他的衬衫被电厂排放出来的烟尘弄脏了。因此，由于电厂的行为，这个人支付了成本——清洗脏衬衫的成本和穿脏衬衫带来的不方便之处。然而同时，拥有这家电厂的公司却因为无需设立更高的烟囱，也无须装设更好的过滤器，或是找个造成污染较少的位置，或是采取其他要花钱的措施以免弄脏人们的衬衣。公司节省了大笔金钱，因而获利。^[1]

然而，除了脏衬衫的例子，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公司的外部性“对于全世界而言，还产生了数不清的影响”^[2]，尽管这些影响中也有正面的成分——出于公司自利的动机，创造了工作机会，开发出有用的产品——但我们仍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司将自身成本外部化的本质冲动正是当今世界许多社会与环境问题的根源。它使得公司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组织形式，正如帕特里夏·安德森（Patricia Anderson）痛苦地发现的那样。

1993年圣诞漆黑的凌晨，帕特里夏·安德森结束午夜的喧闹，驾车回家，在她那辆1979年出厂的雪佛兰Malibu车的后座上，坐着她的四个孩子，最小的六岁，最大的十五岁。她在红灯路口停了车，一辆车忽然撞上她的车尾，导致爆炸起火。安德森和她的孩子们都遭受了可怕而惨不忍睹的二级或三级烧伤（醉酒的肇事司机仅有轻微伤害）。她的三个孩子身体的60%以上部位被烧伤，其中一个不得不截肢。万幸的是没有人死亡——“感谢上帝，我和我的孩子们都活着。”安德森决定就爆炸和起火的问题起诉通用汽车。她的律师提出，安德森Malibu车的油箱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以避免后车撞击带来的损害。^[3]

经历了漫长的诉讼之后，法庭认为，通用汽车为节约成本，把油箱装在尾部，这是相当危险的做法，之后洛杉矶高等法院的法官欧内

斯特·G.威廉姆斯 (Ernest G. Williams) 也支持了这一判决 (尽管他减少了赔偿数额)。“法庭认为,有清晰而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这一款车上,被告为利润的最大化而将油箱置于轮轴之后——却忽略了公众的安全,”法官据此认定通用汽车违反了相关法律。安德森女士的 Malibu 车油箱距离后保险杠 11 英寸,前一年出产的更大一些的 Malibu 车型油箱则距离后保险杠 20 英寸。1969 公司的一个内部指令曾经建议油箱距离后保险杠至少要有 17 英寸。而且,在 1979 年的款型中,没有金属柱来将油箱和汽车的尾部分离开来,而这在前一年的款型中是一个标准设置。^[4]

诉讼中提交的证据显示,通用汽车在设计 Malibu 以及其他款型汽车时,都已经意识到油箱起火的可能性。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已有 6 起有关油箱起火事件的诉讼,70 年代则又增加了 25 起。1972 年 5 月,一位通用的分析师预测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此类诉讼将再增加 60 起。1973 年 6 月 6 日,也就是通用汽车计划推出新的更小型 Malibu 的前后,即安德森驾驶的车型,管理层要求公司高级设计部工程师爱德华·C.艾维分析通用汽车的油料引燃问题。不久后,他提交了一份报告,“关于车辆油料引燃火灾相关问题的价值分析”。^[5]

在该份报告中,艾维把每年通用汽车可能因油料引燃而起的事故数目 500 乘上 200 000 美元 (即他估计每起潜在的事故通用汽车需要支付的法定赔偿金),然后把这个数字除以 41 000 000,即当时在美国公路上运行着的通用产汽车的总数。他总结说,因为油料引燃的事故支出如果平摊到每辆车头上,通用汽车需要承担 2.40 美元。在这份报告里,计算公式如下:

$$\frac{500 \text{ 起事故} \times 200\,000 \text{ 美元/每起事故}}{41\,000\,000 \text{ 辆}} = 2.40 \text{ 美元/辆}$$

根据通用汽车公司测算，通用确保油箱不会在碰撞中爆炸的成本是每辆车 8.59 美元，这就意味着，如果它放任人们在油箱起火中死亡，而不是努力去改变汽车的设计来避免大火，就可以在每辆车上节省 6.19 美元（8.59 美元减去 2.40 美元）。^[6]

就像法官所指出的，陪审团认定通用的行为应受道义谴责，且违反了相关法律，因为它将利润置于公共安全之上。安德森和她的孩子们（还有一个正好在车上的朋友）因此获得了总共 1.07 亿美元的损害赔偿，以及 4.8 亿美元的强制赔偿金，这在此类产品责任案件中是前所未有的。通过庭外和解，通用汽车把赔偿总额降到了 12 亿美元，并在加州上诉法庭对这项判决提起了上诉。^[7]为支持这项上诉，美国商会——大企业的利益代表和主导性的声音，为公司决策过程中的成本—利润分析模式进行了辩护。按照商会的说法，法庭的决定是一个“不合逻辑的结论”，它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制造商不应当遵循成本—利润分析模式来思考，”并且暗示成本—利润分析模式“本身是卑鄙的”，而这些都让人“深深为之困扰”。商会认为，成本—利润分析模式是“公司正确行为的标志”，“是无可指摘的正确逻辑。”^[8]

成本—利润分析模式是公司决策行为的核心原则，美国商会在这一点上完全正确。如某位法律学者所言，“（在类似安德森 v.通用汽车的案件中），制造商要为自己的决策辩护，就得说明在安全性能上的净增长会比不上成本上的增长或是改动设计所造成的效用损失。”^[9]公司的制度外壳，也就是它为自身经济利益而非其他一切目标而服务的冲动，要求管理者们必须做出这样的决策：创造出比公司成本更高的利润。管理者们没有权力来考虑这样的决定究竟对其他人构成了什么样的损害，比如对安德森和她的孩子们，或者对自然环境造成多大的影响，除非这些可能对公司自身的利益造成负面影响。哲学家亚历代

尔·麦金太尔指出：“一旦公司开始运作，公司的目标就必须坚定不移……不同的任务对他来说不过是技术问题。他不得不计算最有效率的最经济的方式，来动员现有资源制造利润……以最小的成本。成本和利润的考量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任务，这本身就是商业的本质。”^[10]

尽管爱德华·C.艾维在他的报告中承认，“主观上来看，人身灾难确实是超越价值衡量的，”“我们不可能为人命估算价值，”但是他同样明了，对他而言，若要完成他的分析报告，不对人命估算价值同样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被要求为公司在有关油箱放置位置问题的决策中提供有用信息的分析师，他的任务就是“以客观的方式”为人的生命标定价值，就像他在报告中所做的一样，为人命标上价钱。^[11]

另一方面，陪审团在安德森案件中，拒绝承认公司的制度假设。相反，它选择站在人类道德神圣不可侵犯的立场上，对通用汽车公司的行为作出判决。美国商会在加州上诉法庭内的意见书认为，这是法庭的错误。它认为，陪审员们“在涉及复杂工程技术问题的案件中，在作出确切的风险—效用认定的过程中，并未采取正确的立场”，他们“时常因为见到受伤的原告就被误导”，他们“倾向于批评任何以金钱价值衡量人命的行为”，他们过于轻易地被经验丰富的原告律师牵着走，感受所谓“生命神圣的传统公众意见”，认为“风险—效用平衡是可怕又无情的东西”。换句话说，这一案件的法官们错误地认为生命就只是生命，比如家庭、爱、友情、欢乐，或者其他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人生价值。商会认为，他们在裁定通用汽车公司缺乏人性的时候表现得过于人性，拒绝将生命转变为一场数字博弈。^[12]

然而，通用汽车公司并非例外。在所有的公司决策过程中，生命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丰盛与脆弱感都必须通过成本—利润分析的抽象计算，被转化成可见的数字。关于这一点，查尔斯·克纳汉（Charles



Kernaghan) 在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国参观垃圾处理场的时候有切身的体会。

克纳汉发现，跟着垃圾车到垃圾堆卸处，看看他们到底留下了什么，对于探究新的全球经济中工厂的地址，以及工厂中究竟在做什么，非常有帮助。克纳汉是全国劳工委员会（National Labor Committee）的领导人，这是一个被授权阻止美国公司使用血汗劳工的组织，它们所监控的工厂都位于劳动力廉价易受剥削的贫穷国家。拜那些因自由化的国际贸易法规、新的通讯和运输技术而享有更大自由空间的公司们所赐，这些工厂在此为西方工业国家生产无数的轻工产品，^[13]并被利用它们的美国和欧洲大公司视为机密，紧藏起来。“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隐藏起这些工厂和血汗劳工，”克纳汉说，这些公司也拒绝透露这些工厂的名字和地址，“因为他们知道，锁在紧锁的铁门和带刺的铁丝网背后，被武装看守的童工最容易被剥削。”^[14]

克纳汉在一次垃圾场之旅中找到了宝——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垃圾车倒下来的盒子里发现了一份耐克内部定价文件。这些文件和艾维的报告一样，充满了各种冷酷的计算与衡量，目的在于从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里为耐克缝制外套的女孩和妇女身上榨出最大限度的利润。举个例子，一件衬衣的生产被分成22个独立的环节：5个环节来裁剪布料，11个环节来缝制外套，6个环节来贴商标，挂吊牌，将衬衣装进塑料包装袋，准备运输。每个环节都规定了具体的时间，以万分之一秒的精度进行细分。包括了所有的步骤，文件中的计算方式要求每件衬衣的制造时间最多为6.6分钟——也就是说，制造一件在美国卖到22.99美元的耐克衬衣，所耗费的劳动价值仅为8美分。^[15]

“剥削的科学”，克纳汉这样来称呼这些定价文件。他说，它们冷

酷的计算方式掩盖了生产过程中的苦痛和悲惨的情形。克纳汉访问过的最典型的工厂，在洪都拉斯或者尼加拉瓜、中国以及孟加拉国，都有装满倒刺的铁丝网围墙。在紧锁的大门背后，年幼的女工被监工指挥着工作，她们经常被拳打脚踢，甚至因为最微不足道的原因而被羞辱，如果在强行进行的检查中被证明怀孕，她们就会被开除。工人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订裤耳、缝袖子——一天可能要重复两千次。他们12—14个小时一班，在刺眼的光线下、过于闷热的厂房中连续工作，允许上厕所的休息时间非常少，限制喝水（为了减少去厕所的次数），到了无论如何都不足以维持人的正常需求的地步。“这里不需要你有感觉，不需要你有梦想，”克纳汉谈起这些工厂的主人时说，年轻的妇女“工作到25岁就会被开除，因为已经被榨干了。她们已经毫无用处，生命已经终结。公司会重新雇佣新一批的年轻女孩来代替她们”。^[16]

尽管克纳汉在发展中世界中看到各种离奇见闻——其中的某些甚至接近超现实主义的想像，比如他在洪都拉斯的一条高速路上看见标着“南安普敦学区”的类似校巴的车辆拉着孩子们去一家工厂为GAP缝制服装——让克纳汉印象最深刻的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某日曼哈顿第51街和麦迪逊大街的交汇路口。在那儿，这名社会活动家蜷缩在一栋大楼背后，跟一个吓坏了的16岁女孩躲在一起，她是一名来自洪都拉斯的血汗童工，名叫温蒂·迪亚兹。他们的眼睛紧盯着街对面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主教家的房门。克纳汉说，当时他们两个“被吓得要死”，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17]

克纳汉和迪亚兹第一次相遇是在泛美公路洪都拉斯段的一个餐饮店里，距离迪亚兹工作的工厂大概100码。迪亚兹和一群童工不堪忍受工厂里恶劣的工作条件，联系到克纳汉，并且要求与他会面。克纳

汉同意在餐饮店与这些女孩子们见面。他们在一片木篱笆里面找到一个藏身的地方，没有人能看见他们，或者只是他们自己这样认为。“我们正要开始会谈，”克纳汉说，“忽然进来了三个人，长相凶恶。”女孩子们吓得跳起来，告诉克纳汉这些人是探子，随即四散奔逃。

他们离去后，一些女孩子悄悄地在桌底下把藏在手心里的工资单存根递给克纳汉。“我一直等到没有人了才拿出来看，”他回忆说，“在我手心里，是一张凯茜·李·吉福德（Kathie Lee Gifford）的脸，”这张脸印在工资单存根上，显示出这些女孩子在为谁工作。现在，克纳汉第一次知道是谁在掠夺温蒂·迪亚兹和她的小伙伴们在“环球时尚”工厂里创造的利润。是沃尔玛，售卖凯茜·李·吉福德系列服装的超级零售商。于是，克纳汉联系了沃尔玛和吉福德，迫使他们与自己对话。位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主教住宅被选中作为会谈的中立地点，正是这次会谈让克纳汉和迪亚兹来到 51 街和麦迪逊大道的这个路口。^[18]

他们早早地就到了，但是在吉福德到来之前，一想到要跟这样一个大名人进行一次交锋，他们就很惶恐，甚至跑过街道，想藏起来。当吉福德出现在主教住宅门口侧面的会面地时，他们终于鼓起足够的勇气走出来，参加会谈。在那里，迪亚兹向吉福德讲述了她自己的故事，从她 13 岁时在洪都拉斯的血汗工厂里为美国的公司缝合衣服开始——每天 13 个小时的工作，少得可怜的工资，来自监工的非人待遇和身体上的伤害，每天晚上她和朋友们一起边吹口哨边唱歌，跑过漆黑的街道，企盼强奸犯能够放她们一马，忍着饥饿上床睡觉。克纳汉说：“这是我所见过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这位著名人士俯下身子，说：‘温蒂，请相信我，我并不知道存在这样的事情。从现在开始，我保证，我将与你一起努力，将与其他人一起努力。这样的事情将再也

不会发生。’”^[19]

克纳汉说道，当天晚上诞生了一份协议，载有凯茜·李·吉福德的亲笔签名。在这份协议中，吉福德保证将不会再有血汗工厂，要为工人提供优厚的工资，允许独立的检查员进入工厂，以确保在工厂内人权与劳动法得到尊重。

然而，克纳汉很清楚，沃尔玛将继续在发展中国家使用血汗工人，尽管它已经开始在供应商处布置独立观察员。他指出，沃尔玛在中国大概有4400家供应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肯定是血汗工厂。他的这个判断得到了《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调查的支持，这项调查发现，直到1999年，在中国制造的凯茜·李手袋仍然是在血汗工厂生产的，那里的工人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每月30天。一旦有一点怨言，就会被打骂，处以罚金，甚至被开除。^[20]因此，当吉福德在协议上签名的时候，克纳汉对这样的协议究竟能产生怎样的实际效果仍然保持怀疑，这也不值得惊奇了。他猜测，公司对这个协议的反应会是：“你是什么东西？我们要支付给工人足以生活的工资？这根本不是公司系统运作的方式。”^[21]

这也根本不可能成为公司系统运作的方式。就跟病态人格一样，公司这种形式就是被设计来剥削他人、以获取利润的。这是它惟一合理的使命。从这个角度来看，温蒂·迪亚兹和遍布全球的百万劳工，被贫穷和饥饿所驱使，在可怕的条件下来为了少得令人震惊的工资卖力工作，他们已经不再被当成人来看，而只是所谓的人力资源。对完全无视道德的公司来说，他们是用来生产尽可能多的利润的工具。“对这种工具，你尽可以像对待一块铁一样，想要就用一用，不想要就扔在一边，”诺姆·乔姆斯基说道，“衡量的标准是建立在非人性的基础上的。你必须把它非人性化。这是这个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22]

这并不意味着运作公司的人就是无人性的。事实上，“这些人可能是很好的邻居……如果你与他们保持私人交往，他们可能非常正直，”克纳汉提及他在调查中所遇到的公司经理人时说。然而，他们必须服务于公司非人性的使命。克纳汉说，“是这个结构本身，整个结构将每个人都拖着跟它一起非人性化。”在这个结构的核心位置是一个简单的动力：一个公司“倾向于提高盈利能力，直到它能够让其他人来为它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埋单”，商人罗伯特·蒙克斯（Robert Monks）这样来描述公司这种机制。“经济学家则用一个很恐怖的词来描述这种情形：‘外部性’。”^[23]

蒙克斯说：“公司是一种外部性的机器，就跟鲨鱼是一个杀戮机器一样……这跟恶意善意一点关系都没有。企业生来就有那些被用来实现其设计目的的特性，就和鲨鱼一样。”蒙克斯认为，这就导致公司“对社会有非常大的潜在危险”。蒙克斯并不是那些批评公司制度的活动者、极端分子或知识分子。正相反，他是美国最重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生意人之一，是位于生意场最核心位置的局内人。蒙克斯曾经帮助众多财富 500 强公司和银行进行改革和运作，是共和党的顾问，并且两次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缅因州参议员的席位（虽然都没有成功）。他建立并主持一家国际投资银行。站在公司世界里的优势位置，蒙克斯为他在现代商业公司领域看到的情形感到非常担忧。^[24]

蒙克斯回忆起他第一次意识到公司制度存在问题的时刻。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一个晚上，他为了竞选活动投宿在一个小镇的某个汽车旅馆，半夜被惊醒，眼睛冒着怒火。他起床看向窗外，被眼前的景物惊呆了：堆积如山的白色泡沫涌向河流，河岸边就是汽车旅馆和民居。蒙克斯转身回去睡觉，第二天早晨问旅馆的服务人员夜间到底发生了

什么。这位服务人员告诉他，“你看，每天晚上纸厂都会把废料倒进河里……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处理造纸废料的方式。”蒙克斯认识这个镇上的很多人，镇长，在造纸厂工作的人，还有厂主。他说：“我知道，这里没有一个人想要污染这条河，一个也没有。但是我们仍然生活在这样的事情每天晚上都要发生的世界。”^[25]

蒙克斯在那个时候意识到，公司这样一种他已经投入了整个生命的机构，事实上是“噩梦机器”。现在他相信，“公司作为实体最大的困难在于，它天生有一种动力，让它不会去考虑组成它所在世界的有血有肉的人，在我们追求财富和繁荣的同时，我们也创造出一种将要毁灭我们的力量。”^[26]

雷·安德森（Ray Anderson）是另一位极为成功的生意人，也和蒙克斯有同样的想法。他将公司描绘成“今时今日的毁灭工具”，因为它的内在迫力要求“将一切通过漠视或忽略公共利益的方式能够外部化的成本全部外部化”。与蒙克斯一样，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商用地毯制造商 Interface Inc.的创始人和主席，安德森在事业的后期，突然对这种他一辈子投身其中的组织形式有了新的感悟。他说，在那个时刻之前，“我从未想过我们在制造产品的同时，也在对地球掠夺，或者对地球造成了某种影响。”现在他相信，“认为我们能够毫无顾忌地对地球掠夺掠夺再掠夺，浪费浪费再浪费的想法，正在让生态环境走向毁灭。”^[27]

安德森还记得他的信念发生变化是在1994年的夏天，忧虑环境保护问题在当时变成社会的一种主流，Interface Inc.的顾客开始追问公司是否会破坏自然环境。安德森回忆说：“我们当时没有答案，或者真实的答案就是‘不是那么多’。”在那个时候，安德森并没有觉得回答不出来有什么要紧，但他公司里另外有些人不这么觉得。针对他们的担

忧，他创建了一个特别小组来调查公司在全球范围的环保地位，并且同意就他个人的环保看法发表一次演讲。^[28]

安德森很快就意识到，这件事的困难之处在于，“我根本没有一个关于环保的观点……我开始流汗。呃，我该说什么？”一无材料二无灵感，绝望之下，他开始阅读一本关于生态的书。在这本书里他看到这样的说法：“对生的毁灭”——对于生物灭绝的一种表述。“它就像一支箭射中我的胸膛，”他回忆说，“我接着往下读，这支箭越插越深，最后变成一种顿悟体验，彻底改变了我的内心，以及行为模式。”“我们是罪人，都是罪人。”今日的安德森身为一个公司领袖这样说，“总有一天，像我一样的人都将被告罪。”但是现在，他拒绝那种过去曾经严重误导他的、他曾经与大多数生意领袖们共享的信念——“自然是无限的，地球……拥有无穷无尽的矿藏资源，能够无限度地承受我们的污染和浪费；与我相关的时段就是我的一生，也许只是我的职业生涯，但可以肯定不会涉及我身后；市场看不见的手将会照看一切。”安德森现在明白，单独依靠市场并不能对公司造成损害的倾向施加足够的限制，因为它“看不见……外部性，看不见那些能够被外部化并且暗自强加在其他人身上的成本”^[29]。

所有的生意人都明白，公司生来就要外部化其成本。让蒙克斯和安德森与众不同的是，他们担心这种机制会产生的影响，而不是庆祝它所取得的成就。正如他们所说，公司被精心设计（事实上是按照法律的要求），以便没有任何顾虑地将它可能对他人、社区以及自然环境造成损害带来的成本外部化。所有能够转移到其他人身上的成本对它而言都意味着利润，都是直接通往利润的捷径。安德森一家人被烧伤——外部性；温蒂·迪亚兹的被剥削和悲惨景况——外部性。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数以千计说明公司黑暗面的例子——从博帕尔毒气泄漏

事件、埃克森瓦尔德斯石油泄漏事件到大规模的员工伤亡和自然环境的缓慢恶化——都是我们为公司有内在缺陷的本性所付出的代价。^[30]

1911年的制衣厂大火灾是公司无情漠视其雇员生命的声名狼藉的例子。位于下曼哈顿制衣工厂区的工厂主把工人——大多都是年轻的移民妇女——锁在工厂里，防止他们离开工作场所，减慢工作效率。当工厂爆发大火，工人们无路可逃。其中一些人跳出窗户摔死。剩下的人留在原地，统统被烧死。一共146名工人在这场大火中丧生。仅仅两年之前，六万纽约城市制衣工人，在成立不久的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的带领下，走上街头，抗议血汗工厂的恶劣境况，低工资，以及不安全的工作环境，史称“大罢工”(The Great Revolt)。制衣厂火灾事件的爆发唤醒了更多人的警醒，50万人走上了纽约街头，抗议。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继续施加压力，要求对工人的法律保护，但直到1938年，血汗工厂、童工和家庭副业才最终被罗斯福政府以公平劳动标准法的形式明文禁止。

公平劳动标准法今天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属于典型的管制类法律，意在解决或至少减轻公司外部性所带来的问题。无论关注工人权利、环保标准还是测量标准是否意在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公平的价格或不安全的产品的侵害，管制体系都对公司剥削工人及榨取自然资源的偏好施加了法律限制，对不遵守法律的公司进行惩罚。理论上来说，公司以及实际运作公司的管理层，都被法律阻止进行不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然而，如同其他那些好理论一样，这个理论也时常对现实无能为力。

举个例子，制衣业经营者经常违反公平劳动标准法，甚至成了惯

例。近期一则关于制衣厂大火的可怕回忆里，还在工作的工人们从十层楼的窗户跳下。曼哈顿制衣区的这栋楼里有八家血汗工厂，大火来自地下室的储藏间，浓烟吞没了整栋大楼，上面楼层的工人们吓得肝胆俱裂。消防出口要么被锁死，要么被储存的设备堵塞。大楼里的灭火洒水系统早已被关闭，也没有任何出口标记或者消防用品。在大楼十层工作的皮具工人看见浓烟涌进的时候，奔向窗户，将布打成结做成绳子，试图从窗户爬下去。二月刺骨的冷空气让他一时松了手，他笔直落下，脊背撞上附近的屋顶，不久后死亡。^[31]

尽管公平劳动标准法明确禁止血汗工厂，但血汗工厂在北美依然存在，每个工厂都存在足够的火灾隐患。^[32]“血汗工厂本来于1938年就在美国被扫除得干干净净，”查尔斯·克纳汉说，但是“他们又卷土重来，变本加厉。纽约城中65%的成衣制造都是血汗工厂。5万名工人。7万家工厂中的4万5千家。我们在讨论的是每个小时只有1—2美元的工人。”^[33]洛杉矶的情况也差不多。这座城市的南端是全美国、也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血汗制衣工厂集中地，聚集了差不多16万名工人，许多人是没有合法身份的弱势移民。美国劳工部的一项调查发现，在那里，“遵守最低工资以及公平劳动标准法对超时工作以及雇用童工规定的工厂只有33%”——换句话说，67%的制衣工厂并不遵守法律。^[34]

然而，这样系统性的违法并不只在制衣业中才会出现。公司的违法行为在整个经济系统中随处可见。许多主要的公司都从事违法行为，有一些甚至是习惯性的违法，其犯罪纪录之丰富甚至连最劣迹累累的罪犯都要自愧不如。^[35]比如，通用电气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也是最受推崇的公司之一，而以下就是由《跨国监测》（*Multinational Monitor*）搜集整理的1990年到2001年间这家公司主要的一些犯

法行为：^[36]

1990·3·23：肯塔基州 Shepherdsville：通用电气以及其他公司被判决需清除当地土地和水体的聚氯联二苯污染。

1990·3·27：北卡罗来纳州 Wilmington：通用电气因歧视报告了不符合安全规定行为的员工被判两万美元罚金。

1990·5·11：纽约州 Fort Edward/Hudson Falls：通用电气被判决清理 Hudson 河的聚氯联二苯污染。

1990·7·27：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通用电气因在国防合约上欺骗政府被判罚金 3 000 万美元。

1990·10·11：纽约州 Waterford：通用电气因有机硅工厂的污染，被判罚金 17.6 万美元。

1991·5·20：华盛顿特区：通用电气因未正确检测造成空军与海军的飞机故障，被裁定赔偿 100 万美元。

1992·2·27：宾夕法尼亚州 Allentown：通用电气因核电厂的设计错误造成的损失，被裁定赔偿 8 000 万美元。

1992·3·4：加利福尼亚州 Orange County：通用电气因在处理聚氯联二苯的过程中违反工人安全条例，被判罚金 11 000

美元。

1992·3·13：北卡罗来纳州 Wilmington：通用电气因在核燃料厂违反安全条例，被判罚金 20 000 美元。

1992·5·22：伊利诺斯州：通用电气因核电厂设计错误造成的损失，被裁定赔偿 6 500 万美元。

1992·7·22：华盛顿特区：通用电气因洗钱和在非法销售喷气式战斗机给以色列的事件中有欺诈行为，被判罚金 7 000 万美元。

1992·9·13：伊利诺斯州芝加哥：通用电气因飞机坠毁造成的损失，被裁定赔偿 180 万美元。

1992·10·12：田纳西州 Nashville：通用电气因虚假宣传其灯泡所造成的损失，被裁定赔偿 165 000 美元。

1992·10·27：华盛顿特区：通用电气因在国防合约上虚报高价造成的损失，被裁定赔偿 57 万 6 215 美元。

1992·5·12：华盛顿特区：通用电气因在非法销售喷气式战斗机给以色列的事件中泄漏机密造成的损失，被裁定赔偿 1 340 万美元。

1993·3·2: 加利福尼亚州 Riverside: 通用电气及其他公司因倾倒工厂化学物质带来污染造成的损失, 被裁定赔偿 9 600 万美元。

1993·3·11: 宾夕法尼亚州 Grove city: 通用电气和其他公司被裁定清理矿山。

1993·7·18: 纽约州 Hudson Falls: 通用电气被裁定清理 Hudson 河的聚氯联二苯污染。

1993·9·16: 纽约州: 通用电气被裁定补偿商业渔夫因 Hudson 河聚氯联二苯污染造成的 700 万美元损失。

1993·10·11: 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 通用电气因灯泡的虚假广告, 被裁定返还顾客 325 万美元。

1994·2·2: 俄亥俄州 Perry: 通用电气与公用事业公司在 Perry 核电站质量问题上达成和解。

1994·3·14: 纽约州 Fort Edward: 通用电气被裁定清理 Hudson 河的沉积物污染。

1994·9·14: 华盛顿特区: 通用电气因在国防合约上虚报高价, 被判罚金 2 000 万美元。



1995·9·2：纽约州 Waterford：通用电气因空气污染和 Hudson 河的污染，被判罚金 150 万美元。

1995·9·15：佛罗里达州 Brandon：通用电气因地下水污染，被判罚金 137 000 美元。

1996·9·9：纽约州 Waterford：通用电气因违反《清洁空气法》，被判罚金 60 000 美元。

1996·10·7：北卡罗莱纳州 Hendersonville：通用电气被判决清理对土地和地下水的污染。

1996·10·8：伊利诺斯州 Cook County：通用电气被裁定赔偿 1 500 万美元为 Sioux City, Iowa 的一次空难达成和解。

1997·2·22：新罕布尔州 Somersworth：通用电气和其他公司被裁定清理地下水和公众饮水供应体系的污染。

1998·2：纽约州 Waterford：通用电气因违反污染条例，被判罚金 234 000 美元。

1998·4·20：纽约州 Waterford：通用电气因违反污染条例，被判罚金 204 000 美元。

1998·10：英国：通用电气被裁定支付 20 亿美元清除石棉和

相关的污染赔偿。

1998 · 10 · 26: Puerto Rico: 通用电气和其他公司被裁定清理饮用水供应体系的污染。

1998 · 11 · 5: 宾夕法尼亚州 South Whitehall: 通用电气和其他公司被裁定清理污染。

1999 · 2 · 24: 伊利诺斯州芝加哥: 通用电气因不公平的追债行为, 被裁定偿还消费者 1.47 亿美元。

1999 · 8 · 19: 新泽西州 Piscataway: 通用电气和其他公司被裁定清理地下水污染。

1999 · 9 · 2: 宾夕法尼亚州 Malvern: 通用电气和其他公司被裁定清理地下水污染。

1999 · 9 · 17: 纽约州 Moreau: 通用电气因水供应的聚氯联二苯污染, 被裁定重建饮用水系统。

1999 · 10 · 9: 马萨诸塞州 Pittsfield: 通用电气被裁定清理 Housatonic 河的聚氯联二苯污染。

2000 · 10 · 18: 纽约州纽约市: 通用电气和其他公司被裁定清理土地污染。



2001·1：纽约州：通用电气和其他公司因在抵押保险业务上报价过高，被裁定归还消费者400万美元。

2002·2·4：纽约州：州高等法院判定通用电气欺骗性地误导消费者在产品被召回后购买新的洗碗机，而当时通用已经向商业性顾客发送替换部件。

对于公司特有结构的批评大部分基于这样的事实：非法行为是公司世界的特产。从它的设计来看，公司的形式总的来说要保护拥有以及运作公司的人免于承担法律责任，而让公司——一个对法律约束持极端轻视态度的“法人”成为刑事制裁的主要靶子。持股人无需为公司所犯的罪行负责，这是因为有限责任制度的存在，这种制度设计惟一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免于为公司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从传统上来说，董事受到保护，因为他们没有直接参与将公司导向犯罪方向的决策。经理人也受到保护，因为除非证明他们就是公司犯罪行为背后“直接意志”的来源，否则法律也无法让他们为这些犯罪行为负责。在大多数情况下，要获得这样的证据就算不是完全不可能，也非常困难，这既是因为公司的决策通常情况下是无数个分散的个人意见总结之后得出的结果，也是因为法庭倾向于让公司“法人”而非实际运作公司的自然人来承担责任。

因此，公司自身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最容易被指控的目标，而且因为它“没有灵魂可供诅咒，没有身体可供踢打”，正如英国大法官爱德华·瑟罗（Edward Thurlow）在18世纪就已观察到的，惩罚公司往往毫无影响力。就像精神病人一样，公司本身根本感觉不到要遵守法律的道德约束力。“只有人才会产生道德约束力，”在一篇法官、法律

评论员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Frank Easterbrook）和法律教授丹尼尔·费谢尔（Daniel Fishel）合作的论文中指出，“公司的道德责任感并不比一座大楼、一张组织结构图或者一个合同更多。”^[37]

对一个公司来说，遵守法律跟其他的一切一样，都不过是关乎成本和利润的事情而已。罗伯特·蒙克斯说：“在美国，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面临同样的问题，公司遵守法律与否只是是否划算的问题。如果被逮住受处罚的可能性小于遵守法律的成本，我们这些人只当它是个生意上的决定。”在决定是要遵守还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时候，执行人员“会理性地采取行动……根据成本—效率衡量做出决定。”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会问：“可能面对的刑罚是什么，被抓住的可能性有多大，合计起来成本是多少钱，遵守法律的成本又是多少？哪种行为的成本更高？”^[38]

法律教授布鲁斯·韦林这样表述相关的逻辑：

实用主义的生意观念是，罚金就是生意行为的额外成本。法律禁止某项行为，并不意味着罚金就能够真的阻止这一行为的发生，只要对该行为的预期利益被认为高出罚金总额与被抓住并证明有罪的可能性的乘积。考虑到平均罚金的数额，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根本没有威慑作用。考虑到预防犯罪的时候，这种逻辑表现得更加明显。一旦被定罪并被处以罚款，公司只需明白下次怎么做得更干净利索一些就可以了。^[39]

这里的反讽之处就在于，公司的使命就是去追求它的自身利益，这本身也是法律的产物，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在驱使公司违反法律。没有一家公司能够逃脱这一内在逻辑的控制，即使是那些声称自己具有

社会责任感的公司也一样。再看看英国石油公司的例子，我们就能发现这一点。

2002年8月16日，英国石油公司的技术人员唐·舒加克（Don Shugak）正在阿拉斯加公司的普拉德霍湾石油基地巡查油井，看是否有泄漏或存在其他问题。他的任务之一是重新激活一口因为维修而被关闭的油井。BP工程师们都知道，这口井仍然存在问题，一旦被激活，会以不同寻常的高压力启动，但是他们还是给了舒加克表示安全的绿灯。舒加克打开阀门重新激活油井，然后离开了这个位置。几个小时以后，他又回到井口释放压力，这也是常规性的步骤。虽然他在返回检查的时候记得打开了井房的门，但是这之后发生了什么，他已经不大记得了。他回忆道，当时他呼吸困难，耳朵鸣响不止，腿软掉了。他紧紧贴近他停在附近的卡车，爬到车的另一面，尽量远离接下来发生的大爆炸的核心位置。他说：“当时我开始靠肘用力爬行了2—3英寸。我拼命滚，因为我的肘非常累，而我的腿都打结了。”幸运的是，他的一位同事听见了爆炸声，远远看见了四十英尺高的火焰。他一边奔向现场，一边呼叫求救。舒加克说：“我甚至没有感觉到我受伤了。事实上我毫无感觉。我只知道事情完全不像先前预料的那样。大家好像都在张口说话但没有声音。”^[40]

两周后，舒加克在西雅图医院烧伤科醒了过来，全身烧伤面积高达15%，断了一条腿，膝盖和脊椎严重受损。幸运的是，他还活着。^[41]

舒加克的许多同事借这次事故谴责BP在维护规程和安全规定方面的长期疏忽，关于这一点，他们在事故发生之前就已经有过投诉。在1999年写给BP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的信里，操作工们称，公司并未“严格遵守法律和规章的要求”^[42]。他们引用1998年一起由一个漏气的阀门引起的1200加仑石油和数千立方米天然气泄漏事

故作为例，由于存在员工死亡和环境被破坏的风险，这次事故被公司定级为重大事故——“当时只要有一颗火星，整个电站就会被炸上天，”当时的一位操作员这样说。^[43]事故之后的一份报告呼吁建立一个主动维护机制，来检查所有相似的阀门，一旦需要就替换它们。这种机制与五年前负责检查阀门的州监管代表所提出的一项建议遥相呼应。^[44]据 BP 操作员说，这项建议并未被贯彻实施，阀门依然越来越面临渗漏的危险。即便在三年之后，也就是 2001 年的春天，州检查员们还发现，BP 的一个钻井平台上三分之一（9/30）的衬垫是有问题的，并不符合监管标准。^[45]

2001 年 7 月 16 日，就在舒加克事故发生一个月之前，一群 BP 操作工联系 BP 的监察官员玛丽·巴恩斯，称公司违反了一项 1999 年的监察指令。这份指令来自阿拉斯加州法庭，法庭之前已经认定 BP 公司犯有“明知向自然环境中排放有害物质的行为但不予举报的重罪”。BP 在两年里一直错误地默许它的一家承包商非法排放有毒物质。公司被处以最高额罚金 50 万美元，并且被置于“组织监管”下。监管条件包括承诺遵守“最好的环保措施，来有效地保护工人，公众以及环境，遵守所有法律和规程的要求”。^[46]BP 的操作工们在他们提交公司监管官员的信里称，“毫无疑问，BP 的作业没有遵从政府监管的要求，”他们同时引证了无数违反监管条例的情况，其中许多都与安全阀门有关。

然而，对 BP 来说，监管标准看上去只不过是另一种需要在它的成本—利润分析中加以考虑的因素而已。像其他大石油公司一样，BP 以摊到“每桶油”上的成本作为基础来安排各个油田的预算。一旦一个油田产量下降，该油田的作业预算也随之下降。从利润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很有意义，因为即便油田的生产力下降，公司也想要提高它们

的利润水平。然而，从安全和维护的角度来看，BP 操作工威廉·伯克特（William Burkett）在参议院阿拉斯加油田事件委员会作证时这样认为：

这就很快影响到经理人维护油田设备的能力。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在产量衰减前用于产油的设备，仍然在运作。事实上，往往还需要增加更多的设备，开凿更多的油井。所以，就会有同样数量甚至更多的设备投入使用，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维修费用也会随之增长，尽管同时，因为产量的下降，操作和维修设备的预算也在减少。

1988 年，普拉德霍湾油田的产量开始下降，危险的“每桶成本”逻辑开始起作用。“伦敦知道怎样才能让美元继续滚滚而来，”伯克特说，“削减。削减预算，削减员工人数，削减薪酬，削减备件，削减维修费用，削减监察——总之，就是要削减！”1992 年，BP 开始实施一项缩小规模的计划，这将最终让公司在普拉德霍湾油田只保留三分之二的员工。伯克特指出，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只有如此之少的技术人员来检查和维护老化的基础设施，并确保它们符合监管标准。^[47]

舒加克意外发生之后，负责监管 BP 作业的监管机构阿拉斯加油气协调委员会，就是否需要新的措施来保护工人以及环境免受维护不善的油井的侵害的问题召开听证会。毫不意外的是，BP 反对引入新的监管措施。但是就算有了新的监管措施，情况真的会有改变吗？伯克特对此不抱希望，他说，“如果无法被执行，世界上所有的监管措施都没法产生多少积极效果。”在阿拉斯加油田，执行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近期《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也观察到了这一现象：

阿拉斯加的立法机构……热切地希望取悦工业界，它们削减了负责油田安全监管的机构……资源匮乏让阿拉斯加油田安全监察员们很难开展他们的工作。在这个州广阔无际的大地上有着3 500个油井，却只有5个监察员。他们要对油田进行视察，就得先跟石油公司联系，这样才能保证他们不至于跋涉数百英里，却发现那儿少个人或者是少台设备。在其他几个主要产油州，监察员发誓要让石油公司保持诚实……相反，在阿拉斯加，安全监察员们对石油公司几乎不加考查。^[48]

今天，就整个经济体而言，监管系统往往无法起作用，因为存在松懈的监管和无效的执行。除非这种情况得到改变，否则我们将继续忍受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以及对人、社区以及环境的破坏。这是我们所有人为公司的损人利己倾向所付出的代价。

4. 民主有限

作为制度性的精神病患者，公司惯于扫除一切挡住他们去路的障碍，这其中就包括限制公司自由剥削人们和榨取自然资源的管制措施。公司总是不遗余力地试图扫除这些管制，并在最近的 20 年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通过游说、政治献金，以及巧妙的公关战役，公司以及公司的领导人们已经让政治体系以及相当一部分公共舆论转向反对政府管制。结果，法律保护人们以及环境免受公司行为损害的能力大打折扣。然而，商业对管制的对抗并非始于当代，它能够被追溯到现代管制型国家的起源之日。当然，管制历史上最离奇的事件是一群高端银行家和公司执行人员阴谋推翻罗斯福总统，他们相信这个人和他的管制野心已经走得太远，而他们要用一个法西斯独裁者来代替罗斯福的地位。这个故事听起来好像一个庸俗的虚构惊悚小说，但是它的的确确真实发生过。

在 1933 年春天当选为美国总统后不久，罗斯福便开始了新政，创立了一整套前所未有又全面的管制法律和机构，旨在加强政府对大公司和银行的控制。罗斯福新政反映了罗斯福的判断，即只有在市场看不见的手被政府的看得见的、善意的手所替代时，大衰退才可能终

结。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罗斯福将工人的新权利和新的保护措施、免除农户债务，以及为投资者提供公平与公开性的保障写入了法律和其他文件。之后，他这样描述他的创造：

新政（New Deal）中的“Deal”这个词说明，政府本身将要使用积极性行动来达到他所宣布的目标，而不是继续袖手旁观，空等普通的经济法律来达成目的。“New”则意味着，一种新的旨在造福我们绝大多数农户、工人以及商人的新秩序将要替代我们这个国家内旧的特权秩序……我们将不仅仅满足于向往……（宪政）理想。我们将要动用政府的工具和权力来积极地为它斗争……因为美国的制度即是保护个人对抗被滥用的经济力量的具体表现，而新政将坚持对抗这种力量。^[1]

罗斯福新政不可避免地只能是为了这个目标——限制公司的自由和权力。尽管许多商业领袖赞同罗斯福的观点，认为罗斯福新政对于拯救资本主义毁于自身缺陷是必需的，特别是在工人对抗情绪不断发展、经济正在崩溃的时代，但还是有一些人对此暴跳如雷，他们相信罗斯福的计划将会从根本上毁灭美国的资本主义。这就是资本家密谋推翻罗斯福政府的起因。

1934年8月22日，罗斯福入主白宫一年多以后，也是阿道夫·希特勒正式成为德国独裁者的三天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前将军斯梅德利·达林顿·巴特勒（Smedley Darlington Butler）——也是当时美国最受尊崇的军人，走进费城贝尔维（Bellevue）旅馆的大厅。一个名叫杰拉尔德·麦圭尔（Gerald MacGuire）的以卖公债为生的一战老兵，正在那里等候他。在简短的互相寒暄之后，麦圭尔告诉巴特勒，他受

一群商人的委托，来请求将军召集一支军队，控制白宫，并且自立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法西斯大独裁者。^[2]

当时，许多商业领袖发现法西斯主义是如此具有吸引力，特别是他们在将法西斯主义与“从白宫里传播出来的阶级仇恨”（赫伯特·胡佛语）做比较的时候。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废除了国债，阻止了通货膨胀，降低工资，并且陆续控制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工会。另一方面，他们相信，罗斯福已经成为本阶级的叛徒，并且眼看就要破坏美国的资本主义。1934年7月号的《财富杂志》（*Fortune*）大赞法西斯主义的优点以及墨索里尼所创造的经济奇迹。这一期杂志的出版人莱尔德·戈尔兹伯勒（Laird Goldsborough）这样写道：“优秀的媒体人必须意识到，法西斯主义确保了我们种族的传统美德，无论这些美德此时在他的祖国是否流行。”^[3]

事实上，当时一些主要的美国公司确实通过为希特勒工作获取了实实在在的利润。亚当·奥佩尔 AG（Adam Opel AG）是通用汽车所有并控制的一家德国汽车制造商（当时由都彭家族控制），在通用汽车管理层的帮助下，这家制造厂在1937年转为军事用途。它为德国军队制造卡车，包括三吨级的欧宝布利茨（Opel Blitz）卡车，这是德军进攻波兰、法国以及苏联的闪电战的关键部分。它还制造飞机部件，包括德国空军容克式“神奇轰炸机”的引擎。^[4]最近一档通用汽车的电视节目出于商业目的吹捧通用所制造的卡车在二战期间支持盟军修路架桥的贡献——“有些人说我们为胜利扫清了道路，”广告中这样说道——但是它却没有提及，这个公司同样也为敌军制造战车。

IBM——按它的技术与战略发展副总裁欧文的话说，就是“客户一有需要，就迅速行动”的公司——在希特勒为纳粹的种族灭绝和奴隶劳工项目寻求它的技术支持的时候，也毫不犹豫地飞奔过去。IBM

为纳粹提供了 Hollerith 式制表机，这是计算机的前身，使用穿孔卡片来进行计算。埃德温·布莱克（Edwin Black）是《IBM 与大屠杀》（*IBM and Holocaust*）一书的作者，他这样说道：“纽约总部对第三帝国将使用 IBM 的机器做些什么一清二楚……他们的机器大部分进了集中营，而他们也知道犹太人将被屠杀。”IBM 技术人员维护机器，IBM 工程师培训用户。按照布莱克的说法，IBM 持续供应机器的打孔卡至少到 1941 年，也就是美国向德国宣战的时候。^[5]

IBM 为纳粹工作的动机，如布莱克所说，“跟纳粹主义毫无关系……它只与利润有关，”这与公司非道德的本性是一致的。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民主制度，根据原理还是根据意识形态，公司都根本没有能力来判断政治体系的优劣。对于公司来说，惟一具有合理性的问题是，某个政治体系是服务于还是阻碍公司追逐利益的目标。按照彼得·德鲁克的说法——他说他“不止一次与当时 IBM 的大佬沃森先生讨论这个问题”——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对于为纳粹工作持保留意见，“这不是因为这项工作违反道德，”德鲁克说，而是从一个生意人的角度来看，“因为沃森对于公共关系有非常敏锐的眼光，认为这笔生意有风险。”抱着同样的想法，1939 年通用汽车的主席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似乎根本不为自己替纳粹所做的事情做任何道德上的考虑。德国子公司“利润非常丰厚”，他这样为通用汽车在德国的投资辩护，并且认为德国的内部政治事务“不应该成为通用汽车商业管理的考虑因素”^[6]。尽管现在看起来，美国公司向纳粹提供帮助非常让人震惊，但我们不应忘记今天许多美国公司仍然在与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政体做生意——同样，也是因为有利可图。

回看 20 世纪 30 年代，某些顶尖的美国公司不知羞耻地与法西斯独裁者合作，许多生意人相信联邦政府正在威胁资本主义制度，我们

就会明白为什么一群商界领袖会阴谋将美国变为独裁政体。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除掉民主制度可能看上去不过是一项防御性的商业计划，仅仅是因为民主制度威胁说要破坏公司的使命。巴特勒正是完成这项扫除工作的最佳人选——至少麦圭尔和他的支持者们这样认为。

巴特勒做了一辈子的共和党人，也是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公众演说家。作为一位著名的军队英雄——两次获得国会荣誉勋章的四人之一——将军将他的绝大多数军旅生涯都奉献给了保护美国在亚洲和中美洲的商业利益。他也深受老兵的拥戴，因为他曾努力向政府为老兵们争取更好的待遇和更多的福利。巴特勒看上去是非常理想的人选，能够拉起一支老兵的队伍，并且带领他们通过战争控制白宫。

麦圭尔和巴特勒在贝尔维旅馆会面之前，已经有过几次会面。一年以前，麦圭尔曾亲自去巴特勒在费城的家中拜访，声称自己是关心此事的老兵代表，要求将军为即将成立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大会发表演讲。麦圭尔已经为这次演讲拟好草稿，旨在鼓动老兵去反对罗斯福废止金本位制的决定，这项决定一旦生效，会让银行承受极大的成本。巴特勒不明白为什么老兵要关注金本位制，拒绝了麦圭尔的请求。几个月以后，1933年9月，麦圭尔再一次找到巴特勒，这一次是在新泽西，将军在那里为协会的支部发表演说。两人在巴特勒下榻的旅馆房间会面，麦圭尔再一次请求将军就金本位问题在芝加哥大会上发表演说。按照巴特勒的说法，麦圭尔拿出一堆1000美元的钞票撒在床上，作为他去芝加哥的路费。“趁别人还没看见，你赶紧拿钱走人，”巴特勒当时这样对麦圭尔说，“我不想为钱所困。”^[7]

几周之后，这两个人在贝尔维旅馆再次会面，巴特勒已经知道了麦圭尔背后的人和所在机构，这些主要由麦圭尔自己透露。巴特勒后来披露，这里面包括格雷森·墨菲（Grayson Murphy），华尔街一家顶

级经纪公司的头目和摩根信托、安纳康达铜业公司、固特异轮胎以及伯利恒钢铁公司的董事；富有的银行家罗伯特·克拉克（Robert Clark）是这个阴谋的另一位支持者，巴特勒在要求麦圭尔提供支持者名单之前就已经认识他，他告诉巴特勒他将投入他3 000万美元家产的一半来保卫另一半不被罗斯福毁灭。此外还有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1924年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统失败之后，他成为摩根大通公司的合伙人。

贝尔维旅馆会见安排在打烊了的旅馆咖啡厅远离人群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边。麦圭尔一开始就告诉巴特勒，过去的六个月他待在欧洲。巴特勒回忆他们当时的对话：

他说：“我出国去考察老兵在不同的政府结构中能担任的角色。在意大利逗留了二到三个月，考察意大利老兵的地位和法西斯政府的结构，我发现老兵正是墨索里尼的后盾……我又到了德国，观察希特勒的行动，发现他的全部力量同样都来自于军人团体……我还去了法国，发现那里的组织结构就与我们接下来要拥有的一模一样。一个杰出军人的组织。”他告诉我一个法语词，但是我记不起来了。我从未听过这个发音。但是我知道这是一个由法国各个军人团体组成的大联盟，由军士和军官组成。他告诉我他们大约有五十万成员，每个成员背后，都领导着另外十个人，这样他们就有了五百万张选票。然后他说：“现在，我们在美国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这样的组织。”^[8]

麦圭尔告诉巴特勒，他的支持者们计划创造一个美国版的火十字（Croix de Feu），也就是巴特勒想不起来怎么念的法国军人团体，

并且让将军成为这个组织的领袖。阴谋者们期待着，有强有力的军队撑腰，巴特勒能够要求罗斯福任命他为总务秘书，这是一个新的职位，事实上就充当了助理总统的角色。到那时，以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在不断恶化作为借口，巴特勒就将成为这个国家真正的掌权者，总统将不过是名义上的领袖。如果罗斯福拒绝这个安排，按照麦圭尔的说法，巴特勒的军队将推翻他。

新闻记者保罗·弗伦奇（Paul French）也曾与麦圭尔有过交谈，他转述巴特勒的话说：

整个谈话过程中，他不断地陈述人们需要一个白马领袖，即一个独裁者。他说这是惟一的方法：要么通过武力威胁，要么通过合法授权，动用组织起来的老兵的力量来拯救资本主义体系。

开始谈话不久他就变得很激动，他说：“我们可以和罗斯福和平共处，然后就像墨索里尼对付意大利国王那样对待他。”

正如他告诉将军的那样，我们将会有一个总务秘书，如果罗斯福肯合作下这局棋，很好，如果他不肯，赶他下台。^[9]

在整个会面过程中，麦圭尔向巴特勒吹嘘说，钱不是问题，要组织并武装一支老兵队伍，现在已经有了300万美元，如果需要更多，还有3亿美元。他说他的支持者已经在整合一个联盟组织，可以为这个密谋提供秘密的经济来源以及实际支持。美国自由联盟，这个“抗击种族主义，传播尊重个人和财产权利的必要性，根本上推动自由个人企业”的组织，在三个星期之前宣告成立。联盟的财务总管格雷森·墨菲，是麦圭尔老板。罗伯特·克拉克是主要的资金提供者，来自摩根大通和都彭的某人是联盟的执行人员。约翰·戴维斯是全国

经理人委员会的成员。资金支持者包括一些控制着美国主要领域的人：皮特凯恩(Pitcairn)家族、安德鲁·梅隆集团(Andrew Mellon Associates)、洛克菲勒集团(Rockefeller Associates)、E.F.休顿集团(E.F.Hutton Associates)、通用汽车的威廉·克努森(William Knudsen)，还有V.皮尤(V.Pew)家族。^[10]

然而，麦圭尔和其他密谋者在选择领导人的时候犯了致命的错误。朱尔斯·阿彻(Jules Archer)在《夺取白宫的阴谋》(*The Plot to Seize the White House*)一书中写道：“由于难以置信的失策，他们选错了人。”^[11]这个阴谋以及阴谋背后的人向巴特勒描述的一切情景都让他不屑一顾。随着岁月的推移，他长年在外征战的年轻激情已经让位于同样强烈的、在家乡同伪善者作战的渴望。他开始相信战争不过是公司贪欲的产物，他的士兵不过是在为商人的利润而非一个更高的理想而作战。1931年8月21日——麦圭尔首次接近他的两年之前——巴特勒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于康涅狄格州的一次大会上发布了令听众震撼的讲话，他说：

我花了33年……成为大商业集团、华尔街和银行家的一个高级打手。简单点说，我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一个敲诈者……

1909—1912年，我帮助国际银行布朗家族清洗尼加拉瓜，1916年，我为了美国的石油利益，维持墨西哥、主要是坦皮科市的安全，1916年，我为美国的食糖利益打开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大门。我为了花旗银行的小子们去平定海地和古巴，好让他们收租，为了华尔街里的利益，帮他们强奸了半打中美洲国家……

1927年在中国，我帮助美标石油公司通行无碍……我过去……在敲诈方面是把好手。我因此获得了各种荣誉、奖章、晋

升……我可能已经给了卡彭（著名的黑帮头目）一些暗示。他顶多在三个城市敲诈勒索。海军陆战队在三个大陆都这么干。^[12]

巴特勒无意再让美国也变成他为了维护美国公司利益而动武的目标国家。1934年11月20日，他向众议院非美行为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在纽约的一个秘密执行部门揭发了这个阴谋。当时，将军已经收集了他所能收集到的信息，他所讲述的事件又得到保罗·弗伦奇的证实，后者也在委员会作证。委员会在所有核心问题上都确认了巴特勒关于事件始末的陈述，并在1935年2月13日将最后的调查报告提交众议院：

在过去几个星期，委员会收到证据，表明某些人企图在这个国家建立一个法西斯组织……

毫无疑问，这一企图已经经过讨论、筹划，当资金提供者认为时机到来时，就可能付诸实施。

委员会收到的证据来自斯梅德利 D.巴特勒少将（已退休），美国国会荣誉勋章两次获得者。他向委员会出示了与杰拉尔德·C.麦圭尔的对话记录作为证据，在对话中后者声称要在巴特勒将军的领导下成立一个法西斯军队。

麦圭尔发誓否认这些指控，但是您的委员会能够确认巴特勒将军作出的所有相关陈述，除了提议建立这个组织的直接陈述。而后者也已被麦圭尔与他的雇主纽约市的罗伯特·克拉克之间的通信所证明，当时麦圭尔正在国外考察法西斯性质的各种老兵组织形式。^[13]

由于巴特勒拒绝与麦圭尔和他的支持者合作，加上委员会对将军所述事实的确信，控制白宫的阴谋就此破产。

“无疑巴特勒将军说的都是事实，”委员会联席主席约翰·麦科马克（John McCormack）后来在1971年与阿彻的访谈中回忆道，“阴谋者们绝对痛恨罗斯福新政，因为它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而不是为了金融界的利益。这些人宁愿花费巨额金钱来将罗斯福先生赶出白宫。”麦科马克强调，“这些人绝望了，决定学习欧洲的道路，并意图将之引进美国。他们将麦圭尔派往欧洲，考察法西斯组织形式。”那次美国跟法西斯主义的擦肩而过有多危险？麦科马克说：

如果巴特勒将军不是那样的一个爱国主义者，如果他们能够保守秘密，这个阴谋绝对可能成功，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处境……如果密谋者除掉了罗斯福，实在很难说会发生什么。当然，他们不可能告诉公众他们想做什么，他们当然也会让一切看上去都符合宪政，给独裁者安上一个非常合理的名头，再公布一个听上去很好的美国计划。一小部分有良好组织的人总是能够战胜乌合之众，就像阿道夫·希特勒所做的那样。^[14]

今天，在阴谋败露的70年之后，一伙组织得当的少数分子再一次威胁到民主制度。美国公司在过去漫长的几十年里一直进行着耐心的战役，试图夺取对政府的控制权，这比密谋者笨拙的尝试要安静得多，但最终也有效得多，而这战役正在通往成功之路上。没有流血、军队、法西斯强人，使用的是美元而不是子弹，公司如今正在准备赢得当年的密谋者绝望地期待的一切：免于民主控制的行事自由。

2002年7月24日，九名绝望的煤矿工人在一个宾夕法尼亚牧场地地下240英尺的漏水矿井中等待营救，由于错误地钻通了一个积水的附近矿道，大水冲垮了他们的矿井，而他们侥幸逃生，却被困在地底。这些矿工靠着一个小小的气穴坚持了78个小时，最终获救。一个星期之后，小布什总统飞抵这个小镇，并且宣称，矿工们的勇气和坚定信念反映了9·11事件之后美国人的美好品质。他说，“永远团结，并且安慰彼此的决心已经成为流行于全国的一种新的精神——一个人受苦，我们都感到痛苦；为了取得胜利，我们团结起来，并肩战斗，我们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15]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话听起来很像罗斯福政府对政府管制的道德意义陈述中的词句，而包含了煤矿监察内容的管制政策却正好是被他所结束掉的。

1941年，罗斯福执掌白宫的时期，国会实质性地加强了管制制度，为了保护煤矿工人的安全，授权联邦矿业局进入并监视煤矿，以控制可能的安全危机。尽管该局的存在已有30年历史，但它的权限之前一直被限制在收集信息和主持调查上。现在，它第一次能够在实际上执行法定的安全标准。接下来还有进一步的发展。1952年，国会通过联邦煤矿安全法令，授予该局新的权力来发布违规警告并强制执行，要求煤矿必须接受年度检查。这个法令在20世纪60年代被加强，并在1977年为一个新的法令所代替，那就是联邦矿业安全和健康法令，它巩固了对所有矿业的保护，创立了一个新的执行机构，矿工安全和健康处（MSHA），来接管来自矿业局的事务。在这个机构运作的最初十年，每年发生的矿难从272起下降至86起。^[16]

更晚近一些，布什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事实上削减了对煤矿工人安全的保护。在他的首次预算计划中，小布什试图削减MSHA的人员，但被当时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驳回。后来，在2003年的预算计划



中，小布什试图削减该机构的煤矿强制监察项目预算 470 万美元，具体方法是：削减 65 名全职员工，停止一项旨在检测矿工是否罹患黑肺病的 X 光胸透项目，并减少对煤矿逾限行为的监控、技术审查、对煤矿合作行为的追踪调查、教育培训和技术援助等方面的投入。新的国会以共和党人占据多数，这些计划看上去可能会被通过，但在美国联合矿工工会（UMWA）的强力游说之后，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投票恢复了 MSHA 预算中的 470 万美元。小布什 2004 年的预算计划削减用来执行煤矿安全标准的 630 万美元。^[17]然而，即便没有任何实质的裁减计划被执行，“MSHA（按前些年的预算水平）也无法完成法定的监管任务，”它的总监察员在 2002 年 1 月这样说。照美国联合矿工工会（UMWA）会长约瑟夫·迈恩（Joseph Main）的说法，要求对每个煤矿每年必须有四次视察的法律规定很少能够实现，实际中的视察往往流于草率和没有效果。^[18]

结果证明，魁溪矿井漏水事件可能是由于矿工们依赖过时的地图所导致。引起漏水事件的矿工们钻开的废弃积水矿坑，在地图上的距离位于它实际位置的 300 英尺之外。类似于这次魁溪矿井漏水事件，在此之前的两年内也曾发生在其他两个矿里，而这些煤矿都是由开采魁溪煤矿的黑狐矿业公司和 PBS 煤炭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一起来运作的。可以合理假设，一个人员配备恰当、运作正常的机构必定会保证魁溪的矿工使用合适的地图，因此能够避免他们遇到的可怕而痛苦的经历。^[19]

在管制系统中，削减负责执行管制法令的机构的经费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不仅是在采矿业。如果说这些措施并无意如此，但它们实际上仍然产生了以下影响：解除对公司行为的管制。尽管法定标准仍然存在，阉割过的执行机制使得它们在实质意义上被削弱了，甚至

在某些时候完全地失效。明显的例证就是对监管阿拉斯加油田的机构和劳工部预算的削减（后者连带损害了对公平劳动标准法的执行能力）。最近，对环境保护局^[20]、职业安全与保健管理总署，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21]预算的削减也因为以上机构在权限内对公司行为失察造成的危害而饱受谴责。

另一种取消管制的方式则围绕直接废止管制措施而展开。这种现象在整个监管体系里也非常普遍。用以保护公众利益免受公司不当行为损害的法律规定正在被剥除，有时候干脆集体消失。对于这个现象，没有什么比安然崩溃事件更好的例证了。

2000年12月7日，加利福尼亚第一次停电——在今后的六个月里，它会重演40多次并给这个州和它的人民带来了一场大浩劫——此时，没有人会疑心安然有什么可谴责的地方。许多人因为电力短暂的供应不足谴责过度的管制，而取消管制则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式。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在2001年1月宣称：“如我所理解，如果有任何电力管制措施妨碍了加州的电站全负荷输出，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松一松管制的力度。”^[22]共和党参议员菲尔·格兰（Phil Gramm），谴责“那些将环保极端主义以及州保护主义看得比常识和市场自由更重要的人”，认为他们应当为刻下的灾难负责。^[23]

然而，最终真相是，安然极成功——同时也是极昂贵——地用以消除政府对它的监管的行为成为它后来在电力系统惨败的一个主要因素。^[24]

剥去层层外表，安然事件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公司利用政治的影响力来移除政府对它经营行为的限制，然后利用它得到的自由从事可疑的、然而也是利润巨大的交易。整个1990年代，公司和它的管理

者们，主要是前 CEO 肯尼斯·雷伊（Kenneth Lay），在政治过程中掷撒大量金钱，来帮助公司从一个寻常的管道小公司转型成为一个电力能源交易商。在包括加利福尼亚的几个州成功地游说取消了电力市场的管制之后，它开始了一场取消能源类期货交易管制的战役。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它和其他几个能源公司寻求免受商品交易法的限制，此项法令要求能源商必须向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披露他们关于期货合约的信息，后者是负责该法令实施的机构。就在克林顿在 1992 年 11 月 7 日的选举中击败对手小布什的一周之后，这些公司向当时以温迪·格兰（Wendy Gramm）为首的 CFTC 要求不再监管能源类期货交易。格兰被另一个布什委派到委员会，在当时充当了替罪羊的角色，同时也处在潜在的利益冲突之中——她的丈夫，得克萨斯州参议员菲尔·格兰是安然政治献金的头号受益者。然而，她还是将请愿书递到委员会，委员会在 1993 年 1 月，以 2 : 1 的投票结果，决定做出有利于安然和其他请愿者的决定。结果能源类期货交易从此不再是 CFTC 监管的目标。

委员会中孤独的反对方是席拉·布莱尔（Sheila Blair），他在投票结果之后指出，这个决定“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而当时众议院拥有 18 年丰富工作经验的白宫老人以及主管格兰委员会的白宫附属委员会主席格伦·英格利希（Glen English）则评论说，它“是我见过的最不负责任的决定”。就在温迪·格兰宣布她的责任的六天以后，也就是克林顿就职的那天，她从该委员会离职。五个星期之后，她进入安然董事会。^[25]

尽管格兰委员会的决定带来的免受 CFTC 审查的自由，能源交易者仍然被法律要求必须在纽约商品交易所这样受监管的拍卖机构下从事贸易。因为这些拍卖方会向监管者报告价格、数量以及其他信息，

像安然这样的交易者仍然在监管者的眼皮之下。安然 1999 年直接攻击这个问题，通过花费 100 万美元用于游说议员来废止拍卖管制要求。对公司来说，这是一次严峻的挑战——金融市场工作小组的主席最近还决定，能源类期货交易应当继续处于受监管的状态，若非如此，操纵能源供应和价格的现象就几乎肯定会发生。然而，安然没有放弃它的意图。它变本加厉地花钱如流水，用于游说议员，并且从它的朋友参议员格兰那里得到更进一步的帮助，后者在 2000 年提出商品期货现代化法，企图以此来废止拍卖监管要求。后来的纽约商品交易所主席丹尼尔·拉帕波特（Daniel Rappaport）当时评论道：“如果这个提案经过全面辩论，它不会有生存的机会。”这一法案在参议院被否决，但接下来却在众议院被附在一个拨款法案后面通过，在格兰参议员改换法案编号和名目再次提起之后。后来，在 2000 年 12 月 21 日，由当时的替罪羊克林顿总统签署，正式生效成为法律。^[26]

安然赢了。现在，它能够在自己的交易场所进行自己的拍卖，藏在政府监管和公众目光所无法进入的领域。通过紧盯加州能源市场进行操纵，它对自己享有的新的自由进行了充分彻底的利用。在一系列精明的恶魔般的方案里，安然内部人员对它们的昵称最好地抓住了它们险恶的特征——“死星”、“矮子”，以及“肥仔”——公司帮助制造了一次人为的能量短缺，这抬高了电的价格，结果使得它的利润飞上天。在商品期货现代化法被总统签署生效的 6 个月以后，38 次停电像瘟疫一样在加州上演。而从 2000 年 5 月的能源危机之初，直到那时以前，只发生过一次停电。正如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的公众市民组织（Public Citizen）所总结的那样，“菲尔·格兰的商品解除管制法令使得安然能够控制加州的电力资源，将数以亿计的额外利润装进口袋，并且强迫数百万加州居民在停电或者以令人无法容忍的价格买



电的境况下生活。”

2001年6月19日，这场电力灾难终于走向尾声。当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对加州电力市场施加严格的价格管制的时候，现货价格下降了超过80%，而安然，由于将赌注压在电力价格的持续高位，并且没有理由相信它对电力市场的操纵将会停止，手里只剩下数十亿美元只值买入价格零头的合约。公司开始放血，损失惨重。CEO杰夫·斯基林（Jeff Skilling）在价格管制措施开始不久后突然辞职，安然则在四个月后申请破产。尽管安然的倒闭可以归咎于无数的因素，但无论如何，它在加州炒作能源期货的恶行所导致的巨额损失都是原因之一。

安然可能是惟一一个成功部署如此聪明的战术、通过影响政治过程来移除政府对其行为监管的公司，但是它绝非惟一采用这一战略的。尽管公司经常被谴责为运用金钱和影响力来破坏民主，但实际上，公司几乎别无选择，在必须保护和提高它们的利益的前提下，它们只能选择不断追求影响力。因为政府管制减少利润，移除这些管制对于公司来说就非常合理。对于公司的管理层而言，抛开维护民主程序的道德考虑不说，如果他拒绝涉及政治影响力，就会失去他/她的持股人支持，也会葬送公司的法定使命——获取最大利益。一个公司的管理人员的工作绝非保护民主制度，而是控制民主制度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并且避免它的存在给公司带来的阻碍。

安妮·韦克斯勒是华盛顿特区顶尖级的政治说客之一，她的客户包括许多主要的大公司，比如美联航、通用汽车、罗氏（Roche），还有从她为比尔·克林顿的公关办公室掌舵时建立起来的广阔联络网。在我们终于抓到她进行采访的时候，她还沉浸在最近为代理的一个客户取得的胜利的喜悦中。她说：“昨天晚上，关于提高燃油效率标准的

修正案在白宫被驳回……这对于汽车工业来说是一场胜利，当然也包括我的客户。”汽车产业害怕这一修正案会限制利润高昂的 SUV 的生产，不惜花费数百万美元来帮助击败这一修正案。他们针对这个修正案的游说活动是公司游说活动更普遍的一种形式。当公司游说政府，他们通常的目标是规避管制。有时候他们会努力去组织政府引入新的或者更强有力的管制措施（正如汽车产业对待燃油效率标准的方式），另外的一些时候，他们对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废止、削弱或者限制既定规制措施的适用范围（正如安然对能源类期货交易管制措施的做法）。公司游说政府，换句话说，主要是为了“防御性的目的”。如卡托研究所主席威廉·尼斯卡宁所强调，“大部分是为了回应政府以管制形式作出的对公司独立性带来的威胁。”^[27]

公司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开始严肃对待这种威胁。到那时为止，过去几十年里创设的管制——被称为“新社会管制”，由环境保护、人权以及工人和消费者安全体系组成——造成的冲击明显已经在实质意义上阻碍了公司的自由和权力，正如罗斯福新政之前所做的那样。尽管公司在整个 20 世纪 60 年代一直袖手旁观，眼看着公众意见和政治势力转向他们的对立面，他们现在意识到已是反击的时刻。这一次，不再是密谋的关键妙计。相反，带着一种新的“意识，即如此众多的决定都是在华盛顿特区做出并直达底线”，正如说客韦克斯勒所说，公司开始政治性的动员。他们在华盛顿特区设立办公室，创建产业联盟组织、游说团体以及产业在背后支持的智囊团来维持他们的集体影响力。美国商业圆桌会（Business Roundtable），一个由顶级 CEO 们组成的影响力极大的联合会，于 1972 年建立，加入这一联合会的公司首脑们分享着这样的信念，即，“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商业领域应当在形成公共政策方面扮演积极而有效的角色，”同时，有必要保证“政



府更少的未经授权地侵入商业事务的行为”。^[28]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商业—政府的关系经历了深刻的变化^[29]，当时，正如尼斯卡宁所描绘的一般，只有“相对来说极少数的公司在联邦政治中扮演角色……大多数公司在华盛顿没有办公室，也没有代理的政治说客”。今天，所有的主要大公司在这个国家的首都都设有办公室，与此类似的还有无数的产业团体、智囊团以及代表他们集体利益的游说组织。

70 年代以来，公司—政府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公司的赞助在选举体系中扮演的不断扩展的角色和影响力。在 70 年代中期，最高法院将第一修正案的宪法保护范围延展至公司对选举的资助，这一决定导致公司对选举过程近乎全部的接管。公司的选举资助的逻辑非常清晰。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家》（*Politics*）一篇中所言：“当金钱被用于政治，出钱者天然地惯于谋求利益回报。”^[30]或者，如安妮·韦克斯勒所说：“对一个政客而言，很难拒绝一个捧着大把美元走向他的阵营的人。要走进他的门陈述你的意愿，这样做显然容易很多。”^[31]

公司的赞助现在是政治体系的助燃剂，已经成为公司阵营影响政府行为的核心战略。看看以下的例子：

■ 仅在 2002 年的选举回合，煤炭产业向政治领域投入的资金大概在 150 万美元，其中 130 万美元（84%）流向共和党。1990 年以来，该产业已经花费了接近 1 100 万美元用于政治献金，其中 840 万美元（77%）流向共和党，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布什政府如此热心于削减 MSHA 的预算。^[32]

■ 向共和党及其候选人捐赠过金钱的公司确实地与“切尼特

遣队”（Cheney Task Force）有着联系，“切尼特遣队”是布什总统在2002年对他的国家能源政策的叫法。从1999年到2002年，安然捐赠了超过200万美元，并且获得了4份合约，南方公司（Southern Company）捐赠超过150万美元，拿到7份合约，Exelon公司捐赠接近100万美元，获得6份合约……诸如此类。这些大捐助人也收到了其他的好处，比如雪弗龙公司提议解除对能源项目和其他跟燃料供应相关的项目的联邦管制。这些提议都被完全采纳了。^[33]

1999年，共和党当时的主席吉姆·尼柯尔森（Jim Nicholson），写信给查尔斯·亨博尔德（Charles Heimbold），一家制药公司百时美施贵宝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的CEO，要求25万美元的捐助，并“顺便”提到，“如果我们想要继续通过有利于你的公司的立法，我们必须让联络之门畅通。”^[34]

2001年的竞选回合，在向国会议员候选人（其中大多数是共和党人）提供了超过100万美元的捐助之后，礼来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发现自己成为一项法律条款的受益者，该条款藏在本土安全法案的繁琐条文之中，保护水杨乙汞的制造厂家——礼来是惟一一家——免于因为药物使用造成的损害受到起诉。水杨乙汞是一种含汞的防腐剂，当被用于儿童疫苗时，它可能引起儿童自闭症。该条款最终由于公众的愤怒和政治压力被拿掉。^[35]

无论是通过政治游说、政治捐赠，还是公共关系活动，公司努力

设法要影响民主进程，这跟反罗斯福的阴谋者试图颠覆民主制度如出一辙。他们想要确保政府不再限制他们的自由，不再阻挠或破坏他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使命。“大公司……会不择手段，只要他们相信这些手段对于他们的生存来说必不可少，某些情况下，这也意味着追求从政府得到特别的好处，”威廉·尼斯卡宁这样说。他们花在政治过程中的钱就是一项商业开支，一项投资，用于创造可以提高利润率从而帮助他们生存下去的政治环境。公司没有合法理由来把股东的钱花在不能拿到合理回报的地方，公司在政治上砸钱和他们进行其他投资的理由是一样的：促进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所有者的经济利益。^[36]

然而，从公众的角度来看，正如哈佛大学的乔·巴达拉科所说：“我国正在变成一种公司对我们的政治体系拥有一种巨大的、有争议的、不恰当的影响力的体制。”至少，民主需要一些平等机会来参与政治过程。然而，当公司——无限关注持股人的财富——在这一进程中像个人一样从事政治实践时，就会出现深刻的不平衡。罗伯特·蒙克斯警告说，今天的我们面临一种“极不稳定的处境”，我们“危险地接近一个商业指派政府的局面”。“除非我们极其警惕商业统治政府的倾向，我们的政府体系很可能真的这样萎缩掉。”^[37]

然而，许多公司内部的人士看上去仍然相信，当他们为雇佣他们的公司的利益努力影响政治进程的时候，他们在履行一种公共服务。

“教育人民。”安妮·韦克斯勒这样描述她作为一名服务于公司的政治说客的工作。“国会成员很忙，对他们来说，很难对每天发生的每一桩事情都有所理解。我们的工作……就是保证这些将要作决策的人至少对这些议题有所了解。”克里斯·科明萨拉夫斯基，博雅公关的CEO 同样相信工作的一部分为了公司客户的利益，抵制关于环境和其

他公共利益的管制政策的提议，并服务于一个重要的公众目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建立在对个人把信息传递给决策者并保障他们做出正确决策的权利的尊重上。……这是对个人推进正确决策的权利的尊重，我相信这正是沟通中最根本的一点，很明显，也是博雅公关行事方式中最根本的一点。”

“我完全不认为这不公平，”针对关于公司相对于政治领域拥有不公平的优势的主张，克里斯·科明萨拉夫斯基这样说道，“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获取资源来分享某一观点……有很多资源可以来帮助人们分享任何他们想要的观点。”^[38]

辉瑞制药的 CEO 汉克·麦金内尔同样相信，当他为自己公司的利益游说政客的时候，他也促进了公共利益。“当我游说的时候，我努力以双赢（辉瑞和公众）的方式来改变政府的政策。”对于他的公司的政治捐助，麦金内尔说：“这实际上是非常审慎的；这不是很大一笔数目，坦率地说，这是人们参与国家政策讨论的一种方式。”他同样认为这些也是为了提高公共利益。他说：“我们期待着选举出这样的人，他拥护对整个国家有利的政策。我们想要选举出这样的人，他能够理解国家的需求，并准备努力奋斗为我们大家造福……他拥护正确的政策……他能够明智地参与政治过程。”他说，政治捐赠“不会带给我们任何特殊利益”。他是否相信自己对政治过程拥有不恰当的影响力？不。他说：“我不想要自己拥有太多的权力，我努力影响决策过程和政策，尽管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39]

然而，要对抗公司的游说行为，代表普通市民的利益的人，又怎会有那样不顾一切的需求呢？又怎会有上百万美元来促进他们的利益呢？这些东西显然不存在。

韦克斯勒、科明萨拉夫斯基和麦金内尔保有的关于游说和政治捐

赠是政治服务而非对政府的不恰当的影响力的信念，可能是由一种更深刻的信念所形成的，这种信念与商业和政府的关系有关。今天，韦克斯勒说：“公司从骨子里感觉到自己是政府的合作伙伴……他们不是政府的对立面……商业是一个受害者，这样的观念基本上已经消失了……人们现在认为政府将要成为合伙人，而你将要和他们一起工作……本质上来说，商业/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的关系。”^[40]

汉克·麦金内尔同意这种说法。“未来进步的关键在于合作。在几乎所有社会努力方面取得成功的最佳方法是合作。如果你说这只是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或者市议会自己的工作，你就错过了以往行之有效的方法——合作，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是如此。”^[41]

商业与政府是且应当是合作伙伴。这样的观念现在无处不在，一点也不特别，并且被两个领域内的领导人不断重复，仿佛咒语一般。看起来这是一个具有引人注目且无害的观念——除非你仔细思考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合作伙伴必须相互平等。合作的一方不应当向另一方行使权力，不应当管制另一方的行为，不应当对另一方施加主权。合作伙伴应当分享同样的使命和相同的目标。他们应当携手努力，解决问题，规划行动。另一方面，民主必须是层级进行的。它要求人们通过他们选举出来的政府对公司施加控制，而不是完全平等地要求人们享有决定公司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以及必须做什么的权力。如果公司和政府事实上是合作伙伴，那么我们应当担心我们的民主到底是什么状态，因为它实际上必定意味着政府有效地放弃它对于公司的权力。大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是1934年的阴谋事件所追求的目标。他们想要巴特勒代表大商业利益成为罗斯福的“合伙人”，共同治理美国——作为总务秘书，或者助理总统。今天公司就站在民主政府的旁

边，而非居于它之下，以类似于当年阴谋者所计划的巴特勒站在罗斯福总统身旁的方式。他们的领导人相信他们有一个法定的角色，作为政府的合作伙伴来统治社会。

结论是，政府会在统治公司方面扮演不那么合法的角色。就像公共利益的管理员，和他们的政府合伙人一起，公司必须得到自我管理的自由——至少那些解除管制的支持者们是这样说的。“如果某些管制措施对于保证特定的标准（最低标准）得到保障来说是必需的，”辉瑞制药的汉克·麦金内尔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产业内最好的行为已经超过了政府管制，事实上，我们有很多例证可以说明，过度的管制会损害产业。”按华盛顿特区公共事务委员会主席道格拉斯·G.平卡姆（Douglas G. Pinkham）所言，公司现在能够管制自己，应当“获得自由来处理相关问题（比如工人问题或者环保问题）——以具有建设性的方式，这无须以政府管制为核心，而是要创造一种自律的守则”。BP的约翰·布朗秉持类似的观点，他抱怨说，在欧洲，甚至在美国，仍然残留有这样一种信念，认为政府管制和控制才能解决问题。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的人们相信“公司需要管制，我们不能相信它会负责任地管理自己的行为”。“管制和集中控制，不是今天的人们应该选择的方向，”石油生意合伙人吉姆·格雷这样说，“从另一端来看，在生意中，我们必须确保不去利用周围的环境。”^[42]

然而，生意归根结底就是利用周围的环境来获利。所谓公司社会责任的说法不过是矛盾修辞法，正如我之前所论证的，就跟相信公司跟政府一样会增进公众利益的观念一样。公司只有一个义务：增进自己和所有者的利益。它们没有能力按照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感来行事，从而避免导致对人们和环境的损害，或者在与它们自身的利益无关的时候也努力促进公共利益，而它们的管理者也没有权力这么做。

解除管制因此建立在值得怀疑的前提之上，那就是公司会主动尊重社会和环保利益，而无须政府强迫他们这样做。没有人会严肃地建议说因为人们具有社会责任感，个人就应当自己管理自己，而不必设置针对谋杀、攻击和盗窃的法律。然而，奇怪的是，我们却被要求相信，公司法人——这个缺乏任何意义上的道德自觉，并有足够的力量和动机来对这个世界造成损害和破坏的机构精神病患者——应当获得自我管理的自由。

5. 公司无限

“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糟糕的事。”卡尔顿·布朗（Carlton Brown），这个通常情况下非常镇定的商品经纪人被他在2001年9月11日看到的事情深深困扰。“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救他们出来，”他说，“在大厦倒塌之前，我们都只有一个念头，让我们的客户逃跑”——他的意思是，从黄金市场的崩溃里脱身。布朗主要关注的是可能被套牢在黄金市场里的客户。一旦世贸大厦倒塌，这个市场就要关闭。当飞机撞击大厦，布朗说，“你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哦，金价会涨多少？’”幸运的是，他说，“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们把他们都救出来了……每个人的钱都翻了番。”“9·11”“是一次因祸得福的事情，灾难铺天盖地，令人心碎。但是……对我的黄金客户来说，他们赚到了钱”。他说，“灾难也意味着机会。这只关乎财富的创造。”^[1]

公司也是只关乎创造财富、并且是高效创造财富的工具。无论道德、伦理还是法律，都没有任何内在限制能阻挡公司剥削他人来为自己和股东创造财富。“剥削”，按照字典的说法，就是“为了一个人自身自私的目的或者利益而利用”（《新韦氏英语百科辞典》[*The New Lexicon Webster's Encyclopedic Dictionary*]）。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



公司已经寻求并获得了剥削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自然资源和几乎所有地区的人类劳动的权力。早在1932年，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和加迪纳·米恩斯（Gardiner Means）就在《现代股份公司与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一书中指出，

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的早期，在铁路发展的带动下，经济生活的一个又一个方面采用了公司制……在一个又一个领域，公司产生、发展并且或多或少地成为了主导力量……在它过去发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预见到一个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将以公司形式进行的时代。^[2]

这样的时代已经来临。今天，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在以公司的形式进行。然而，对公司控制一切来说，依然存在的一个主要阻碍是：公共领域。

20世纪在现代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广泛地持有这样的信仰，即民主制度需要政府来保护公民的社会权利并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因为其神圣、宝贵而脆弱，而绝不能被公司利用的核心公共利益和社会领域，是由法律和公共政策划定在一个被保护的边界之内的。人不再是被拥有的客体，而儿童不能被剥削，无论是作为工人还是作为消费者。与人类的健康和生存（比如水公用事业以及健康和福利服务）、人类进步和发展（比如学校、大学以及文化机构），以及公共安全（比如警察、法院、监狱和消防）等有关的核心公共机构被谨慎地安置在公司剥削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外，类似的还有珍贵的自然领域，它们被划为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随之而来的，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所有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如今却

受到了攻击。从历史来看，公司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公共领域一直存有敌意，把它看成是把自己从巨大的赢利机会前毫无道理地推开的手。特别是在过去的20年里，它们发动了一场坚决的战役来将这个界限重新推回去。通过众所周知的私有化过程，政府向公司作出让步，并将一些原本被认为在本质上属于“公共”事务的机构拱手让于公司控制。没有一个公共领域能免于逐利公司的入侵。供水和供电事业、警察、消防和紧急服务、日托中心、福利服务、社会保险、学院和大学、科学研究、监狱、机场、卫生保健、基因库、广播、电磁频率、公园和公路，所有这一切，要么遭受了或多或少的私有化，要么正在被谋划着。

结果，我们正在走向一种新的社会，它最终可能很像弗里德曼之类的私有化的鼓吹者所预想的那种模式。弗里德曼曾建议总收入中只有10%—12%应当来自政府，而据他估计，在今天的美国这个比例高达40%—50%。除了要保存最基本的职能，如司法系统、武装力量 and 对于最极端贫困者的救济之外，弗里德曼说，政府不应当再控制任何领域。“私人领域应当大大扩张，”他说，“而且这个领域应当主要由营利企业来运作。”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赞同弗里德曼的观点。比如卡托研究所主席威廉·尼斯卡宁相信，“只有数量非常有限的一些职能”——他惟一能想到的是军事——应当被保留在公共领域。领导弗雷泽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迈克尔·沃克（Michael Walker）是卡托研究所在加拿大的合作伙伴，当他被问到他是否相信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一寸土地都应当由私人来控制，他的回应是热情洋溢的“绝对如此！”^[3]

这样的观点可能仍然会流行，而且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公共领域可能会被缩小到变成一个历史的怪胎。

按照投资银行家迈克尔·莫（Michael Moe）的说法：“最好的投资机会出现在那些出问题的地方。问题越大，机会越多。”而且，“今天已经没有什么问题比怎样更好地教育我们的人民更要紧了”——因此没什么投资机会能大过投资教育。受这种想法的启发，莫帮助募集了超过5亿美元来为爱迪生学校提供资金支持，那是一家营利性质的上市公司，主要帮助地方政府来运作学校，并最终计划拥有并运作自己的学校。爱迪生学校是美国最大的教育管理组织（EMO），目前在它的管理下的一共有133家学校和74 000名学生。它与其他大约40家EMO公司一起，反映了美国一个正在发展的趋势——包括12个年級的初等教育（K-12）的私有化。^[4]

迈克尔·莫认为，因为“教育市场”是一个大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目前很少有公司进入的领域，它就和30年前的卫生保健领域一样，在未来的几年里必然会有急剧的市场扩展。他说，这个产业就跟棒球比赛九局中的第一局一样，从此出发可以进入其他领域。比如，仅在2001年一年里，美国EMO的数量就增长了70%。迈克尔·莫估计，在十年的时间里，保守一点说，总价值8 000亿美元的教育产业中也将有10%由营利性公司来运作，而今天只有1%。他认为，就像在其他产业中一样，政府现在希望将教育产业分包出去。未来政府很可能会转变其在教育产业中扮演的角色，从一个“学校的拥有者—运作者……转变为一个更像是总承包人的角色”。弥尔顿·弗里德曼同意这种说法。“45年来，我一直参与这样的变化，”他在鼓吹私立学校的时候说，“正是在最后的五年左右，我们开始真正地打破坚冰，开始变化。”他预言说，在不久的将来，类似于爱迪生学校这样的公司将会“发展成为运营自己的私立学校的实业”，而并非仅仅运营公立学校。^[5]

毫无疑问，极大的机会正在等着爱迪生学校这样的公司，它们在

设法通过任何重要的方式进入 K-12 教育体系。爱迪生的主席本诺·施密特 (Benno Schmidt) 在谈到教育产业的发展潜力时说,“机会几乎是难以想像得巨大。教育产业要大过国防,大过整个国内汽车产业……事实上,在美国市场,只有卫生保健才会有比这更大的市场份额。”在其他国家也一样,莫补充说,由公司运营的学校在其他国家同样有光明的前景,他列举了加拿大和英国为例,而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国家“正开始以市场驱动的机制来改革他们的教育体系”。^[6]

营利性学校的支持者们运用政治力量来推动这一产业的发展。爱迪生学校最大的投资者中的两位,波士顿银行家约翰·蔡尔德 (John Childs) 和 Gap 服饰的主席唐纳德·费谢尔 (Donald Fisher),最近分别向共和党捐赠了 67 万美元和 26.08 万美元。当小布什承诺会发放 30 亿美元的联邦贷款来资助新的承包学校和愿意进入私立学校读书的学生时,他们一定感到非常高兴,政策的变化将会为 EMO 扩大市场。小布什的其他大金主也在教育产业跑马圈地。比如安利的创始人理查德·沃斯 (Richard De Vos)、工业家戴维·布伦南 (David Brennan),还有沃尔玛的约翰·沃顿 (John Walton) 这样顶尖的商人,都支持小布什的这个决定,并且花费了上千万美元来促使各州采用学券制度,一旦这些制度被采纳,将为 EMO 创造一个有利的市场。^[7]

尽管他们对私立学校拥有这样的热情,从儿童们的学习成果来看,倡议者们认为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效果更好的主张其实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事实上,爱迪生公司之类的主张已经受到西密歇根大学的独立研究成果的质疑,他们发现“爱迪生公司的学生并非如同它在关于学生表现的年度报告中所说的那么好”。^[8]公司还因为其他夸大其词的说法而受到批评,比如把它运营的学校中 1—5 年级、6—8 年级、9—12 年级的数量加在一起算到学校的总数里去,而这些被分



开来计算的年级其实都在同一个楼里，并且是同一个校长。^[9]

但是，这并非爱迪生学校最大的麻烦。它的股票过去曾经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市场达到过 21.68 美元的高点，现在却猛降到不足 1 美元。为了节约它在费城的学校的开支，公司卖掉了课本、电脑、实验器材和音乐器材。它还让行政管理人员搬进教室办公，希望以此来节约一个月 9 000 美元的办公室租金（学校董事会从这一步受到启发，迅速命令主管们搬出学校）。爱迪生学校的创始人和 CEO 克里斯·惠托（Chris Whittle）更进一步计划，公司将使用没有薪金的爱迪生学校学生来代替有薪的学校雇员工作。“我们本来就应该少用一些成年雇员。”有报道说，他告诉一批爱迪生学校的校长他计划让一所学校里的 600 名学生每天在行政岗位上工作一个小时，从而取代 75 名成年雇员。^[10]

私有化的倡导者们更多地从原则上为学校的私有化辩护，认为哪怕在现实世界中学校私有化往往会歪曲变形，但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他们说，基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前提假设可知，利用人们在获取物质财富方面的自利本性，是提高公共福利的必然途径。“人们倾向于以经济激励为动力来做事情，”爱迪生学校的资助者杰弗里·弗洛姆（Joffrey Fromm）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营利性学校应当胜过公立学校——受挣钱的欲望驱动，营利性学校的老师会教得更好，管理者会管理得更好，而公司将会向他们的消费者（父母、老师和学校董事会）提供他们想要以及需要的一切。因此，弗洛姆说：“营利的激励能对学校产生一个正面的影响，”尽管公司“不得不就一个底线而认真思考”。他相信，公司能够“为教育系统注入改革的能力”，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商业社会的达尔文主义……如果在教育体系也能被释放出来，将会在美国创造出更好的教育”。^[11]

私有化因此导致了我們当中大多数人不可避免的自私和物质主义。“我们每天吃到的面包并不归功于面包师傅的好心与善意，而是他对自己利益的关注。”弥尔顿·弗里德曼这样阐释亚当·斯密的观点来说明私有化的优点。而按照弗里德曼和其他私有化鼓吹者的意见，公共机构从本质上来说是有缺陷的，因为他们依赖于一种不切实际的对人类本性的假设——从这点上说，倒并非全然自私或物质主义的。在我问到他的观点与约翰·柯尼斯（John Kenneth）观点的区别时，弗里德曼说：“大区别在于你是否真的愿意接受这样的观念，即政府公仆在追求大的共同体的利益，而并非关注他们个人的利益。这就是我和加尔布雷思（Galbraith）的区别。”^[12]

在某些特定尺度和特定情境下，私人服务可能的确比公共服务更有效，但是私有化作为一个普遍、长期的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是有欠缺的。从哲学上来说，它建立在一个被曲解且不完善的对人类本性的假设之上。自利和物质主义的欲望的确是我们自我的一部分，但远非全部。将整个社会和经济系统建立在这样小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危险的原教旨主义行为。而在一个更现实的层面，私有化依赖于营利性公司来提供公共利益，这是有缺陷的。公共机构的惟一合法性使命就是服务于公共利益，而公司与它不同，公司被法律要求永远要将其自我利益放在其他任何人利益之上。它们可能会因为促进公共利益对它们自身有好处而按照促进公共利益的方式行事，但正如爱迪生学校的费城崩溃所昭示的，只要对服务于它们自身的目标有利，它们就会马上牺牲掉公共利益，而这正是它们的法定义务所在。^[13]毋庸置疑，私有化开启了公司剥削获利的新领域，这正是它们为什么急切地要推动私有化的原因。然而，从公众的立场来看，我们不得不问，当我们让公司来控制社会的筋骨——公共机构时，我们究竟在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

会。须知我们正是依靠这些公共机构来界定我们是谁，并得以联合起来，能够安全地生存并享受生活。

然而，这个问题并不只限于私有化，它还延伸到了一个与此紧密联系的领域——社会的商业化——虽然没有私有化那样正规的步骤，但这也是那些不久前还被牢牢拒之门外的公司向社会领域渗透的重要途径。

每年一度的温哥华儿童节曾经远离商业影响。所以最近一次跟儿子去狂欢节，我们一进门，就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巨大的 Kia 汽车模型当中时，我吓得倒退了一步。充满诱惑的新型车被陈列在草地上，带有 Kia 标志的旗帜在微风里飘扬，花枝招展的年轻女子在场地上走来走去，向孩子们分发宣传材料。儿童节为了换取 Kia 的赞助，允许 Kia 在节日现场做这样的展示。儿子想要玩那些车，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他带开，好去参加儿童音乐家拉菲的音乐会——但音乐会停办了，并且不会再继续。后来，拉菲告诉我，由于儿童节场地里那些看起来像是车辆模型的东西实在讨厌，他才拒绝演出并且退出了儿童节活动。他说：“我只是被那些公司形象给完全弄崩溃了，这……粗劣的商业化。这让我痛苦难熬，在那样的环境下，我根本不能表演。”于是，在儿子的坚持下，我回到那些车所在的位置，他不断纠缠我，坚持要我买给他一辆 SUV，最后同意只要一只充气恐龙，上面有 Kia 的标志。^[14]

后来，在美国冰球联盟史坦利杯决赛期间，儿子又开始纠缠我，这次是要买 24 罐装的蓝带啤酒。他非要那个啤酒附带的史坦利杯的塑料复制品不可，这个促销活动是他从整场比赛过程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广告中看到的。蓝带肯定知道小孩子都是跟着父母来看史坦利杯决赛

的——这是加拿大的国家盛典——也知道大多数成年人不会为了一个塑料的史坦利杯复制品就轻易放弃自己习惯的啤酒品牌。因此，我们只好假定公司的部分目标就是让我的儿子来逼迫我购买他们的啤酒，这看来非常合理——而事实上，就是这么回事。

自从买了那个啤酒（还有被纠缠去购买 Kia 的 SUV），我已经不知不觉成了“唠叨策略”（Nag Factor）的受害者，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市场新战略，将对儿童的操纵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鲁西·休斯（Lucy Hughes）是世界上最大的沟通管理公司极致传媒（Initiative Media）的策略与洞见部门主管，也是唠叨策略的创造者之一，而这一战略解决了一个困扰市场很多年的问题：怎样从有购买意愿但口袋里没钱的小孩那里赚钱？尽管“你可以操纵消费者产生需求，并最终购买你的产品”，休斯说，但儿童构成了独特的挑战。她在几年前意识到，对他们来说，广告的目标不是要让他们自己掏钱，而必须是能够煽动他们去纠缠父母掏钱，而这一点，也正是“唠叨策略”背后最至关重要的洞见。^[15]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休斯和她在极致媒体的同僚们在儿童心理学家的帮助下，开始发展一种科学的细致分类法来区分儿童使用的不同种类的纠缠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对不同种类父母的不同的影响：“我们发现……小孩纠缠父母的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有两种方式：持续不断地纠缠，以及不断强调其重要性的纠缠。前者就是真正的絮絮叨叨：‘妈妈，我真的，真的想要芭比梦幻屋，我想要嘛，想要嘛，想要想要嘛。’……而后者则是说，小孩子会将某些重要的原因与这个产品联系在一起：‘妈妈，我需要一个芭比梦幻屋，这样芭比和肯就能生活在一起，就能有他们的小孩，还有他们自己的家庭。’……小孩子纠缠父母的方式将会影响父母究竟是否会为他们买下想要的产



品。”^[16]

每一种纠缠的有效性取决于父母究竟属于四类父母中的哪一类。“纯粹必要”型父母是数量最多的一类，他们通常属于比较富裕的高消费阶层，但对孩子的牢骚和叨咕却反映冷淡。他们需要一个足够的理由才为孩子购买某件商品。休斯说：“我们努力让孩子以重要性来打动这类型的父母，让他们看到这项产品对于他们的价值和好处：为什么它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在恰当的环境下，父母会接受这个需求。”另外三种类型的父母更容易被持续的纠缠打动。人数最少的“儿童之友”类型，通常是比较年轻的父母，他们会购买各种产品，比如电脑游戏和遥控玩具火车，既给孩子，也给自己玩。“纵容型”是不得不整日工作的妈妈，为了减轻她们不能花费足够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的负罪感，会为孩子买各种东西。“矛盾型”父母，通常都是单身母亲，她们会觉得自己不应该总是给孩子买各种无用的小玩意，却总是在现实中这样做；她们会说自己不喜欢冲动购物，却又总是这样做；她们反对针对孩子的广告行为，却喜欢靠这些广告来帮助自己决定到底要为孩子买什么功能的产品。^[17]

整个公司帝国的命运可能就依赖于市场人员让孩子有效纠缠父母的能力。休斯说：“对于麦当劳，如果不是孩子们的纠缠，父母可能不会去那里。”那么 Chuck E. Cheese's 呢？她说：“哦，天哪。到处吵得要死，孩子太多了。为什么我会想在那里待上两个小时？”休斯说她的公司“想要成为第一个……切实量化（孩子的纠缠）影响的公司”，而她发现“任何一种产品的购买行为中都有 20%—40% 的情况是如果没有孩子们对父母的纠缠就不会发生……例如我们发现，假如没有孩子们纠缠父母，主题公园四分之一的访问量就不会存在。此外，像 Chuck E. Cheese's 这种地方，40% 的访问量都依赖于孩子的纠缠……我们在电

影、家庭影剧还有快餐领域都发现了同样的情形。孩子对父母会购买何种产品的影响是巨大的。”

孩子的影响力超出了儿童用品的范畴，甚至会影响到高端的成人用品，比如汽车。休斯说，“汽车有很多特点对孩子真的具有很大的吸引力，”^[18]——这解释了 Kia 在温哥华儿童节上和《指环王》和《怪物史莱克》这样流行的儿童影视中所作的市场推广努力（按 Kia 的说法，就是“借助流行电影的录像带和 DVD 版本来展示产品”）。然而，Kia 并非唯一一家盯住了孩子们的汽车公司。^[19]日产赞助了美国青少年足球联盟（American Youth Soccer Organization），克莱斯勒在直投邮件广告中使用了孩子喜欢的精美的立体书。而且各家公司的汽车广告中都表现出越来越多的面向儿童的显著特征。^[20]

“从市场推广的观点来看，孩子确实是非常强有力的元素。”市场人员朱莉·哈平（Julie Halpin）谈及利用孩子对成人产品购买的影响力的趋势时这样说。“在玩具和糖果产业，当然总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们也有金融服务业的客户。谁会想到一个研究儿童的机构会拥有金融业的客户？”可真的是这样。^[21]

“孩子们看电视的时候非常开心，”休斯对此大感惊奇，“他们很注意广告……有多少大人真的注意广告在说什么？只有非常少的父母会这样做。”^[22]从市场推广的角度，将目标对准孩子实在是再合理不过，因为它允许广告人绕过了解媒体的父母，利用儿童对他们的父母所具有的那种可观的说服能力。而孩子们还比成人更容易被操纵。休斯和她在各行各业的合作伙伴们可能会同意专家的说法，即小孩子特别愿意接受媒体的操纵——如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所强调的：“基于发育原因，八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能真正理解广告的内容，事实上他们认为广告所宣称的都是真的。这些八岁以下的小

观众不能分辨广告内容和一般的电视节目。”^[23]对于市场推广人员和他们所服务的公司来说，孩子对广告的易感性确实是让他们成为具有如此大吸引力的广告目标的原因。在公司的病态世界里，弱者就意味着呼唤它们去剥削，而非要加以保护。

休斯说，儿童作为“明天的消费者……代表着今天的一个巨大的市场”，因此成为公司的“掠夺对象”。或者用另一位广告策划人的话说：“他们不是儿童，我们更乐于称他们为‘发展中的消费者。’”^[24]“这是否不符合伦理要求？我不知道。”休斯这样说她的工作，但接下来，好像伦理问题是完全不相关的一样，她很快就强调说，她所在公司的角色就是简单地“推动产品的销售，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工作”。即使是对利用儿童的行为持坚决批评态度的拉菲也被迫不无遗憾地承认，“为了促进销售而瞄准孩子只是这个国家的法律所允许公司能做的行为的一部分……公司的 CEO 们正在从事他们的职责——提高利润。”^[25]

拉菲对法律的观点是正确的。1981 年，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撤销了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对面向儿童的广告的限制，这反映了它对市场行为所给予的新优惠。按照那时 FCC 主席马克·富勒（Mark Fowler）的说法，电视不过是另一种家用电器，“一个带图片的土司烤箱，”并不需要特别的管制措施。^[26]一旦禁令被解除，针对孩子的广告行为会大大增多，这一点毫不令人感到意外。哈佛大学医学院专家苏珊·琳（Susan Linn）博士说，“每年，平均每个美国的孩子仅在电视上就会看到 30 000 条广告……拿去年的商品销售与今年相比，就像拿玩具气枪与精确制导炸弹比一样。今天孩子们接触到的所有广告都被心理学家打磨过，它被媒体技术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并且无处不在，它出现在孩子们的每一本书里，也出现在他们生活的每一个隙缝。孩

子们根本无法逃开。”

将垃圾快餐广告直接投向孩子们是儿童市场人员的更引人争议的策略之一。孩子们想要对他们不利的食物，而且就像父母们都知道的那样，如果让他们自己决定，他们除了糖果、碳酸饮料和快餐之外，只会吃更少的食物。公司利用孩子们的易感性，通过广告使得高糖、高脂肪的快餐对孩子来说变得无法抵抗，毁掉了父母们试图控制孩子的饮食计划的希望。比如，在菲多利（Frito-Lay）薯片的一则电视广告中，学校的午餐室里，三个男孩兴奋地从他们的午餐盒里拽出一袋袋薯片，而第四个男孩，因为午餐盒里只有一只香蕉，变得闷闷不乐，并且被其他三个男孩排斥——直到他从一只猴子那里用香蕉换到一袋薯片。即使是个三岁的孩子也能从中得到这样的信息：薯片之类垃圾食品是好的，香蕉是坏的。市场人员为了让孩子们热爱垃圾食物而做的事情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低龄儿童读物会使用 M&M 豆或者雀巢脆谷乐麦片作为例子来帮助孩子学会数数，这反映了产业的智慧：如果你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抓住了他们，那么就真的抓住了。“婴儿们……（在别人念书给他们听的同时）体验到一种保姆或者父母的拥抱，”琳博士说，“他们会将这种温暖怀抱的感觉跟糖果或者早餐麦片联系在一起。”^[27]

批评者们谴责说这样的市场推广策略与儿童肥胖症和最近儿童的相关健康问题的急剧上升有关。琳的意见是：“儿童已经被淹没在那些与高脂肪食品或者对身体无益的食品有关的图像中了。广告已经传达了这样的讯息：‘吃了它，你会感觉更好，吃了它，你会非常开心，吃了它，你就会很酷。’”^[28]

澳大利亚内科医师和研究者的代表维里蒂·纽纳姆（Verity Newnham）这样描述可能的结果：

快餐和糖果业针对儿童市场的过火行为确实对儿童早期饮食的选择产生了影响，使得他们有更多变得肥胖或者在将来超重的危险。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儿童糖尿病。（医生们）正发现更多的孩子患上Ⅱ糖尿病，这种疾病与不健康的饮食和缺乏锻炼有关。孩子们在促销快餐食品的电视广告面前是异常脆弱的。^[29]

最新一期权威性医学杂志《外科刀》（*The Lancet*）强调：“高速增长的儿童肥胖和Ⅱ型糖尿病发病率是一次公共健康危机，这极可能与主要由食品产业创造的‘有毒的环境’有关。”这篇文章总结道：“现在，是父母、老师和公共健康专业人员回到他们本职的时候了，他们必须成为有关孩子食物的真正专家。”^[30]

同时，从市场人员和公司的角度来看，借用商品经纪人卡尔顿·布朗的话来说：“灾难之中总有机会。”面对儿童肥胖症和接近三分之一的女孩现在需要穿戴14号或更大胸衣的事实，一位市场人员看到，“（对于制衣业来说）新的机会就在于为这些女孩提供合身的衣服。”^[31]减肥食品和减肥药制造商也从肥胖症中受益不少，肥胖症不仅带来了更大的体重，还产生了更多的利润。产业代表们为他们的战略辩护，认为不负责任的父母和其他因素要为垃圾食品对孩子们的坏影响负责。全美餐馆同业会（U.S. National Restaurant Association）的发言人汤姆·福克斯（Tom Foulkes）说：“某些美国人中出现的超重现象和肥胖症问题很复杂，有多方面的原因。必须坚持常识和对自己负责的态度——这当中也包括父母的责任。”^[32]加拿大旅馆和餐馆服务业协会负责研究和沟通的副主席吉尔·霍尔洛伊德（Jill Holroyd）补充说：“孩子们不可能自己开车去餐馆。”“在我们看来，真正的问题在于个人责任感。父母们必须有责任感，保证他们的孩子有一个平衡的食

谱，并有足够的身体锻炼。”^[33]

按照哈佛商业伦理专家乔·巴达拉科的说法，“在针对年幼孩子的广告的问题上，我倾向于认为只要广告收敛一些，就没什么问题。”然而问题是，广告运作得很好。垃圾食品的市场人员声明自己没有责任时，他们其实跟烟草行业长期以来认为烟草广告不会促进吸烟一样似是而非。像休斯这样的市场人员努力工作，设计种种方案来鼓励孩子纠缠父母购买垃圾食品、带他们上快餐店。对父母来说，当孩子已经被广告商鼓动来质疑父母在吃什么这个问题上的权威，并且已经被说服真的需要广告里的产品，是很难对孩子说“不”的。在这些时候，如果说“不”，结果通常是孩子闹脾气，发火，大发雷霆，直到造成家庭矛盾——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父母倾向于选择把孩子放进车里直接开去麦当劳。那些致力于挑动孩子和那些敢于说“不”的父母大闹的行业反倒谴责父母不拒绝孩子们的要求，真是过于恬不知耻。

幸运的是，广告界还有一些人对自己做过什么抱有诚实的态度。“我是个撒旦的混账锤子，”一位非常成功的电视广告导演和配音演员克里斯·胡珀（Chris Hooper）这样形容他替麦当劳、可口可乐和其他大公司所做的工作。胡珀说，他的工作就是去创造“图像来推销人们实际上并不需要的产品”，并且“鼓励那些一知半解的、不负责任、享乐主义的、自我中心的、自恋的行为”。不过，“这种奇怪的、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不爽的感觉”在他的行业里人人有份，这让他稍微得到点安慰。他说：“你知道，如果我不得不再做一个关于麦当劳的广告，我也会去做，因为——我知道这听起来像纳粹党徒之类的人——如果我不做，自然会有别人来做。”胡珀也做一些免费的反公司的广告节目，以此来抚慰自己的良心。比如为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的总统竞选节目配音。^[34]

专注于儿童文化研究的传播学专家斯蒂夫·克莱因（Steve Kline）指出，不仅仅是儿童的身体受到公司剥削性市场行为的不良影响，儿童的心灵也是如此。克莱因相信玩具行业目前流行的“推促式饱和营销”正在导致“孩子想像力的衰减”。与公司形象挂钩的玩具——例如培乐多（Play-Doh）在麦当劳欢乐套餐内赠送的模型、美泰玩具（Mattel）为麦当劳汽车外卖服务提供的芭比娃娃，还有汉堡王和餐点一起附赠的黑衣人玩具，或者是像跟特种部队和救火英雄（Rescue Heroes）这样的电视剧、星球大战和蜘蛛人之类的电影相关的玩具——将孩子的游戏变成“一场高度重复的台词再生产过程，而这些台词统统由玩具厂家提供”，克莱因说。结果是，孩子们失去了他们“自创意义”、“自我传递”、构建自己的小世界并穿行其中的能力。^[35]

克莱因说，孩子们真正需要的是能够激发“创造性破坏”能力的玩具，这是包含想像、创造、破坏和再创造的过程，“给他们一种神奇的能力，帮助他们探索世界的自然规律。”然而，在靠推促式营销带来高额利润的情况下，公司不可能制造这样的玩具。克莱因说，今天，玩具公司无疑在售卖更多的玩具，“在关联项目启动之后，玩具销售激增。”即使是典型的“创造性破坏”玩具公司乐高积木（LEGO），基于对企业底线的考虑，也被迫采用了关联战略（虽然克莱因作为该公司的顾问曾提出抗议），并且开始制造基于流行儿童电影中的人物和场景的系列玩具，比如星球大战和哈利·波特^[36]（同时，旧款的带有“创造性破坏”特性的乐高积木现在被用在管理课程里来激发公司管理人员的创造力和想像力）。

克莱因担心，儿童世界日益被逐利的大公司共同重新定义，“被公司包围的童年”正在出现，儿童越来越生活在“品牌包围”之中。克莱因说，“现在的儿童”不能“想像那个还没有被公司完全重构过的世

界……不能想像在商业领域之外还有其他的路可走”。我们先“将孩子变成了消费者”，但在让他们成为“合格的公民……具备善、道德和高尚情操的人类”方面就颇为乏力。苏珊·琳同意克莱因的说法，并补充说，面对世界的超商品化，我们正在接触这样的孩子，他们觉得“我的优先权”就是一切，我们无法灌输给他们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权利和责任以及“合作……与其他人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一起工作，一起娱乐”的价值。^[37]

今天事实上已很少有什么地方的孩子能够从公司逐渐侵入的影响中逃脱。即使是他们的学校也已经变成公司市场营销和宣传的平台，因为学校董事会要用它来交换金钱和产品：

- 在记分板、屋顶、BBS、墙上、电脑屏保、课本封面和学校的网站上为公司提供广告位。
- 与公司订立合同，允许他们的产品在学校的自动售卖机和食堂里独家售卖。（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在这方面臭名昭著。）
- 订立资助协议。（比如，富国银行[Wells Fargo Bank]支付12 000美元以换取在亚利桑那州高中运动大会上冠名的权利。）
- 接受企业策略性的慈善事业。（比如我儿子所在的学校让学生佩戴一家本地牛奶公司的标志，学校以此换取该公司的捐助。）^[38]

通过向学校免费提供教学用具，公司已经侵入学校课程来促销他

们的产品（比如由麦当劳赞助的营养学课程，就会使用巨无霸来展示四种食物组合）^[39]，并宣传他们的观点（比如宝洁公司在学校内推行的“地球决策”项目，它强调“合理地砍伐树木……能为野生生物创造新的栖息地。宝洁采用这种经济环保的方式是因为它最近似地模仿了自然进程。合理砍伐也使得森林地面更多地接触阳光，因此刺激了动物所需食物的生长”）。^[40]

在许多学校里，电视广告是学生日常事务的核心部分。爱迪生学校创始人克里斯·惠托的一个方案“第一频道”在10分钟的新闻节目后加入2分钟的学校广告时段，这个方案在各学校与爱迪生学校公司签订的3年合同中约定，至少要有90%的学生每天都要看到这些广告。作为交换，学校则得到公司提供的卫星电视天线、两台录像机，每个教室一台电视机以及配线和其他维护设备。尽管一些州禁止第一频道进入当地的教室，公司仍然宣称，该频道已经涵盖了全美40%的中学和高中学生。第一频道的支持人强调学生所得到的免费设备和接触新闻的机会，同时宣称，就和烟草和垃圾食品的广告一样，广告对学生毫无影响（这不禁让人怀疑他们会不会对潜在的广告主也这么说）。然而，研究表明接触这些节目令学生对这些产品的评价更高，激起他们购买广告中产品的欲望，同时也推动了对消费的物质主义态度，这样一个研究也许可以部分解释这个结果：“学校允许这些产品广告进入学校，实际上就已经盲目地为这些产品作了背书。”^[41]

公司围着学校打转的原因跟他们做其他任何事的原因没有区别——都是促进他们自己和股东的经济利益。“如果存在关于赞助材料的基本规则，”一家教育市场公司的埃德·斯旺森（Ed Swanson）强调说，“那就是它首先必须满足市场推广的需要。”“任何能看到我们广告的孩子都是正在被训练的消费者，”另一位教育市场推广公司的管理人

员约瑟夫·芬顿这样来描绘公司围着学校打转的好处。“你肯定想在消费者最具可塑性的时候抓住他们。”^[42]

学校正在被公司用各种形式的广告和推广活动包围成一个孤岛。然而，它们只是更广泛地被商业化的社会的一个缩影。广告现在已经让我们无处可逃，出现在我们的电视机和电脑屏幕上，门外的大广告牌和电子指示牌上，包裹在公共汽车和地铁的车厢上（有时甚至覆盖窗户），或者在博物馆、音乐会、画廊、体育活动中，这些广告越来越像替赞助者吹捧的骗子。然而，在所有这些逐渐侵入的商业主义的可见标志之外，一种更加微妙的过程正在进行中：我们作为社会动物进行互动的场所——我们的公共空间，也在不断被商业化。

“公共空间，”纽约 AT&T 广场上的标语牌宣称，“由 AT&T 拥有并维护。”“街区”——这个不但用来指称具体的街道，更用来指代广场或者镇中心广场之类公共场所的词语——在关于民主的想像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它是一个公共的城市空间，一个人们相会并聚集的场所，人们在那里集会、抗议、游行、示威、通过扩音器喊口号、传达各种各样的信息，或者仅仅是享受置身公众当中的自由。言论自由的观点曾经从街区那里汲取很多力量，无论是通过伦敦海德公园肥皂箱子上的演说，还是商业街上的民权和劳工游行。^[43]

然而，当郊区的乡镇中心让位于购物中心，当市区的人行道被商业化的天桥和地下通道代替时，街区正在走向消失。一位评论员观察到这样的情形：

人行道正在起变化。它们逐渐移入私人产业的大门内。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已经见证了公共生活中发生的传统街区的

销蚀。汽车、摩天大楼、分散化的居住区，以及购物中心造成了行人导向的位于我们这个城市核心的街区生活的死亡……公民生活现在只能位于那些属于私有的公众步行场所了，通常是连接高楼的天桥、地面上的办公室以及零售场所、大楼的中庭和购物中心以及连接着商店的地下通道这种地方。^[44]

例如，在多伦多的市区中心，地下通道连接着1100家商店和服务机构，63栋大厦，19个购物中心，5个地铁站，4座宾馆，股票交易所以及市政厅。36家主要的公司拥有组成地下网路的各种建筑物，而它们每天被大约10万行人使用。^[45]

超过80所北美城市拥有同样的封闭的行人系统，尽管有时它们表现为过街天桥而非地下通道。^[46]比如，明尼阿波利斯的几乎整个市区——成千的商店和服务机构、4家主要的百货公司、政府大楼、公司总部——都是由超过7英里的过街天桥连接起来，每一部分都是由天桥连接的大厦所属的公司所有并加以维护（有时是政府机构）。过街天桥外层涂画着各种广告，其中很多都是由CityLites USA提供的——一家自称为“天桥广告提供者”的公司，它自夸说它的“背光照明广告项目使得它的广告每周能被100万名高消费阶层的决策者所看到”。^[47]

城市地下通道和过街天桥，和郊区大购物中心一起，是为公众互动设计和利用的，但却控制在私人拥有者手中，一般来说是大型公司，控制了这块地盘上谁能进入、什么事情可以发生。安全保卫和监视系统无处不在，因为就像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所有者必须维持一种有利于商业的氛围，因此有必要禁止那些他们认为会妨碍这一目标的公众分子和活动”^[48]——比如，工会纠察、抗议示威、到处发传单的，以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因为大型购物中心、地下通道和过街天

桥都是私人领域，相对于纯粹的公共领域，公民争取言论自由权和其他类似的活动在这里更容易遭到阻挠。^[49]这些地方的设计和装饰也通常会致力于为中产阶级和高消费阶层而不是其他人制造舒服的氛围。

在住宅区，带有大门的住宅区被从周边区域里隔了开来，被一系列关于使用与服务的契约管制着。这种住宅区里现在居住着多达 400 万的美国居民。用某项研究的话来说，它们代表了“一种趋势——政府对土地使用的控制减弱，公共服务不再依赖政府来提供，相反的越来越依赖于私人建立的管理制度和私人提供的服务”，而且“提供了一种新的更加有力的方式，让付得起钱的那群人得到更好的社区管理和隐私保护，并把不受欢迎的人和行为阻挡在外”。

当城市街道被私有的地下通道和过街天桥、带有购物广场的郊区市镇中心以及由有着大门的社区组成的自治区域代替，公共空间就面临着公开的商业化。然而，在这些公开的变化形式之外，还有一些变化非常微妙，以至于你都无法察觉它们正在身边悄悄地发生。

设想一下，你正在一个国家公园里沿着废弃的铁轨行走。一群年轻的徒步爱好者站在铁轨旁边，激动地大声交谈。你无法回避他们的谈话，“他们肯定会谈到他们身上背着的背包有多棒，” Big Fat 市场行销公司的 CEO 乔纳森·雷斯勒（Jonathon Ressler）说，“他们讨论徒步了 84 000 英里之后，其他的背包会如何损害你的背，而这一款非常特别，它会……如此这般……它真的非常舒服。”雷斯勒说，他们“其实是在传达此类信息”给你——而你在挑选某种产品的时候，丝毫没有意识到，你实际上是在和 Big Fat 公司雇用的一群专业演员一起挑选。^[50]

秘密营销（undercover marketing），这就是此项技术的名字。它的



发明者正是雷斯勒，按他的说法：“它随处可见。酒吧里、足球场上、购物中心、地铁、电影院……漂亮的是，如果执行人员做得够好，那么即使它正在发生，你也无法察觉。所以，它每天都会随时随地出现在你的身边——我知道这有些吓人，但就是这样，它会出现在你的周围，任何时候都有可能。”

雷斯勒说，事实上，面对秘密营销，我们是无处可逃的。就在很普通的一天，“到你要去上床睡觉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收到八到九个不同的秘密信息。”早晨你离开公寓，可能会注意到门童脚边有一排盒子，都来自某个网络商店或者邮购卖家。“哇！肯定有很多人都从这家公司买东西，”你会这样想。雷斯勒则说：“你所不知道的是，是我们花钱让门童把这些空盒子留在那里的。”

接下来，你开始等公共汽车，“你会听到一群人在讨论音乐，他们会把耳机传过来传过去。‘哇，真棒！你知道我听的这张唱片很难找的，但我听见他们说某某商店有卖呢！’”再接下来，你去上班，发现公司的冰箱里摆着某个牌子的饮用水。你喝了一点。雷斯勒说：“你会想，‘哇！这水真不错。’可能是谁把水放在这里的。”到了午餐时间，你来到公园，找到一个长椅坐下。旁边的人“正在谈论……他们听说的一家很火爆的餐馆，你就想，‘嗯，周五晚上正好有个约会。也许我应该去那里试试看’”。

当你回到公寓，把垃圾拿到回收站的时候，你又会发现“一排来自某个在线商家的盒子……‘哇！肯定有很多人都从这家公司买东西’”。

你去泡吧。正排着队，你注意到门童脚边摆着一溜某个品牌的饮料瓶子。他们喝这种饮料，而且将之派发给等座的人。然后，你终于进去了，你站在吧台旁边等着点单。某个姑娘——雷斯勒说，

“我们一般称之为‘托儿’，因为酒吧拥挤，她们通常就一直斜靠在吧台附近”——拍拍你的肩膀：“要不要试试这个牌子？”这时，即使你“是个孤僻的人……也会问一问，‘Hey，这个牌子的东西是什么？我从来没听过’”。雷斯勒说，“好，你中计了！”关于这个牌子的信息很快就会传播开来，从你开始，传向酒吧里的其他人。“一个生意很好的酒吧，派进去三个托儿，在一个小时之内，每个人都会点这种饮料。”^[51]

“秘密营销的全部关键就在于，你不知道它正在发生。”雷斯勒这样总结。这种手段是建立在欺骗手法的基础之上的，这就是为什么秘密营销的执行人员必须签署保密协议——如果有人问他们是否愿意从事秘密营销的话。“从技术上来说，他们可能必须不诚实，说‘不’，”但是在公司的非道德的世界里，它被接受是毫无问题的。事实上，雷斯勒表示他对 Big Fat 公司恪守诚实这一点非常自豪——“我们告诉你的都是真的。”^[52] 尽管雷斯勒说得很漂亮，但是秘密营销就是以欺骗作为其核心要素的——不仅仅是雷斯勒的 Big Fat，雇佣他们的公司也一样，它不过就是不受限制的公司为了追求利益到底能怎样不择手段的另一个例证。更进一步的是，秘密营销揭示了当代的社会商业化程度究竟有多深。

“在你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上，公司已经从根本上取代了教会的位置。”爱迪生学校的赞助人迈克尔·莫这样说。他认为，公司想要获得以前由教会拥有的权力。“顺从的委托人……乖乖付钱，谨遵要求。”人类的本性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普世皆同的。它通常反映了人们所栖身的社会秩序。回看历史，占统治地位的组织会为它们的臣民缔造角色要求和身份认同，使之与它们自己的组织特性、需求和利益相

符合：害怕上帝的人受制于教会，地主和农民受制于封建秩序，而公民则受制于民主政府。^[53]

当公司逐渐开始控制社会——透过私有化和商业化——它对于人类本性的理想概念毫无疑问也将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概念。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前景。毕竟，公司是被精心设计的精神病人：完全地自私自利，没有能力关心他人，无道德，没有良知。一句话，非人化。就像诺姆·乔姆斯基所说，它的目标就是“确保与之交往的人类，你和我，统统变得非人化。你不得不把人类大脑自然存在的多愁善感，比如关心他人、同情、团结，之类统统驱逐出去……理想的状态就是所有人都变得与他人毫无关联，不再关心任何人……他们的立身之本，他们的价值，‘仅仅在于创造多少需求我才能满足？我究竟能担下多少债务，最后仍然能创造出令人满意的需求，并成功抽身而退？’如果你能创造一个社会，其中最小的单位是人和管道，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么这就是理想社会”^[54]。

诺姆·乔姆斯基说，私有化背后的“主要驱动力不仅仅是华尔街的利润”，还包括公司对人性的特别界定的不断重复与巩固。比如说，社会保险系统的私有化，在他看来，部分动力就是为了“破坏一条极端危险的社会保险的基础原则，那就是……你关心街头的寡妇是否有东西可吃……你不应当这样。你的目的被设定成获取资源，你忘掉自己以外的一切事物……学校也是相同的情形。随着私有化的进展，你就是在破坏公共组织所依赖的社会团结，也就是我会去关心巷尾的孩子是否会去读书这种事情。好，必须保证破坏掉这些，因为你应该只管你自己，而不是其他人”^[55]。

哲学家马克·金维尔（Mark Kingwell）补充说，“从公司的角度来看，理想的公民应该是一种疯狂的贪婪消费者，”受某种“病态的自利

原则”所驱使。^[56]在现代商业公司诞生一个半世纪之后，这个按照人类精神病人的样板构造起来的虚假的“人”，现在开始按照它的预想再造真实的人类。

克里斯·巴雷特（Chris Barrett）说，他曾经“真的愿意去做任何事情”，只要是为了他所在的公司。第一美国信用卡公司（First USA）资助了他和他的朋友卢克·麦凯布（Luke McCabe）的生活。卢克说他愿意将第一美国的图标文在身上，只要公司需要他这么做。克里斯补充说，这样的文身“是个好东西，当你有了孩子，他们问你，‘爸爸，这是什么意思？’你就可以给他们讲这些很棒的故事。就像我们的父辈有战争故事可以讲，我们有公司的故事。”“对极了！”卢克说，当被问到他会将刺青文在身体的什么位置时，他则表示“要等公司告诉我该怎么做”。^[57]

克里斯和卢克是这个世界上第一批“公司赞助的个人”。他们在十几岁的时候计划进入加州的大学读书，参加圣地亚哥大学的招生宣传时却得知，每年会花费让他们望而却步的40 000美元。极度受挫的他们回到旅馆房间，打开电视。老虎伍兹正戴着他的耐克帽子挥舞高尔夫球杆。“我们发现，他只要戴着帽子出现在某个记者招待会或者其他类似场合，就能从赞助商那里拿到几百万美元。”这启发了卢克。他意识到，他们可以比伍兹走得更远。他们可以把整个生活拿出来让公司赞助，而不只是一场高尔夫球赛。^[58]

他们创建了一个网站——ChrisAndLuke.com，在这个网站上他们承诺成为公司的活广告，只要公司为他们支付大学学费。超过15家公司联络了他们。克里斯和卢克选择了第一美国信用卡公司，这家公司隶属于第一银行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Visa卡发卡

机构。大学学生是公司的重要市场。^[59]

作为对赞助的回报，第一美国公司要求他们在大学校园里向学生推销信用卡。克里斯描述道，就是告诉大学生们，“你需要一张信用卡……你也许要了解正确的使用方法。”除了这个，合同要求克里斯和卢克必须遵守法律——“我们不能离开这里，不能被逮捕，不能杀人，”克里斯说，还必须保持至少 C 级的大学成绩。然而，并非所有的要求都白纸黑字地写在合同条款里，比如，他们与公司的协议没有关于他们是否能参加反公司游行的条款，当被问到这一点时，克里斯推断说，“既然我们被公司资助了，我们或许也可以去帮助其他学生，令他们认识到公司也许不是他们想的那么坏。”“没错，”卢克补充说，“像那些参加反公司活动的人，可能只盯住一两件坏事不放，没看到公司为社会做的好事。”^[60]

克里斯和卢克根本没有任何意愿来与公司对抗，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发现他们正受到赞助者的限制。事实上，既然他们的生活都由某个公司来赞助，他们对这种制度形式当然是好感居多。

卢克：我对公司世界相当信任，因为它会一直存在下去。可如果你不信任它，说不定事情就变糟了。所以我们还是要信任它。

克里斯：在我看来，人们必须理解，公司正在竭尽全力做到最好。他们总是帮助他们所在的社区和国家解决困难。

卢克：我的意思是，若有一些大公司花费金钱，哪怕只是一点点，用于帮助孩子获得教育，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帮助其

他人，这毫无疑问是一件具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只要他们继续费些心思给孩子们提供教育和文化资助，我觉得都是好事。^[61]

克里斯相信他和卢克已经“以一种积极的方式为公司接管社会的行动作出了贡献”。公司资助在他看来有着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潜力，甚至包括无家可归者。某天在纽约市，他看见一个流浪汉在街头自己的地盘上草草装上一台电视机，然后在那儿看电视。行人们有时会停下来，充满兴趣地看这个看电视的人。有一些行人还会站在旁边跟他合影。克里斯觉得这里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流浪者可以去找一家公司来资助他的生活。举个例子，宝丽来可以雇佣一个摄影师来为路人拍跟流浪汉的合影来促销他们的相机，摄影师能得到来自公司的资助金，而路人则得到免费的照片。卢克说，流浪者和很多其他需要帮助的人都可以从克里斯和他的故事里获得启发，因为这个故事说明，“只要有坚持到底、竭尽所能的意愿，基本上任何人都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62]

然而，正如评论家亚历克斯·莫尔纳（Alex Molnar）和约瑟夫·里夫斯（Joseph Reaves）所指出的，克里斯和卢克“实际上象征着商业化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不断被接受并成为标准”。^[63]“社会与生活的某些领域对于公共利益来说因其宝贵、脆弱、神圣、极其重要而不能甘愿受商业利用，”这一观念看来正在逐渐失去其影响力。事实上，存在一种公共利益，一种普遍的善，它超越我们的个人自我利益之上，这样的一种观念已经渐渐消失了。我们一步一步地被告知商业潜力是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为了利润，公司应当可以自由地剥削一切人一切事物，人类不过是追求纯粹的自我利益和物质欲望的生物。这些构成了一个正在发展成型的秩序的基本要素，而这一秩序可能被



证明与历史所产生的一切原教旨主义一样危险。对于一个为了利润，所有人所有事都可以被占有、被控制、被剥削的世界里，每个人、每件事的命运也就必然会如此。

6. 估算未来

20 世纪，这个世界在跌跌撞撞、步履蹒跚地朝更民主与更人道的方向前进。更多国家拥抱民主的理想，而以往的民主政府更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进一步扩大了民主的范围。包括美国罗斯福新政和此后各项措施在内的各种社会规划和经济管制，构成了 20 世纪中期西方政府保护其公民利益不被市场所忽略、并免受公司剥削的广阔运动。然而，从 20 世纪后半期开始，政府开始退缩。在公司游说和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它们开始采纳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解除管制使得公司免受法律的制约，私有化则给予公司更多的力量，进入并控制了此前一直被排除在外的社会领域。到 20 世纪末，股份公司已经成为世界上占据支配地位的组织形式。

然而，从历史来看，一切占支配地位的制度都必将走向暗淡。帝国、教会、独裁，这些曾经在历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的形式都已经被推翻，消失或者消弭于新的秩序当中。股份公司不可能违反这一历史规律而长存下去。它无法解决这个世界上最紧急的各种问题，甚至促使它们走向恶化：贫穷、战争、环境破坏、不健康。越来越多的人——行动主义者，居住在小镇上的美国人民、全世界的穷人和被剥夺公民权者，甚至包括某些商业领袖——都相信理性化的贪婪和以自私自利

为己任的原则必须给更多的人类价值让路。尽管公司资本主义的崩溃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达成，但人们已经越来越无法容忍这个制度的存在。棘手的问题是，现在，我们能够对公司，或者利用公司做些什么。

1997年11月25日，我从办公室的窗户向外看过去，见到几千名学生涌出了教室和宿舍，齐步穿越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与警察排成的人墙对峙。学生们在抗议亚太经合组织（APEC）高峰会谈，这次会议集合了包括克林顿和当时还没有声誉扫地的印尼总统苏哈托在内的各国领导者，进行促进经济全球化的自由贸易议程。我冒险出去——一手拿着宪法，一手拿着我的图书馆借阅证（它表明了我在这所大学里法学教授的身份）——试图保护学生们的公民权利免受过于激动的警察的侵害。当然，我的努力毫无作用。

真正让人惊讶的是，这样一场抗议竟然真的发生了。我曾经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的大部分北美学生忙着建投资模型，而不会参加社会运动，然而这里成千上万的学生勇敢地面对辣椒水和警棍为理想而斗争。更不寻常的是，学生们抗议的是股份公司——抗议它们对环境的破坏，对工人的剥削和压榨，以及对人权的践踏。大萧条以来的许多年里，公司问题被其他问题所掩盖（公民权利、越南战争、种族与性别政治），这是公司从那之后第一次成为政治抗议的焦点。在19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头几年，无论在什么地方，经济全球化的设计者们身后都是抗议者。1997年温哥华对APEC的抗议之后不久，西雅图也爆发了大规模示威——媒体称之为“西雅图之战”——起因是在当地举行的世贸组织的一次会议。类似的抗议迅速在北美和欧洲蔓延开来，最近的一次则是2003年，针对在日内瓦举办的G8峰会所为。

尽管一些商业领袖把反全球化的抗议者们贬斥为无知且对社会不满的边缘分子，但大部分商业领袖明白，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不怕伤害甚至死亡的威胁，这已经反映了社会上广泛且深入的愤怒情绪。《商业周刊》警告说：“在过去的几年里，发生在西雅图、华盛顿特区……以及布拉格的驱散躁动的示威人群的行为，是非常严重的错误，领导抗议的许多极端主义者可能都只是在政治边缘……然而，如果全球资本主义的缺陷得不到重视，它的反弹可能会愈加严重。”^[1]

艾拉·杰克逊，一位波士顿的前银行家，现在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院长，警告说，反全球化的抗议行动是一个标志，它表明商业可能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他认为对公司体系日益增长的不满可能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成为“一个潜藏的，可能比西雅图、达沃斯和布拉格街道上曾经发生过的示威大得多的反弹”。他说，对于商业而言，已经没有时间“在里兹饭店狂欢”，尽管“资本主义已经再无竞争者，而资本主义的规则……已将其他规则抛在后面”，而这也可能变成一个“怨恨和潜在的反弹”的来源。艾拉·杰克逊认为，面对目前世界上一半人口仍处于贫困，地球正向生态危机盘旋前进的情况，除非公司改变运作方式，否则马克思关于资本家会把自己吊死在他们毫无节制的行为上的预言将会变成现实。在杰克逊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很吸引人，因为跟圣经一样，它是关于道德的论述。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于，“我们拥有一个不需要道德，不需要圣经的整体理论。”他警告说，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我们成了生意的私生子，在全球层面上都将无法继续存在。”资本主义需要《共产党宣言》作为道德上的平衡，“它其实是为资本主义准备的宣言。”^[2]

在安然事件和潮水般的丑闻随之而来之前，哈佛商学院教授乔·巴达拉科发现，反全球化的抗议，尽管其意义非常重要，但还未能“在美国中产阶级中……引发共鸣”。然而，随着安然事件的发生，“出现了与政客和公司有关的各种丑闻，”在这之后，美国的中产阶级开始加入到反全球化的抗议中，来发泄他们对公司的愤怒。丑闻越多，人们对于公司的不信任就越高涨，甚至可说与大萧条期间同样高。^[3]

最近，世界三大顶尖商业思想家——哈佛的罗伯特·西蒙斯（Robert Simons）、麦吉尔大学的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牛津的库纳尔·巴苏（Kunal Basu）——共同签署了一个关于公司的声明。他们警告说，“资本主义正面临危机。”关于华尔街的丑闻“只是黑色冰山的一角”，在这背后隐藏着“一种日益被自私界定的文化形式”，对商业，“我们最珍视的一切”，构成毁灭性的威胁。他们认为，CEO们“已经学会了几乎不假思考地重复公司的存在就是为了最大化持股人的利益这样咒语般的句子”；他们被训练得相信自我利益是“商业的第一法则”。“水涨船高”的观念，虽然从根本上来说很难令人相信，还是被生意人认为是“合理化了他们在外人看来是自利的那些行为”（教授们认为，这种说法在现实面前站不住脚。他们指出：“在长达十年的经济繁荣时期的顶点，仍有1/6的美国儿童生活在官方认定的贫困境况下，26%的劳动力只能获得跟贫困线持平的工资……超过30%的家庭，哪怕算上住宅和投资，也只有不到一万美元的净资产。”）。教授们说：“最近针对全球化的反弹，只是追讨资本主义在穷国对贫苦的人民许下却从不兑现的诺言——对他们来说，水涨了，但船却并没有走高。”^[4]

许多生意人都同意教授们的这些观点。但是公司当下困境的补救

方案究竟是什么呢？过去，至少在上个世纪，人们在丧失了对公司的信任之后，转而在政府求助。然而，今天，许多商业领袖坚持认为，政府管制不再是一种能够减少公司造成的损害的选择。他们坚持认为市场是对商业行为的最有力量也最合适的调节器。

“当政府开始回撤，当公众对公共机构的信心如此之低，当资本主义和公司变得如此强大有力时，我们需要的不是干预更多的政府，”艾拉·杰克逊说。市场，而非政府，才是解决之道。“顾客、消费者和雇员是新资本主义的国王和皇后，我们必须开始负责任地行使权力、利用机会。”杰克逊认为，当他们支持社会责任的时候，商业领袖们不是“被一群社会主义者拉着”，也不是“因为政府把枪抵在他们头上”，或者“因为他们忽然读到一本关于印度教或全球道德的书”。事实上，“他们明白市场要求他们这样做，这样做会让他们具有竞争优势。”这就是 BP 的约翰·布朗成为杰克逊心目中理想 CEO 的原因：“他既不是拿着伦理道德装点门面，也不是骑着道德的木马。他并不相信 BP 的目标就是一天结束时能比别人行更多善事。他和其他人努力所做的一切，和他们开始将社会责任看做商业的新准则的原因，都是受到了市场变化的影响。”

艾拉·杰克逊认为，布朗和其他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业领袖们都明白，利润和良知并非水火不容，二者之间的融合点在于：“存在着—加一等于五或等于七或等于九的可能。”^[5]

许多商业精英同意艾拉·杰克逊的观点。比如博雅公关的 CEO 克里斯·科明萨拉夫斯基说过：“公司的社会责任就是今天的公司使命。他们没有选择。事实是，你可以看看这些研究，无论是我们的还是其他公司的：影响意见形成的人……都在这样对公司说，‘是的，我们希

望你们赢得回报，但是我们希望你们使用正确的方式。我们希望你们以负责任的方式。我们不希望你们滥用环境资源，我们不希望你们违反伦理道德，我们不希望你们侵害其他人的权利。我们希望你们使用恰当的手段，我们会帮助你实现这个目标。’”

辉瑞制药的领导人汉克·麦金内尔持同样观点。“如果你认为你的任务就是以牺牲所有其他人为代价来让利润最大化，那么‘所有其他人’就会认为你是个需要解决的大问题。”BP的约翰·布朗相信人们对公司的焦虑——他称之为“在公众情绪里安静地栖居着的巨兽”——会被公司的社会责任所驯服。“如果我们要赢得公众的接受与信任，我们就必须更加进步。”^[6]

罗伯特·蒙克斯与约翰逊分享同样的信念，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市场而不是更多的政府管制——“根本不需要更多的政府干预，”他说，因为“只要市场拥有足够的正确信息，它就可以并且将会做出恰当的回应”——但是他认为股票市场而非消费者市场才是阻止公司滥用行为的手段。^[7]因为现在非常多的人都拥有公司股票——通常是通过他们的退休金计划，持股人可以充当“公益的良好代理人”，并且运用他们作为股东的权利来保护社会和环境不受公司的侵害。

渐渐地，双方（通过退休金信托投资计划持股的股东和更广大的公众）实际上就成了一回事……实际上，他们就是公众本身。和所有普通人一样，这些退休人士不仅仅希望获得足够的回报来满足精致的生活，同样也希望生活在一个文明、清洁并且安全的世界。^[8]

因此，罗伯特·蒙克斯相信，如果持股人成为一股“有效的、信

息通畅的、有能力的反对力量——管理层必须对他们负责”，市民们本来需要通过政治程序来寻求的一些利益，现在可以通过自己成为股东来获得了。这个想法被蒙克斯称为信托资本主义，意在“回归所有权的古典价值——这种价值要比公司制早很多，并且在很长的近代时期里避开了公司制”。^[9]

无论是按照蒙克斯股东可以成为“公益的代理人”的说法，还是按约翰逊的模型，消费者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核心理念都是同样的：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公司可以并且应当被市场而非政府管制体系所控制。在这些模型中，人们究竟决定购买何种产品或者何种股份的行为都被看成能够具有某种政治属性、能够成为对公司行为的有效限制。这些模型——其中有两类以约翰逊和蒙克斯的处方为代表的方案最为广泛传播，分别被称为“消费者民主”（consumer democracy）和“持股人民主”（shareholder democracy）——并非完全不可信。公司有时候确实会改变它们的行为，走上积极的道路，来取悦或者安抚持股人和消费者。然而，它们由于不能提供政府管制有效可信的替代物而终告失败。

民主的一个前提就是，所有的公民一律平等，至少在政治领域内是如此。一人一票，无论财富多少，社会地位如何，这就是说，在与公司的关系问题上，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来要求这些强大有力的实体必须如何行动。将对公司的管制从政府移交给市场，使得公司不再受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影响，而对公司的控制被交给这样一个机构，在那里，根本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美元一票。“在一个民主社会，至少每个人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哈佛工会方案（Harvard Trade Union Program）的行政主管、政治经济学家伊莱恩·伯纳德（Elaine Bernard）说：“无论是最底层的公民还是最显贵的公民都只能投一票。

但是当我们将这个权利转交给市场，最贫困和最富有的公民就完全不会平等。一方将获得非常集中的权力，甚至完全碾碎对方。所以，这就是我们总是觉得有必要对市场实施管制的原因之一。”^[10]

像约翰逊那样，认为消费者是新资本主义的国王和皇后，这样的说法轻松地忽略了以下事实，即，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口贫穷到根本无法参与消费经济——约翰逊也承认“30 亿人口仍然生活在贫困的境地”。此外，即使是能够参与消费经济的人，他们之间也极可能存在着极大的收入差别，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中的某些人拥有更多的“票数”，而其他人则很少——很难让人把这种方式叫做民主。而且，约翰逊必须假设消费者做出消费选择的任何时候总是会考虑到社会或环保的目标，而这样的假设是很可疑的。查尔斯·克纳汉所描述的在沃尔玛商店的玩具部遇到的这位女士就是典型例证。当他问她是否关心这些玩具在哪里、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她回答道：“我感到非常的不舒服……我听到了很多可怕的传闻；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的孩子们想要这些玩具。”哈佛商学院专家德博拉·斯帕确认了克纳汉的见闻，她说，没有证据表明“当人们走进商店……他们的购买行为会仅仅因为社会或者环保方面的考虑而改变”。^[11]

和约翰逊的模型一样，蒙克斯基于持股人是“公益的代理人”的论断假设一美元相当于一票（更确切来说，是一股一票）。对于一半的美国人来说，他们拥有某些公司的股票，因此能够参与某种持股人“民主”，这个模型可能是有效的，但对于另一半人口来说，他们就完全被剥夺了公民权。然而即使在拥有股票因此拥有“投票权”的那一半人中，绝大多数人也只拥有少数股票，这就意味着，他们只有非常小的选举力量。考虑到在发展中国家，只有极少数人才拥有股票，所谓的持股人民主模型就更加无力了。此外，即便拥有公司股票的人可能会

关心社会 and 环境保护事务，他们关于购买，持有或者出售股票的决定仍然很可能主要是由经济上的自我利益来驱动的，而不是由社会和环保关怀来推动。事实上，蒙克斯作为一个持股人活动家的本行工作完全集中在保护他的客户的长期经济利益上。当被问到他是否已经在他帮助进行改革的那些公司里减少了公司外部性带来的损害，他的回答很简单：“没有。”^[12]

最后，即使相当数量的消费者和持股人真的准备在作出决策的时候切实考虑到社会 and 环境保护方面的事务，一个很大的问题仍然存在：他们怎样才能获得足够的信息来有效地作出以上决策？没有任何激励让公司向公众披露自己的不恰当行为，而监督公司行为的非政府组织，尽管勇敢尽力，并在网络的帮助下取得了更有效的成果。但是他们只能靠零星的资金来源运作，也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来迫使公司披露相关信息。它们无力充当管制机构的替代物，相比较而言，后者拥有（或者应当拥有）必要的资源和法律权力来进行现场检查与强制披露，并推行强制标准。按照哈佛大学的德博拉的说法，尽管公司的不恰当行为偶尔也是由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来揭露的，但是这毕竟是零零碎碎的，而且远远不够。更像是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地照着公司的聚光灯，远远比不上常照一处、功率强大的泛光灯。她指出：“还是需要同时借助道德、市场规范以及正式政府制裁的力量。归根结底，你不能仅仅依赖媒体和公众压力来告诉公司究竟该做些什么。”^[13]

克纳汉，那个细细调查发展中国家的垃圾站来追查工厂究竟藏身何处、运行状况究竟如何的人，对非政府组织的局限非常清楚，比如他所在的全国劳工委员会。他同意德博的观点，认为正式的政府制裁非常必要，并且相信有效的政府管制是制止公司滥用行为的惟一希

望。其他的组织和他所在的组织一样，能够为民主过程提供补充，但无法替代。它们能够为公民提供教育和信息，使得公民有能力要求政府通过针对公司滥用的法律法令，但是让这些法律确实地起作用，才是最终的目标。他说：“人权和工人权利标准不被落实，全球范围内的血汗经济就不会被终结。光靠自律、私有化以及我们的监测，血汗经济绝不会消失。绝对不会。必须依靠法律。”^[14]

许多行动主义者同意克纳汉的观点，认为由政府执行的可强制执行的法律——管制条例——必须成为任何旨在控制公司造成的损害和剥削的有效策略的核心。波士顿的 Trillium Asset Management 是一个立足于社会的投资机构，最近与绿色和平组织以及其他一些环保组织合作，促成了一个股东决议以阻止 BP 开采阿拉斯加沿海平原。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西蒙·比尔尼斯（Simon Billenness）说，认为非政府组织的解决方案能够替代政府管制的信念只是“一堆废话”。他认为，“持股人的解决方案”尽管在吸引公众对公司不恰当行为的注意力方面很有作用，但是，“在其他方面，是不可能替代有效的政府管制的。”他还提到，“关注社会利益的投资者和其他活动家能够抓住公司的脚踝，”但是事实上，公司必须“随时服从民主控制和监管”。^[15]

1933 年，当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丁斯将公司比作“弗兰克斯坦怪物”的时候，他的比喻渐渐成为现实。政府创造了公司，就好像弗兰克斯坦博士创造了他的怪物，然而，它们（公司、怪物）一诞生，力量就超过了它们的创造者，进而成为可怕的威胁。管制体系旨在拴住弗兰克斯坦怪物，防止它造成损害，路易斯·布兰丁斯法官在他做出弗兰克斯坦类比的著名司法意见中作了这样的推理。^[16]管制措施——比如保护环境不受破坏，保护工人的人身和生命安全，保护消

费者不受欺诈，危险商品以及剥削性宣传的损害——以法律的形式要求（而不仅仅是相信或者希望）公司必须担负起社会 and 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这些措施反映了由政府制定的用于规范公司行为的恰当标准，政府与公司不同，其惟一的目标即在于保护并促进公共利益，反映人们的意愿。和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相比，政府管制集合了权威、权力和民主合法性，来保护公民免受公司不恰当行为的损害。通过管制，政府可以越过制约公司行为和市场的自我利益与财富最大化的狭隘目标，追求社会价值的实现——比如民主、社会正义、公民的健康与福利、环境的完整性、文化认同。

弥尔顿·弗里德曼——他相信“我们需要一次更大规模的解除管制”，如他所自夸的那样，“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而著名。”这句话在此处也适用。对于解除管制来说，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毫无疑问，管制会增加成本，而解除管制自然会移除这些成本，因此增加利润。没有了防止公司将自身成本外部化的各种管制措施，公司能够获取更多的利润；在某些情况下，消费者也会因为价格降低而受益；因为能够削减管制机构的预算，政府和纳税人也节省了开支。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解除管制所节省的成本转嫁到了其他的地方——这点已经被前面提及的一些可能已经、或本应该已经被有效的管制措施救出苦海的受害者们的故事强调过了，这些受害者包括诺尔玛·卡斯和她的哥威迅人民、帕特里夏·安德森和她的孩子们、温蒂·迪亚兹和同她一起工作的那个小女孩、唐·舒加克、魁溪的矿工们、纽约和洛杉矶的血汗工厂里的工人们，以及被电视广告吸引迷上垃圾食品而生病的孩子们。^[17]

管制措施的目的在于强制公司内部化，即，为其一旦没有强制压力就会外部化到社会和环境头上的那部分成本埋单。当有效的管制措

施被有效执行的时候，这些措施就有能力制止公司损害和压榨个人、社区以及自然环境。解除管制措施实际上是一种反民主的形式，因为它忽略了“人民”，他们通过民主制度选举政府作为自己的代表，并以此作为他们目前仅有的一样控制公司行为的正式政治手段。

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活动家，而不仅仅是生意人，开始规避政府解决措施。他们相信有理由认为政府已经失去了控制公司力量的能力。他们认为，人们应当在日常生活中，通过非政府组织和社区联合体直接面对公司，而不是依赖政府来提供所谓解决之道。安妮塔·罗迪克说：“我们应当直接指向商业，而不是麻烦政府。”^[18]这反映了一个相当普遍的观念，反全球化行动主义者和印度学者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也曾表达过类似的意见：“我们看到，公司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有力的政治实体，我们应当以市民的身份去和他们应对——像市民对一个政治组织那样……现在已经有人直接对公司抗议——而不是在周日下午政府里没有一个人的时候跑去政府门外抗议——现在人们就在第五大街的耐克专卖店外抗议。”^[19]

一旦没有强健的非政府组织、共同行动主义以及政治异议，针对公司的运动将变得不再可能或者说毫无意义。认为这些不仅是对政府管制的必要补充，而其本身就足以替代政府管制的存在，这样的观念具有非常危险的误导性。当反公司的活动家们谴责自甘堕落的政府时，许多公司精英和他们的支持者可能会高唱“哈利路亚”。毕竟，这就是许多商业领袖所希望的：用市场的力量来取代政府对公司的管制，而前者可能要靠（没有法律权力的）非政府组织和有良心的消费者以及（力量极其微弱的）持股人的要求来塑造。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获得了全部的强制性权力和国家的资源，而公民则只剩下非政府组织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借用萧伯纳的话，就是富人享受社会主义，

穷人遭受资本主义。

在一个依赖市场力量和非政府组织来要求公司变得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系统内，是没有什么民主可言的。就像慈善的僭主一样，慈善的公司也许会对某个人充满慈善情怀，但是，正如乔姆斯基所看到的，最好“问问为什么我们要安于独裁，而不是追问它是否真的会变得仁慈”。公司不是民主式的组织——董事和管理者除了对雇用他们的持股人之外，无须对任何人负责。相信公司的仁慈和社会责任感能够而且应当通过市场力量来实现，而政府管制对这来说变得没有必要，这种观念的前提是对民主制重要性危险的抹杀。民主政府，尽管有其缺陷，但至少在理论上，是对全社会负责的。^[20]

不可否认，管制体系的实践效果由于缺少对其至关重要的民主理念而颇为失败。“管制俘获”（Regulatory capture）是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用来描述公司通过政治游说和有选择地披露信息来左右管制机构的状况。许多公司经常违反管制法律，相信自己不会被抓住，或者即便被抓住，从违法行为里获得的经济利益也远超过因为违反法律被判处的罚金。管制机构往往被毫无理由地削减人手并被那些把自己当成产业的合作者而不是监督者的官僚们盘踞着；由管制法律建立起来的标准往往只能对既存的问题作出反应而不具备前瞻性，而且其力量微弱得根本不足以制止公司对人们和环境造成严重损害。

更通常的情况是，民主体系整体存在着病症，难以服务于它激动人心的理念。人们的政治参与被地区投票所限制，而接近一半的人口根本不会参与投票，因此就没有对自治的广泛参与；政客们不当地屈从于公司的献金，其决策能力一天比一天少，解除管制和私有化的要求一天天压缩政府的能力范围。公共领域在缩减，社会不公平在蔓

延。然而尽管如此，如乔姆斯基所说：“无论人们对政府的观感如何，政府在某个程度，某个非常有限的程度上，还是对公众负责的。公司则完全没有可能……意识形态宣传试图让你仇视政府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是目前既有的一种机制，凭借它，人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限制专横而不负责任的权力。”^[21]

尽管现有的管制系统和整个政治系统错漏百出，并且缺乏能够支撑它们继续下去的民主理想，它们仍然有潜力来按照民主方式治理这个社会，这正是公司、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的组合所无法做到的。现在是重振民主制度而非抛弃它的时候了，是来将它们打造成真正的基本理想的反映的时候了。

但是是否已经太晚了呢？现在的政府是否已经被公司权力完全控制，以至于根本无力再重新夺回权力了呢？有些时候看来确实如此。公司的统治无处不在——公司的体积庞大到足以偏转政府的方向，其中一些甚至富可敌国，公司运作跨国进行，公司对社会的控制和对政府的影响力惊人。从以上现实或许可以得到一个非常表面的看法：经济全球化和公司制的统治地位已经让公司也许是永久性地超出了政府的掌控能力之外。然而，这样的判断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即公司的存续本身完全依赖于政府，因为至少在理论上来说，它总是在政府的控制之内的。

最初，公司就是作为一种公共体制建立起来的，其目的即是服务于国家利益和促进公共事务。在17世纪的英国，类似哈德森海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和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都由皇室颁发特许状，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开展国家垄断。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英国和美国也是如此，公司主要是为了例如修建运河和

输水这样的公共目的建立起来的。现代的逐利性公司，单纯追求促进它的所有者的个人利益，与这种组织形式的早期版本大相径庭。然而，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仍然保持着一致：和从前一样，公司仍然是公共政策的产物，而后者总是国家制定的。

国家是这个世界上惟一一种能够让公司诞生的机构。只有它能赋予公司基本的权力，比如法人资格和有效责任，它要求公司必须将利润放在第一位。它拥有警察、军队、法庭和监狱（全部来自公民纳税）来保障公司的所有权——所有这些权利都是由国家创设的。也只有国家才能和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加入国家贸易协议，创设全球性组织，比如世界贸易组织 WTO，反过来限制自己管制公司和它所创设的所有权的能力。

没有国家权力，公司什么都不是。它压根就不会存在。

因此，认为公司现在的强大导致政府变得虚弱的信念根本上是一个错误。经济全球化和解除管制削弱了国家保护公共利益的力量（比如，劳动法、环境法和消费者保护法），却强化了国家促进公司利益，便利它们完成追求利润的使命的力量（比如，公司法、物权法、合同法、版权法、国家贸易法）然而，从全局看，国家的力量并未减少。它只是被重新分配——更多地与公司的利益和要求联系在一起，从而放弃了公共利益。因此，正如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和约瑟夫·斯坦尼斯劳（Joseph Stanislaw）在《制高点：世界经济之战》（*The Commanding Heights*）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从传统的由国家控制经济制高点的局面脱离的全面变化仍在继续，经济制高点现在更多地被留给了市场领域。”这样的论断并不完全是对的。^[22]这样的论断虽然抓住了国家在保护公民免受公司所害方面能力的减弱，却忽略了国家在保护公司相对于公民的利益方面能力的扩张。

问题绝不在于国家是否在管制公司——它一直在这么做——而应当是，国家怎样，为了谁的利益，来管制公司。受公司是“自然实体”（natural entity）——即认为公司是独立人——这样一种观念的迷惑，我们容易忘记公司的创设和权力完全依赖于国家。反过来，就像历史学家摩顿·霍维兹（Morton Horwitz）在描述自然实体理论的意识形态影响的时候所说，这就“破坏了‘国家创造了公司，因而能够对公司实施管制’这个观念的基础”。^[23]

新政人士都明白这一点。他们知道，自然实体理论和相关的自由放任思想动摇了意在促进公共利益的管制措施的合法性。于是他们拒绝这些观念，并且回到早期关于公司和市场由政府创设的理论上来。“自由放任主义的追随者们所描绘的那种免受任何管制的自由根本是不存在的，实际上是不可想像的，”新政的一位支持者在1935年这样写道，“议价能力之所以存在，仅仅是因为政府对议价后的正当权利实施保护。因此，议价能力完全从属于政府控制之下。”^[24]这样的观点即使在新政之前也是很普遍的。罗伯特·黑尔在1922年提到：“当今的经济状况至少部分地依赖于政府之前关于公共领域分配的政策，这是很显然的。自由放任主义不过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从未实现过，也永远不会实现。”^[25]诺里斯·拉瓜迪亚法（Norris-LaGuardia Act）是新政劳动立法方面最重要的一项法令，在它的导言里重申了这一旨在为限制雇主所有权辩护的推理：

在现在的经济状况下，随着政府对将所有者的财产组织成公司和其他形式的产权联盟的授权的增加，个体工人通常没有真正的契约自由，无法保护他们劳动力的自由，因而只能勉强接受雇佣的各种条款和条件。^[26]

公司没有国家根本无法存在，市场也一样。解除管制无法缩小国家和公司之间存在关系的事实，它只是改变了这种关系的种类。

作为政府的创造物，公司必须能够以适用于所有政策的标准来衡量：它是否服务于公共利益？把公司重定为一种自利的组织形式的19世纪法官和立法者们从未真正放弃过这一理念。事实上，在自由放任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当时，他们接受了一套新的关于公共利益需要什么理论。他们认为，公共利益要得到最好的维护和促进，要求个人，包括公司在内，能够不受政府阻碍地追求他们的自身利益。

在这种信念之下发展出了一种循环论证的逻辑——今天它仍然存在——它在当时和现在都试图证明政府对公司利益的扶助作用是正当的，也就是说，如果服务于公司的利益优先于公共利益，那么公共利益只有当公司的利益已经实现的时候才会被考虑。或者，像通用汽车前总裁、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森（Charles Wilson）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美国参议院的一个附属委员会时所说：“对通用汽车好就是对这个国家好。”更晚近一些，特拉华州州务卿哈里特·史密斯·温莎（Harriet Smith Windsor）博士也为企业重申了类似的逻辑。特拉华州的主要产业是制造业，一半的财富500强公司和NYSE上市公司都在这里设厂，每年23亿美元的州收入中有27%来自公司制企业，温莎博士在这里观察到，“我们的法律必须帮助商业发展，满足它们的需求”；她的助理秘书里克则补充道：“我们遵照能够帮助商业繁荣和便利人们获得资本的方式来起草法律。”只有当你假设对商业有利就是对公众有利的时候，这样的公共政策才被认为是好政策——这是这样的假设推动了今天许多公共政策的诞生。^[27]

然而，公司法和政策建立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之上，虽然是狭义的



公共利益，这个事实仍然证明了公共利益仍然是衡量公司的机构价值和合法性的最终标准。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大部分公司法条例包括了如果政府确信某公司已经极大地损害了公共利益，允许政府解散公司，或者寻求一个法庭命令来解散公司的条款。比如，执照撤销法就一直是公司法的一部分。这些条文表明，政府能够像创造公司一样轻松地毁掉一个公司，这象征着那个明显但却很容易被忘记的观念，那就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公司是为人们的利益而存在的，也是处在人民主权之下的。在提及这些法令时，纽约州总检察官斯皮泽强调，如果“一个公司被确信重复犯下罪行来损害或者危害到人们的生活或者破坏了我们的环境，公司就应当被取缔，它作为公司的人格应被终结，财产被没收并且公开拍卖”。^[28]

法学教授罗伯特·班森（Robert Benson）认为，撤销执照是一个“保守得很好的秘密”，他最近曾运用加州的执照撤销法请求此州的总检察官解散加州联合石油公司（the Union Oil Company of California, Unocal）：

人们错误地假设我们必须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控制这些惯于犯罪的大公司——毒物泄露事件时试一次，非法解雇员工时试一次，侵犯人权事件时再试一次。可是法律一直允许总检察官走上法庭，简简单单地因为一家公司的不道德行为而将其解散，并把它的资产卖给那些能够为公益服务的别的公司。^[29]

班森在他向总检察官提交的长达 127 页的申请中列举了加州石油的违法行为：在一个管道工程中，公司与非法的缅甸军政府合作，并且被举报在此项工程中使用奴隶劳工并强迫整个村庄搬迁，它被举报

与阿富汗前塔利班政权合作，后者在美国对其宣战之前就因侵犯人权而声名狼藉；它还长期违反加州的环境保护和雇工安全方面的管制。申请在提交给总检察官五天之后被驳回。

班森从未期待过他的申请会取得成功。尽管政府经常凭借执照撤销法因为一些技术违规就解散小公司（在2001—2002年间，加州以漏税并未能给出恰当的理由吊销了58 000家公司的执照^[30]，在同一时间段，特拉华州撤销公司的数目是加州的一半^[31]），这个方法不会被用来对付犯有重大违法行为的大公司。即使是安然公司也逃过了这一专为公司设置的死刑，继续作为一个公司实体而存在。“我从未期望能够运用撤销执照诉讼达到除去加州石油或是任何一家特定的公司的目的，”班森说，“我只是想将公众舆论的注意力转移到公司的非法行为上来，我认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的确对此有所帮助。”^[32]他认为，《执照撤销法》体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公司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因此，我们——人民——仍然有权力来控制它们。

已经到了运用这一权力的时候，不仅仅是动用执照撤销法，而且要将公司置于强有力的民主控制之下。公司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它并不拥有管制者需要尊重的自我权利、需要和欲望。它是由国家创造的工具，目的在于推动社会和经济政策。因此，它只有一个制度上的目标：服务于公共利益（不是那种把公共利益等同于商业利益的循环论证概念）。我们必须努力来保证公司围绕这一目标来行事。但是怎样才能让公司这样一个今天已经精神错乱的机构重新变得可敬并致力于促进公共利益呢？

怎样对待公司，怎样利用公司，这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急迫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没有简单的答案——没有一张画好变革方向的蓝

图——我们必须小心那些声称要提供这个蓝图的人。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已经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难题。我们在过去的300年里，打造了一个无比有效率的创造财富的机器，但现在它失去了控制。尽管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最终必须靠“人民”通过民主的方式来寻求，而不是依靠一个坐在电脑前的法学教授，我还是想对我们如何前进作一些宏观的概括。

首先，对公司管理结构做些小修小补是行不通的。尽管后安然时代出现了一些关于公司治理改革和措施的提案，比如我们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中看到的那些，这些提案也许能够加强公司主管和董事对投资者的责任感，但它们对提高公司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作用甚微。更广泛的改革，比如针对公司并购更严格的限制，董事会增加持股人代表（比如工会代表），以及允许或要求执行者在他们的生意决策中考虑持股人的利益的法律（所谓的利益相关者条款）等，尽管合乎我们期望，但仍然不可能极大加强公司对社会的责任感。

另一种极端的意见——建立在对“更少的公司”前景预测的基础上的提案也不能解决现在如何对待公司如何利用公司的问题。尽管“数以百万计的人都在说我们不仅不需要公司，没有公司，我们还能做得更好，我们将会建立新的制度体系来滋养地球和人类”，这可能是真的，但就像行动主义者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所强调的，对于现在来说，一个更少公司的未来可能还过于遥远。哈佛商学院专家乔·巴达拉科认为：“公司这种形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将存在下去。它至少还能维持个一二十年，就像过去它已经这样维持了一二十年一样——但是我想它本身的适应性已经被很好地证明了，而它也有很大的可能会在将来发展得更为强大。”我们有理由假设并且据此来为将来制订计划：公司尽管和历史上其他占统治地位的机制一样，在时间的

冲刷下无比脆弱，但至少在近期，它会继续存在，并保持其在社会中的强大地位。^[33]

那么，该如何重塑公司，将其改变成一个非病态的实体呢？这正是公司社会责任和伦理化管理的支持者声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但是，尽管他们的出发点都很好，却在根本上受制于公司必须追求自我利益的毫无例外的使命，就像我在之前的章节中所描述的那样。要对公司进行真正有意义的改革，必须要改变它的使命。公司应当被重建成为服务于、促进于，并且能对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而不仅仅是它们自己和持股人负责的实体。这样的公司实际上已经存在了，并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每天都要与之打交道。USPS 就是一个例子。它是完全由美国联邦政府所有的一家自负盈亏的公司，正如它的法定使命所说：

邮政的基本责任是通过个人、教育、文学和商务信件的传递将全国联结起来。它应该为社会各界提供及时、可靠并有效的服务。^[34]

公益性公司在一些其他的社会服务领域——例如运输、公益事业、广播、安全和救援服务等会比营利企业更加合适，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提到的，公益组织更适合于传递重要的公共项目和服务。

那么，是否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成为公益公司？这是否是解决现有的这些企业的弊端的方法呢？这个解决方法，即使是正确的，在现在还是过于理想化的。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将会理解民主化的经济关系的真实存在，到那时候，广泛的公益组织也许是计划的重要部分。在此之前，在不久的将来，也就是说明天、下周、明年我们能做什么呢？现实是企业的体制仍然是那样：利己主义的精神病患者。

值得在此一提的是：企业现状是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制的一种反映。要改变它就必须把它理解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大工程的一部分。尽管我们长期期待并努力构建一个更加人性化和民主化经济秩序，但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找到一些能使企业受到民主约束并保护公民脱离危险趋势的途径。提高政府调控的合理性、效力和责任是目前最好的，或者说最现实的方法。为此，我提出如下的建议：

增强调控机制

- 作为管理企业的主要方法，政府调控应该重新构思并合法化，保证企业受民主控制并考虑到公民、社会和环境等多方面利益。
- 调控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加强以达到更好效果：在现实层面上充实执行机构的员工数目，加重企业董事和经理对企业非法行为所负的责任，将屡次违规的企业从政府合同中除名，对于罪大恶极和长期违反公众意愿的企业应该吊销执照。
- 对于保护环境和人民安全、健康的调控应该基于预防原则，也就是禁止企业从事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即使最后证明这种危害并不存在。
- 调控系统需要改革以加强责任感并避免“机构俘获”（agency capture）、目前及过去政体里存在着的集权和官僚倾向。当地公共机构，例如市议会、学校和公园理事会等应

该在调控系统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比联邦和州政府更加接近市民，更愿意也更能和市民组织就特定事件合作(正如它们已经在例如学校广告的限制、城市扩张、零售卖场和环境破坏等事件中进行的有效合作)。

- 工会和其他监管、调控企业行为的工人组织应该受到保护和加强。同时环境、顾客、人权组织等这些代表着利益受企业影响者的组织也应该受到保护。

加强政治民主

- 选举应该公开筹措资金，企业的政治捐赠应该禁止，对于政府人员和商业企业之间的来往应该有更加严格的限制。尽管企业有向政府表达他们的想法并在某些政策上与政府合作的权利，但目前的状况是它们更愿意做危及民主进程的“政府伙伴”。至少，它们的影响力应该被缩减到与环境和消费者组织、人权组织等其他组织一样的水平。

- 选举改革会给政治体系带来新的声音并且鼓励醒悟的公民回到选举中来，例如比例代表制就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

创建充满活力的公共领域

- 社会组织和社会公益事业一直被认为是对公共利益至关重要的，而且因其宝贵、脆弱、道德神圣而不能被企业利用，它

们应该由公共政权管理和保护。不可避免地，人们会就哪些组织和公益事业应该避免企业介入、采用何种方法进行保护、哪些组织和公益事业应该受到保护等问题产生争论——这些社会组织和公益事业包括儿童的智力和想像力、学校、大学、文化机构、水和动力公司、健康和福利机构、警察、法院、监狱、消防、公园、自然保护区、基因和其他生物资源等，公共空间也是备选项。但与一种日益流行观念相比——它认为没有任何公共利益会比单个公司、消费者和股东的累计收入更重要——上述的争论要健康得多。

挑战国际新自由主义

■ 各国应当通力合作，把 WTO，IMF，世界银行之类国际机构的理念和实践行为跟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和他们鼓吹解除管制及私有化的行为分隔开。以上机构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它们今天的定位和最初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阐明的凯恩斯主义是完全不同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以下这些最重要的事实：公司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事物。它们没有生命，没有力量，而且不会拥有比我们以及政府所给予它们的更多的能力。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恐惧的世界里，人们害怕黑暗，害怕失去工作，害怕开口，害怕发表意见，人们害怕有所作为。”这是奥斯卡·奥里维拉（Oscar Olivera）说的，他是玻利维亚科恰班巴市（Cochabamba）一个反对将淡水系统私有化的组织的官员。奥里维拉说“现在

是我们抛开恐惧，团结一致，重拾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信心的时候了”。这就是奥里维拉和科恰班巴人最近做的事。^[35]

事情的起因是玻利维亚政府在世界银行的压力下私有化一个位于玻利维亚中部的缺水城市科恰班巴的淡水系统。它与 Aguas del Tunari 公司签订了由这个公司来运营科恰班巴的淡水系统的合同。这个公司的最大股东是贝泰国际水处理公司（Bechtel）。此时，科恰班巴正在使用老旧的供水系统，无法供应到许多农民居住的乡村。当 Aguas del Tunari 公司接管该系统后，立刻把价格提高到接管之前的三倍，并且开始指控农民从自家井里抽水的行为是违法的。政府为了顺从它们与该公司的合同，颁布了一条新的法令禁止人们从湖泊、河流、三角洲甚至是雨水中自行收集淡水。这家公司查抄了人们的其他供水系统，在没有补偿金的情况下，将这些设备置于它的管理下。根据奥里维拉所说，所有的这些行为，包括导致许多人生活困难的涨价都被这家公司认为是达到合同利益的必要措施。^[36]

在奥里维拉和其他人的帮助下，城市和乡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要求这家公司离开。这最后造成了人民和军警之间的流血冲突。“我们看到许多受伤的年轻人，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失去了胳膊、腿，甚至瘫痪或者受到脑部和神经系统的伤害。有个年轻人被杀了，而此前已经有五人在乡村被害。”奥里维拉回忆。“这是一个代价很大的胜利。”

但是这毕竟是一个胜利。据奥里维拉所说，这不仅仅是水资源的胜利，也是为了正义的斗争，为了民主政治的斗争，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斗争。

我们看到了人们团结一致所产生的巨大能量……人们如此紧

密地团结在一起并且如此强大……十万人走上街头，它们来自社会各界，穷的、富的、农民、妇女、年长的、年轻的。更难以置信的是人们确实感到充满了力量，觉得他们有权作决定，有权决定关于供水系统的事。并且最后他们的确在供水系统的问题上得争取到了自主权利。我认为这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第一次有机会尝试到民主的真实滋味，因为正如我们常说，民主就是谁作决定的问题……至高无上的主权是属于人民的而不是任何其他人的。

水处理公司最后被去私有化并归还给了科恰班巴人民。奥利弗现在梦想一个真实的“社会机构能帮助人民当家作主，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他说，已经有了由地方官员、联盟和专业协会代表组成董事会的非营利机构，它“不仅透明，而且更加公正、高效，并且更加积极地鼓励人民参与解决问题”。^[37]

公司的铁律并不是不可侵犯的。当人们团结起来并彼此信任，他们的不满就会成为公司及其背后的政府的薄弱环节。公司无疑是可怕的对手。但是，正如奥里维拉所说，“在世界各地，都开始取得了小战役的胜利，”这也包括他和科恰班巴人民的胜利。而从公司统治下恢复广泛的民主是一场大的战役，但是也是一场必须要打的战役。

为了使那些与之对立的价值观和实践行为得以复苏，公司的规则必须受到挑战，这些价值观和实践行为包括：民主、社会公平、平等和同情。公司及其根本意识形态建立在一种对人性的狭隘理解之上，而这种人性被扭曲得太厉害、太不能鼓舞人，因此公司不可能一直持

续地买走我们的政治想像。尽管个人主义的自利倾向和消费需求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核心根基之一，但也不必羞愧，它们并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同样也深深感到彼此之间的纽带和责任，我们有共同的命运和希望：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能力、审美、价值感和正义感是至少部分是通过我们的公共机构建立和培养的。我们相信有些事物太脆弱、太珍贵、太重要，因而不容它们被用于牟利。“我们无需把自己从根本上看做是贪婪的生产者或是以彼此竞争、专门利己的方式生存的商品消费者。”正如哲人马克·金维尔说的：“人类正是凭借辽阔的、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事物组织起来的，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是为了文明而组织起来的。”^[38]

反对公司规则的最佳论据就是看看我们到底是谁，再看看公司规则让我们表现得多么蹩脚。“我们基本上是有感觉有感情生物体，”科学家和活动家侯美婉（Mac-Wan Ho）博士说。“当别人受苦，我们也受苦。我们想要一个安全、平等、公正和富有同情心的世界，因为这关乎我们的生死。”活动家范达娜·席瓦博士说，“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人起来反对“基于不合理的措施之上”的、“不给人民自由和权利”的体制，以“求得生存并活得有尊严”。没有一个压制代表我们身上根本所在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秩序能长久存在。我们只要记住我们是谁，以及作为人类我们有多大的能力揭示公司追求狭隘的自身利益的体系是如何危险地被扭曲。^[39]

“自由的人民如何管理自己呢？”波士顿“公司、民主和法律项目”成员理查德·格罗斯曼（Richard Grossman）这样问道。“我的意思是，在某种意义上，这跟公司完全无关，这是关于我们身为人类的问题……我们在地球上的角色，我们的时间尺度，我们的生命尺度，我们对自己做什么，我们怎么样和别人一起管理我们自己……和地球



上其他的生物相处得更融洽，和地球相处得更融洽，和未来的子孙相处得更融洽……包括在公司内工作的男女们的孩子？这确实是关于我们自己的问题。”

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乐观——因为这确实是关于我们自己的。

注释

序言

- [1] Interviews with Hank McKinnell and Joe Badaracco.
- [2] Lawrence E. Mitchell, *Corporate Irresponsibility: America's Newest Expo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ebruary 19, 2002).

1. 股份公司的帝国之路

- [1] Tom Hadden, *Company Law and Capitalism*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2), 14.
- [2] John Carswell, *The South Sea Bubble* (London: Cresset Press, 1960), 42 (“Spaniards”), 55 (“profits”).
- [3] *Ibid.*, 173.
- [4] *Ibid.*
- [5] Hadden, *Company Law and Capitalism*, 16.
- [6] Carswell, *The South Sea Bubble*, 210.
- [7] The Sarbanes-Oxley Act, Pub.L.No.107-204, 116 Stat.745, was signed into law by the president on July 30, 2002.
- [8] Hadden, *Company Law and Capitalism*, 13.
- [9] John Lord, *Capital and Steam Power*, 1925, available at www.



his-tory. rochester. edu/steam/lord.

- [10] Scott Bowman,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Law, Power and Ideology*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41.
- [11] Walter Scott, *The Waverley Novels—The Betrothed*, vol. 19 (Philadelphia: John Morris & Co., 1892).
- [12] Bowman,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41–42.
- [13] Paddy Ireland, "Capitalism Without the Capitalist: The Joint Stock Company Shar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Doctrine of Separate Corporate Personality,"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17 (1996): 63.
- [14] Cited in *ibid.*, 62.
- [15] Cited in *ibid.*, 65.
- [16]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Law of Partnership, 1851, B.P.P., VII, vi (as cited in Rob McQueen, "Company Law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Australian Colonies 1854—1920: A Social History," Ph.D.thesis, Griffith University, p.137).
- [17] Cited in McQueen, "Company Law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Australian Colonies 1854—1920," p.75.
- [18] Cited in Barbara Weiss, *The Hell of the English: Bankruptcy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Lewisburg, Pa.: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148.
- [19] Morton Horwitz, "Santa Clara Revisi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Theory," in *Corporations and Society: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ed. Warren Samuels and Arthur Miller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7), 13.

[20] 史密斯·温莎访谈。

[21] Roland Marchand, *Creating the Corporate Soul: The Rise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Corporate Imagery in American Big Busin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7.

[22] Cited in Edward Herman, *Corporate Control, Corporate Power*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7 (“tie” and “witnesses”).

[23] Stewart Kyd, *A Treatise on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1793), vol.1, p.1, as cited in Ireland, “Capitalism Without the Capitalist,” 45–46.

[24] John George, *A View of the Existing Law of Joint Stock Companies* (1825), p.29, as cited in Paddy Ireland, “Capitalism Without the Capitalist,” 45.

[25]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professor Arthur W. Machen, as quoted in Horwitz, “Santa Clara Revisited,” 51.

[26] *Santa Clara County v. Southern Pacific Railroad*, 118 U.S.394 (1886).

[27] Marchand, *Creating the Corporate Soul*, 8 (“human” and “general”), 4 (“affection”), 76 (“directly”).

[28] Ibid., 139.

[29] Kim McQuaid, “Young, Swope and General Electric’s ‘New Capitalism’: A Study in Corporate Liberalism, 1920–1933,”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36 (1977): 323.



- [30] Jeffrey L. Rodengen, *The Legend of Goodyear: The First 100 Years* (Fort Lauderdale, Fla.: Write Stuff Syndicate, 1997).
- [31] *Louis K. Liggett Co. et al. v. Lee, Comptroller et al.*, 288 US 517 (1933), 548, 567.
- [32] Gerard Swope, *The Swope Plan: Details, Criticisms, Analysis* (New York: Business Bourse, 1931), 22. Cited in E. Merrick Dodd, "For Whom Are Corporate Managers Trustees?," *Harvard Law Review* 45 (1932): 1145-1163.
- [33] Adolf A. Berle and Gardiner C.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8), 4 ("princes"), 312-213 ("cupidity"), 312 ("survive"); Dodd, "For Whom Are Corporate Managers Trustees?," 1157.
- [34] Quoted in Richard Gwyn, "The True Allegiance of Canadian Corporations," *Toronto Star*, April 28, 1999.
- [35] 关于全球化的论述, 见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sation Is Running Our Lives* (London: Profile Books, 1999);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mpany, 2002); Alan Tonelson, *The Race to the Bottom: Why a Worldwide Worker Surplus and Uncontrolled Free Trade Are Sinking American Living Standard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2000); Saskia Sassen, *Losing Control: Sovereign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William K. Tabb, *The Amoral Elephant: Globaliza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Social Justi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1), Gary Teeple,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Social Reform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oronto: Garamond Press, 2000), William Greider, *One World, Ready or Not: 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 [36] 关于 WTO 影响的论述, 见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Charles Derber, *People Before Profit: The New Globalization in an Age of Terror, Big Money and Economic Crisi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2), Noreena Hertz, *Silent Takeover: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Death of Democracy* (New York: Free Press, 2002).
- [37] WTO Press Release, "WTO Adopts Disciplines on Domestic Regulation for the Accountancy Sector" (December 14, 1998), available at www.wto.org (WTO News; 1998 Press Releases).
- [38] Ibid., Article III. The stated "legitimate objectives" are protection of consumers, quality of the servic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integrity of the profession.
- [39] Ibid.
- [40] See *supra*, note 7, for description of the act.
- [41] Anthony DePalma, "WTO Pact Would Set Global Accounting Rule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 2002, Murray



Dobbin, "We Must Fight the Enron Virus," *The Globe and Mail* (Toronto), February 7, 2002, A19.

- [42] 对事例论述, 见 Debi Barker and Jerry Mander, "Invisible Governmen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for the New Millennium?,"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 October 1999; Lori Wallach and Michelle Sforza, *The WTO: Five Years of Reasons to Resist Corporate Globalization*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0); Derber, *People Before Profit*, Hertz, *Silent Take-over*.
- [43] 见 WTO Appellate Body Report: "United States, 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 Recourse to Article 21.5 of the DSU by Malaysia," October 22, 2001, available at www.wto.org (doc.# 01-5166).
- [44] 见 WTO Appellate Body Report, "European Communities, Measures Affecting Meat Products," January 16, 1998, available at www.wto.org (doc.# 98-0099).
- [45] 对事例的论述, 见 Ralph Nader, "Notes from Nader: The Chill Factor: Consumer Safeguards Under Fire," *World Trade Observer*, Seattle, Wash., 1999, available at depts.washington.edu/wtohist/world_trade_obs/issue3/nader.htm.
- [46]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20.
- [47] Helmut Maucher, "Ruling by Consent,"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6, 1997, 2, as cited in Belen Balanya, Ann Doherty, Olivier Hoedeman, Adam Ma'anit, and Erik Wesseli-

us, *Europe Inc.: Regional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Rise of Corporate Power* (London: Pluto Press, 2000), 136.

[48] 威廉·尼斯卡宁、艾拉·杰克逊及萨姆·吉巴拉访谈。

[49] 克里斯·科明萨拉夫斯基与克莱·蒂蒙访谈。

[50] 克莱·蒂蒙与萨米尔·吉巴拉访谈。

2. 新的形象，旧的公司

[1] 汤姆·克莱因访谈。

[2] 索尼娅·杰拉多访谈。

[3] 汉克·麦金内尔与汤姆·克莱因访谈。

[4] 汉克·麦金内尔访谈(“planet”)，www.pfizer.com (“generous” and “innovative”)。

[5] 引自 Princeton University Development Offices, “Princeton Receives Grants to Address Greenhouse Problem,” available at www.princeton.edu/cfr/FALLOO/BPAmoco.html.

[6] 艾拉·杰克逊访谈。

[7] Ibid.

[8] 弥尔顿·弗里德曼访谈。

[9] 尼斯卡宁访谈。

[10] 彼得·德鲁克、德博拉·斯帕与乔姆斯基访谈。

[11] Carol Gelderman, *Henry Ford: The Wayward Capitalist* (New York: Dial Press, 1981), 83.



- [12] Gelderman, *Henry Ford*, 84, as cited in Smith, "The Shareholder Primacy Norm," 277 ("bonanza" and "incidentally").
Dodge v. Ford Motor Co., 684 ("organized" and "benefiting").
- [13] Robert Hinkley, "How Corporate Law Inhibi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Business Ethic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January-February 2002, available at www.commondreams.org/views02/0119-04.htm.
- [14] *Hutton v. West Cork Railway Company*, 23 Chancery Division 654 (1883) (C.A.), 672 ("instance"), 673 ("Draconian" and "cakes").
- [15]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ommittee on Corporate Laws, "Other Constituencies Statutes: Potential for Confusion," *The Business Lawyer* 45 (1990): 2261, as cited in Smith, "The Shareholder Primacy Norm."
- [16] 科明萨拉夫斯基访谈。
- [17] Marjorie Kelly, *The Divine Right of Capital: Dethroning the Corporate Aristocracy*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2001).
- [18] As reported in Danielle Knight (IPS), "Mixed Reaction to Oil Company's Earth Day Award," April 22,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oneworld.org/ips2/april99/21_05_076.html.
- [19] Sir John Brow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New Agenda for Business," The 1998 Elliott Lecture, 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 June 4, 1998.

- [20] Sir John Browne, speech at the Earth Day Awards Ceremony at UN Headquarters, New York, on the occasion of his being presented with the Award for Individual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by the UN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and Earth Day, New York, April 22, 1999, available at www.bp.com.
- [21] 吉姆·格雷访谈。
- [22] 弗里德曼访谈。
- [23] 诺尔玛·卡斯访谈。
- [24] 诺尔玛·卡斯访谈。也见 Robert Matas, "Survival Tactic: Can the Hunters Save the Caribou?" *The Globe and Mail* (Toronto), August 19, 2000, A10-A11.
- [25] John Gore, group vice president, government and public affairs, BP, letter to Rebecca O'Malley of Ecopledge, January 16, 2001.
- [26] Found at www.bpamoco/alaska/qanda/qanda.htm (print copy on file with the author).
- [27] Letters to Presidents Clinton, December 11, 2000, and Bush, March 20, 2001, from groups of scientists; Kenneth Whitten, retired research biologist, Alaska Department of Fish and Game, gave written testimony at a hearing on the Republican energy bill on July 11, 2001; U.S., *Energy Security Act of 2001; Hearing on H. R. 2436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Resources, 107th Cong.*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2).
- [28] Sir John Browne, "The Case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es-

entation to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Boston, November 10, 1998.

- [29] From the following speeches by Sir John Brow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uilt,' 'self-interest')", "Public Pressure and Strategic Choice," World Economic Forum, Davos, Switzerland, February 2, 1998 ("good business"), "The Case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ality," "hard-headed," "direct"), "Mobility and Choice," Detroit Economic Club, January 25, 1999 ("coldly," "imperative").
- [30] BP Press Release, "BP Beats Greenhouse Gas Target by Eight Years and Aims to Stabilise Net Future Emissions," March 11, 2002, available at www.bp.com (under Press Center Archives).
- [31] Sir John Brow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32] Sir John Browne, "Mobility and Choice" ("explore," "driv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ptive").
- [33] 汉克·麦金内尔访谈。
- [34] Ibid.
- [35] 雷切尔·科恩访谈。
- [36] 麦金内尔访谈。
- [37] 科恩访谈。
- [38] 本段统计数据来自雷切尔·科恩访谈。
- [39] 汤姆·克莱因访谈。
- [40] 丹尼·谢克特访谈。
- [41] Alisdair MacIntyre, "Utilitarianism and Cost-Benefit Analy-

sis: An Essay on the Relevance of Moral Philosophy to Bureaucratic Theory,” in *Values in the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ed. Kenneth Sayre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7), 217–237. Interview with Sam Gibara.

[42] 安妮塔·罗迪克访谈。

[43] Ibid.

[44] 引自 www.thebodyshop.com.

[45] 安妮塔·罗迪克访谈。

[46] Ibid.

[47] Julia Finch, “Body Shop Buyers Line Up,” *The Guardian*, October 3, 2001 (“aware”); Finch, “Body Shop Gains a New Head,” *The Guardian*, February 13, 2002; Sarah Ryle, “Body Shop Seeks New Life with Major Surgery,” *The Observer*, February 17, 2002.

[48] 马克·巴里访谈。

[49] Ibid.

[50] Ibid.

[51] 安妮塔·罗迪克访谈。

[52] 罗伯特·黑尔访谈。

[53] Ibid.

[54] Ibid.

[55] Enr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nual Report, Houston, 2000.

[56] 麦金内尔访谈。



3. 外部化的机器

- [1] 弗里德曼访谈。
- [2] Ibid.
- [3] “Record \$4.9 Billion Award Against GM for Dangerous Fuel Tanks,” www.cnn.com, July 9, 1999, Milo Geyelen, “How a Memo Written 26 Years Ago Is Costing General Motors Dearl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9, 1999, 1.
- [4] Geyelen, “How a Memo Written 26 Years Ago Is Costing General Motors Dearly.”
- [5] Ibid.
- [6] The \$8.19 figure comes from other GM documents, not the Ivey Report. For a description, see, “GM Fuel Tanks,” www.safetyforum.com, Public Citizen, “Profits over Lives—Long-Hidden Documents Reveal GM Cost-Benefit Analyses Led to Severe Burn Injuries, Disregard for Safety Spurred Large Verdict,” July 19, 1999, available www.citizen.org/congress/civjus/tort/.
- [7] The case is currently embroiled in procedural wrangling and has not yet been heard by the California Court of Appeal.
- [8] *Patricia Anderson v. General Motors*, Brief of Chamber of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micus curiae* in support of the Appellant, California Court of Appeal for the Second Appellate District—Division Four, 3 (“illegitimate”), 1 (“troubling” and “manufacturing”), 3 (“despicable”), 8 (“hall-

mark”), 10 (“unimpeachable”).

- [9] Meiring de Villiers, “Technological Risk and Issue Preclusion: A Legal and Policy Critique,” *Cornell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9 (2000) : 523, as cited in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Brief, p.9.
- [10] MacIntyre, “Utilitarianism and Cost-Benefit Analysis,” 218.
- [11] Ivey Report (print version on file with the author).
- [12] Chamber of Commerce Brief, 10.(“Skillful” and “sanctity,” citing Gary T. Schwartz, Deterrence and Punishment in the Common Law of Punitive Damages: A Comment [1982] 56 5. Cal L.Rev.133, p.152.)
- [13] 见第一章对经济全球化的详细论述。
- [14] 查尔斯·克纳汉访谈。
- [15] Ibid.
- [16] Ibid.
- [17] Ibid.
- [18] Ibid.
- [19] Ibid.
- [20] Dexter Roberts and Aaron Bernstein, “Inside a Chinese Sweatshop: ‘A Life of Fines and Beating,’ ” *Business Week Online*, October 2, 2000.
- [21] Roberts and Bernstein, “Inside a Chinese Sweatshop.”
- [22] 乔姆斯基访谈。
- [23] 克纳汉与罗伯特·蒙克斯访谈。
- [24] 罗伯特·蒙克斯访谈。也见 Robert Monks, *The Emperor's*

Nightingale: Restor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Corporation in the Age of Shareholder Activism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98); Hilary Rosenberg, *A Traitor to His Class: Robert A. G. Monks and the Battle to Change Corporate America*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99).

[25] 罗伯特·蒙克斯访谈。

[26] Ibid.

[27] 雷·安德森访谈。

[28] Ibid.

[29] Ibid. The book was Paul Hawken's, *The Ecology of Commerc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3), in which the author quotes E.O. Wilson's phrase "the death of birth."

[30] 更多例子见 Russell Mokhiber and Robert Weissman, *Corporate Predators: The Hunt for Mega-Profits and the Attack on Democracy* (Monroe, Maine: Common Courage Press, 1999); M. F. Hawkins, *Unshielded: The Human Cost of the Dalkon Shiel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7).

[31] Bob Port, "Fear and Fire a Deadly Mix," *Daily News* (New York), July 9, 2001, available at www.sweatshopwatch.org/swatch/headlines/2001/fearfire_jul01.html.

[32] 参见 Bob Port, "Sweat and Tears Still in Fashion in City: Clothing Factories Skirt Laws, Exploit Immigrants," *Daily News* (New York), July 8, 2001, available at www.sweatshopwatch.org/swatch/headlines/2001/sweattears_jul01.html.

[33] 美国农业部调查显示, 纽约 93 家服装商店中只有 35% 的符

合劳动法。见 www.dol.gov/opa/media/press/opa/opa99300。

- [34] U.S.Department of Labor, "Only One-third of Southern California Garment Shops in Compliance with Federal Labor Laws," News Release, USDL-112, August 25, 2000, available at www.dol.gov/esa/media/press/whd/sfwh112.htm (last accessed June 11, 2003). See also Andrew Gumbel, "Fashion Victims: Inside the Sweatshops of Los Angeles," *The Independent* (London), available at www.sweatshop-watch.org/swatch/headlines/2001/fashionvictims_aug01.html.
- [35] 关于团体犯罪的论述, 见 Harry Glasbeek, *Wealth by Stealth: Corporate Crime, Corporate Law, and the Perversion of Democracy*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2002); E. Colvin, "Corporate Personality and Criminal Liability," *Criminal Law Forum* 6 (1995): 1; D.Stuart, "Punishing Corporate Criminals with Restraint," *Criminal Law Forum* 6 (1995): 219; S.M.Rosoff, H.N.Pontell, and R.Tillman, *Profit Without Honor: White-Collar Crime and the Looting of America*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8); D.O. Friedrichs, *Trusted Criminals: White Collar Crim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alifornia: Wadsworth, 1996), 80; R.Mokhiber, and R.Weissman, "No Mind, No Crime?," *Multinational Monitor*, December 2, 1998; F.Pearce and L.Snider, eds., *Corporate Crime: Contemporary Debat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5); R.Paehlke, "Environmental Harm and Corporate Crime," in *Corporate Crime: Contemporary Debates*,



ed.F.Pearce and L.Snider, 305. Empirical analys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as stated in one of them, Richard Brown and Murray Rankin, "Persuasion, Penalties, and Prosecution: Administrative v. Criminal Sanctions," in M.L.Friedland, ed., *Securing Compliance: Seven Case Studi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0), 347-348, "A substantial number of firms habitually violate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 [36] "GE: Decades of Misdeeds and Wrongdoing," *Multinational Monitor*, 22, nos.7 and 8, July-August 2001.
- [37] Frank H.Easterbrook and Daniel R.Fischel, "Antitrust Suits by Targets of Tender Offers," *Michigan Law Review* 80 (1982): 1177.
- [38] 罗伯特·蒙克斯访谈。
- [39] Bruce Welling, *Corporate Law in Canada* (Toronto: Butterworths, 1991), 165.
- [40] 这里对舒加克遭遇的陈述基于 Wesley Loy, "Survivor: Don Shugak Recalls the Wellhead Explosion That Nearly Killed Him," *Anchorage Daily News*, November 3, 2002.
- [41] Loy, "Survivor."
- [42] 引自 letter from Charles Hamel, on behalf of Concerned BP Operators at Prudhoe Bay, to Officer Mary Frances Barnes, United States Probation Officer, July 16, 2001, available at www.anwrnews.com.
- [43] 引自 Jim Carlton, "BP Amoco Technicians Question Safety of Drilling Systems Bush Touts for Refug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3, 2001, 1.

[44] Ibid.

[45] Ibid.

[46]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BP Exploration (Alaska) Inc.*,
Plea Agreement, U.S. Dist. Ct. (Alaska), No. A99-0141C 12
(JKS), September 23, 1999.

[47] Statement of William B. Burkett, Production Operator for BP
Exploration (Alaska), to Chairman Joseph Lieberman and
Chairman Bob Graham. See also Carlton, "BP Amoco Techni-
cians."

[48] Jim Carlton, "Are Alaska's Many Oil Fields Saf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0, 2001, 1.

4. 民主有限

[1] Samuel Rosenman, ed.,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Volume Two: The Year of Crisis*,
1933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as cited in Cass
Sunstein, *The Partial Constitution* (Cambridge, Mass.: Har-
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57-58.

[2] The following account of this story is based primarily on Jules
Archer, *The Plot to Seize the White House* (New York:
Hawthorn Books, 1973).

[3] Archer, *The Plot*, 21.



- [4] National Archives, "U.S.Strategic Bombing Surveys" 243/190/62—Box 696, August 14, 1944; Box 697, August 23, 1945; Box 946.
- [5] 埃德温·布莱克访谈, 也见 Edwin Black, *IBM and the Holocaust: The Strategic Alliance Between Nazi Germany and America's Most Powerful Corporation*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2001).
- [6] 埃德温·布莱克与彼得·德鲁克访谈。
- [7] Archer, *The Plot*, 146.
- [8] Butler's testimony to 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as quoted in Archer, *The Plot*, 153.
- [9] Archer, *The Plot*, 156.
- [10] Ibid., 30 ("combat").
- [11] Ibid., 198.
- [12] Ibid., 118—119.
- [13] Ibid., 192—193.
- [14] Ibid., 213 ("doubt," "plotters," "fellows"), 214 ("patriot").
- [15] 引自 Hendrik Hertzberg, "Comment: Mine Shaft," *The New Yorker*, August 19 and 26, 2002, 58.
- [16] 来自美国劳动部、矿业安全与健康委员会的历史记录, 及矿业安全与健康法律的历史, 见 www.msha.gov/mshainfo/mshainf2.htm.
- [17] 迈恩访谈, 也见 AFL-CIO,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FY 2004 Budget," available at www.aflcio.org/issuespolitics/bush-

watch.

- [18] WTAE-TV's Paul Van Osdol Reports, "Team 4: Senate Has Mining Safety Concerns," July 26, 2002, available at www.thepittsburghchannel.com/news. Main recently confirmed this observation to us in an interview.
- [19] Don Hopey, "Lawmakers Urge Fisher to Convene a Grand Jury Probe of Quecreek Mine Accident," *Pittsburgh Post-Gazette*, August 3, 2002, available at www.post-gazette.com/local-news.
- [20] According to th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There He Goes Again: Bush Budget Bashes the Environment," available at www.nrdc.org/legislation/abudget04.
- [21] Paul Krugman, "Business as Usual,"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2, 2002.
- [22] He stated this to CNN, as reported on January 19, 2001. See [editions.cnn.com/2001/US/01/19/power.woes.01/index.htm/# 1](http://editions.cnn.com/2001/US/01/19/power.woes.01/index.htm/#1).
- [23] As cited in Public Citizen, "Blind Faith: How Deregulation and Enron's Influence over Government Looted Billions from Americans,"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001, available at www.citizen.org/documents/Blind_Faith.pdf.
- [24] 以下论述主要基于 Public Citizen, "Blind Faith," including quoted passages, 12 (Blair and English), 19 ("light of day"). 也见 Kenneth Bredemeier, "Memo Warned of Enron's Calif. Strategy: West Coast Senators Complain About Market Manipulation During Power Crisis,"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6, 2002, A4; Ellen Nakashima, "Army Secretary Defends Support from Enron,"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5, 2002, A2; Mike Allen and Dan Morgan, "White House-Enron Ties Detailed,"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4, 2002; Bethany McLean, "Monster Mess," *Fortune*, February 4, 2002, and "Why Enron Went Bust," *Fortune*, December 24, 2001; Andrew Wheat, "System Failure: Deregulation, Political Corruption, Corporate Fraud and the Enron Debacle," *Multinational Monitor*, 23, nos.1 and 2 (January-February, 2002), available at multinationalmonitor.org/mm2002/02jan-feb02_economics.html.

- [25] Public Citizen, "Blind Faith," 12 ("dangerous" and "irresponsible").
- [26] *Ibid.*, 19 ("survive").
- [27] 安尼·韦克斯勒与尼斯卡宁访谈。
- [28] 韦克斯勒访谈("awareness")。Business Round Table, "History of the Business Round Table," available at www.brt.org ("pluralistic," "intrusion").
- [29] *Bellotti v. First National Bank of Boston*, 435 U.S.765.
- [30] Aristotle, *Politics*, Book 2 (Oxford: Oxford World Classics, 1998).
- [31] 韦克斯勒访谈。
- [32] The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Top Contributors: Coal Mining," available at www.opensecrets.org/industries/contrib.asp?Ind=E1210.

- [33] Cat Lazaroff, "USA: Energy Task Force Documents Show Industry Influence," May 22, 2002, available at www.corpwatch.org/news/PND.jsp?articleid=2613.
- [34] Richard Oppel, Jr., "Documents Show Parties Often Mix Fund-Raising and Policy,"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7, 2002.
- [35] 见 Dan Morgan, "Homeland Bill Rider Aids Drugmakers; Measure Would Block Suits over Vaccines; FBI Powers Also Would Grow,"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5, 2002, A07; Jonathan Weisman, "A Homeland Security Whodunit; In Massive Bill, Someone Buried a Clause to Benefit Drug Maker Eli Lilly,"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8, 2002, A45.
- [36] 尼斯卡宁访谈。
- [37] 乔尔·巴达拉科与罗伯特·蒙克斯访谈。也见 Stanley Deetz, *Democracy in an Age of Corporate Coloniz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D. Vogel, *Kindred Strangers: The Uneasy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Business i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William Greider, *Who Will Tell the People: The Betrayal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3)。
- [38] 韦克斯勒与科明萨拉夫斯基访谈。
- [39] 麦金内尔访谈。
- [40] 韦克斯勒访谈。

[41] 麦金内尔访谈。

[42] 麦金内尔、道格拉斯·平卡姆和吉姆·格雷访谈。Speech by John Browne, "The Century of Choice," Institute of Petroleum, London, February 16, 1999.

5. 公司无限

[1] 卡尔顿·布朗访谈。

[2] Adolf A. Berle and Gardiner C. 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8), 14–17.

[3] 弗里德曼、尼斯卡宁和迈克尔·沃克访谈。

[4] 迈克尔·莫访谈。也见 Maude Barlow and Heather Jane Robertson, *Class Warfare: The Assault on Canada's Schools* (Toronto: Key Porter Books, 1994).

[5] 迈克尔·莫与弗里德曼访谈。

[6] 本诺·施密特与迈克尔·莫访谈。

[7] Michael Scherer, "Schools: Some of Bush's Largest Donors Stand to Profit from Privatizing Public Education," March 5, 2001, available at www.motherjones.com/web_exclusives/special_reports/mojo_400/schools.html (under Web Exclusives).

[8] Gary Miron and Brooks Applegate, *An Evaluation of Student Achievement in Edison Schools Opened in 1995 and 1996* (Kalamazoo, Mich.: Evaluation Center,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December 2001), as cited in Gerald Bracey, "The Market in Theory Meets the Market in Practice: The Case of Edison Schools,"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Unit, College of Educatio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February 2002.

- [9] Wyatt Edward, "Challenge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Profit for Edison,"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 2001, cited in Bracey, "The Market in Theory."
- [10] Doug Sanders, "For-Profit US Schools Sell Off Their Textbooks," *The Globe and Mail* (Toronto), October 30, 2002, A1.
- [11] 杰弗里·弗洛姆访谈。
- [12] 弗里德曼访谈。
- [13] 更多事例见 Karen Bakker, David Cameron, and Adele Hurley, "Don't Tap into the Private Sector," *The Globe and Mail* (Toronto), February 6, 2003, A17; Linda McQuaig, *All You Can Eat: Greed, Lust and the New Capitalism* (Toronto: Penguin Books, 2001); Elliott D. Sclar, *You Don't Always Get What You Pay For: The Economics of Privatiza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W. Singer, *Corporate Warriors: The Rise of the Privatized Military Indust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Gerald W. Bracey, *The War Against America's Public Schools: Privatizing Schools, Commercializing Education* (Boston: Pearson Allyn & Bacon, 2001), and *What You Should Know About the War Against America's Public Schools*



(Boston: Allyn & Bacon, 2002), Brenda Cossman and Judy Fudge, eds. *Privatization, Law, and the Challenge to Feminis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2), Martha Minnow, *Partners, Not Rivals: Privatization and the Public Good* (Boston: Beacon Press, 2002).

[14] 拉菲访谈。

[15] 鲁西·休斯访谈。

[16] Ibid.

[17] Ibid.

[18] Ibid.

[19] Kia News Release, "Kia Partners with The Lord of the Rings: New Line Entertainment Taps Kia as Exclusive Automotive Partner," June 4, 2002, available at www.kia.com/060402.shtml.

[20] T.L. Stanley, "Kiddie Cars," *Brandweek* 36 (October 23, 1995).

[21] "Profile-Kid You Not: Discussion with Julie Halpin," available at www.reveries.com/reverb/kids_marketing/halpin.

[22] 鲁西·休斯访谈。

[23] Official Policy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February 1995, available at www.aap.org/policy/00656.html.

[24] Elliot Ettenberg, quoted in Ontario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Federation, "Commercialization in Our Schools," (2001), available at www.osstf.on.ca.

- [25] 鲁西·休斯与拉菲访谈。
- [26] As cited in John P.Murray Kansas, "Children and Television Violence,"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4 (1995): 7-14.
- [27] 苏珊·琳博士访谈。
- [28] Ibid.
- [29] 引自 Nic Rowan, "TV Junk Food Ads Spur Kids' Obesity-Group," *Reuters Health*, August 6, 2002, available at www.reutershealth.com.
- [30] Editorial, "Selling to—and Selling Out—Children," *The Lancet* 360, September 28, 2002, 959.
- [31] Sonya Schroeder of the Geppetto Group, "Discussions—What Makes a Brand 'Cool' for Kids?," available at www.reveries.com/reverb/revolver/geppetto.
- [32] Statement to my research assistant, Dawn Brett, May 2003.
- [33] 引自 John Heinzl, "Health Group Aims to Fry Kids' Junk Food Ads," *Globe and Mail* (Toronto), January 24, 2003, B7.
- [34] 克里斯·胡珀访谈。
- [35] 斯蒂夫·克莱因访谈。
- [36] Ibid.
- [37] 斯蒂夫·克莱因与苏珊·琳博士访谈。
- [38] 总见 Alex Molnar and Joseph A.Reaves, *Buy Me! Buy Me!; The Fourth Annual Report on Trends in Schoolhouse Commercialism: Year 2000—2001*,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 Laboratory,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2002, Maude Barlow and Jane-Robertson, *Class Warfare, Consumers Union, Captive*



Kids: A Report on Commercial Pressures on Kids at School
(Yonkers, N.Y.: Consumer Education Services, 1995).

- [39] 引自 Barlow and Jane-Robertson, *Class Warfare*, 84.
- [40] Cited in David Shenk, "Tomorrow's Classroom Today," *Spy Magazine*, July-August, 1994, 22. I cite these examples in Joel Bakan, "Beyond Censorship: An Essay on Free Speech and Law," in *Interpreting Censorship in Canada*, ed. Klaus Petersen and Allan C. Hutchins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86.
- [41] This is a modified version of a paragraph from Joel Bakan, "Beyond Censorship." The study mentioned is Bradley S. Greenberg and Jeffrey E. Brend, "Television News and Advertising in Schools: The 'Channel One' Controvers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43 (1993): 143-151.
- [42] This is a modified version of a paragraph from Joel Bakan, "Beyond Censorship." Both quotes were originally cited in David Shrek, "Tomorrow's Classroom Today," 22.
- [43] This paragraph is a modified version of one that appears in Joel Bakan, "Beyond Censorship."
- [44] Jeffrey Hopkins, "Excavating Toronto's Underground Streets: In Search of Equitable Rights, Rules and Revenue," in *City Lives and City Forms*, ed. John Caulfield and Linda Peak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6), 63.
- [45] This paragraph is a modified version of one that appears in Joel Bakan, "Beyond Censorship."

[46] Hopkins, "Excavating Toronto's Underground Streets."

[47] 见 citylitesusa.com.

[48] Hopkins, "Excavating Toronto's Underground Streets," 70—71.

[49] 见 Joel Bakan, "Beyond Censorship," and Joel Bakan, *Just Words*.

[50] 乔纳森·雷斯勒访谈。

[51] Ibid.

[52] Ibid.

[53] 迈克尔·莫访谈。

[54] 乔姆斯基访谈。

[55] Ibid.

[56] 马克·金维尔访谈。

[57] Ibid.

[58] Ibid.

[59] Ibid.

[60] Ibid.

[61] Ibid.

[62] Ibid.

[63] Molnar and Reaves, *Buy Me ! Buy Me !*

6. 估算未来

[1] Special Report: "Global Capitalism—Can It Be Made to Work



Better?," *Business Week*, November 6, 2000, 74-75.

- [2] 艾拉·杰克逊访谈。
- [3] 乔尔·巴达拉科访谈。
- [4] Kunal Basu, Henry Mintzberg, and Robert Simons, "Memo to: CEOs," reprinted in *Fast Company* 59 (June 2002): 117.
- [5] 艾拉·杰克逊访谈。
- [6] 科明萨拉夫斯基与麦金内尔访谈。Speeches by Sir John Browne, "The Case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monster"); "Century of Choice" ("win back"), available at www.bp.com.
- [7] Robert Monks, *The Emperor's Nightingale: Restor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Corporation in the Age of Shareholder Activism* (New York: Perseus Publishing, 1998), 183-184.
- [8] Monks, *The Emperor's Nightingale*, 163 ("same"), 171 ("safe").
- [9] 罗伯特·蒙克斯访谈。("effective").
- [10] 伊莱恩·伯纳德访谈。
- [11] 艾拉·杰克逊、克纳汉与斯帕访谈。
- [12] 罗伯特·蒙克斯访谈。
- [13] 德博拉·斯帕访谈。
- [14] 查尔斯·克纳汉访谈。
- [15] 西蒙·比尔尼斯访谈。
- [16] *Louis K. Liggett Co. et al. v. Lee, Comptroller et al.*, 288 US 517 (1933) 567, 548 ("evils").
- [17] 弗里德曼访谈。
- [18] 引自 Editorial, *The Sunday Herald* (Scotland), August

26, 2001.

[19] 娜奥米·克莱因访谈。

[20] 乔姆斯基访谈。

[21] Ibid.

[22] Da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slaw.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 (Touchstone/Simon & Schuster, 1998), 417.

[23] Morton J. Horwitz, "Santa Clara Revisi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Theory," in *Corporations and Society: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ed. Warren Samuels and Arthur Miller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7), 51.

[24] Note, *Columbia Law Review* 35 (1935): 1090, 1091-1092, as cited in Sunstein, *The Partial Constitution*, 52-53.

[25] Robert Hal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 8 (1922): 638, as cited in Sunstein, *The Partial Constitution*, 51.

[26] 引自 Sunstein, *The Partial Constitution*, 58.

[27] 史密斯·温莎与理查德·吉森伯格访谈。

[28] 见 Geov Parrish, "Killing Corporations," *Seattle Weekly*, July 15-21, 1999.

[29] 引自 Russell Mokhiber, "The Death Penalty for Corporations Comes of Age," *Business Ethics* 12, November - December 1998, available at www.corpwatch.org/issues/PID.jsp?articleid=1810.

[30] 理查德·吉森伯格访谈。

[31] Ibid.

[32] Cray, "Chartering a New Course."

[33] 范达娜·席瓦与乔尔·巴达拉科访谈。

[34] Title 39, U.S.Code, as adopted in the Postal Reorganization Act.

[35] 奥斯卡·奥里维拉访谈。

[36] Ibid.

[37] Ibid.

[38] 马克·金维尔访谈。

[39] 侯美婉与范达娜·席瓦访谈。

部分参考文献

- Aharoni, Yair. *The Evolution and Management of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Melrose, Mass; Bal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 Archer, Jules. *The Plot to Seize the White House*. New York; Hawthorn Books, 1973.
- Bagdikian, Ben H. *The Media Monopoly*, 6th ed. Boston; Beacon Press, 2000.
- Bakan, Joel. "Beyond Censorship: An Essay on Free Speech and Law." In *Interpreting Censorship in Canada*, eds. Klaus Petersen and Allan C. Hutchins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 Bakan, Joel. *Just Words: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Social Wrong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7.
- Bakan, Joel.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PEC Affair." In *Pepper in Our Eyes: the APEC Affair*, ed. Wes Pue.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0.
- Balaný, Belén, Ann Doherty, Olivier Hoedeman, Adam Ma'anit, and Erik Wesseliuss. *Europe Inc.: Regional and 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Rise of Corporate Power*. London; Pluto Press, 2000.
- Barlow, Maude, Tony Clarke. *Blue Gold: The Fight to Stop the Corporate Theft of the World's Water*. New York; New Press, 2003.
- Barlow, Maude, and Heather Jane-Robertson. *Class Warfare: The Assault on Canada's Schools*. Toronto; Key Porter Books, 1994.
- Basu, Kunal, Henry Mintzberg, and Robert Simons. "Memo to: CEOs." Reprinted in *Fast Company* 59, April 2002, 117.
- Beatty, Jack, ed. *Colossus: How the Corporation Changed America*. New York;



- Broadway Books, 2002.
- Berle, Adolf A., and Means, Gardiner C.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8.
- Black, Edwin. *IBM and the Holocaust: The Strategic Alliance Between Nazi Germany and America's Most Powerful Corporation*.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2001.
- Blair, Margaret. *Ownership and Control: Rethink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5.
- Blair, Margaret M., and Lyan A. Stout. "Trust, Trustworthiness, and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Corporate Law."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49 (2001), 1735–1810.
- Blumberg, Philip. *The Multinational Challenge to Corporation Law: The Search for a New Corporate Person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Bonier, David. *Public Assets, Private Profits: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Commons in an Age of Market Enclosure*. Washington, D.C.: New America Foundation, 2001.
- Bonsignore, J. *Law and Multinationals: An Introduction to Law and Political Econom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4.
- Bowman, Scott.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Law, Power and Ideology*.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Bracey, Gerald. "The Market in Theory Meets the Market in Practice: The Case of Edison Schools."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Unit, College of Educatio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February 2002.
- Bracey, Gerald W. *The War Against America's Public Schools: Privatizing Schools, Commercializing Education*. Boston: Allyn & Bacon, 2001.

- Bracey, Gerald W. *What You Should Know About the War Against America's Public Schools*. Boston: Allyn & Bacon, 2002.
- Brummer, James J.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Legitimacy: An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1.
- Cadman, John W. *The Corporation in New Jerse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 Carswell, John. *The South Sea Bubble*. London: Cresset Press, 1960.
- Cassels, Jamie. *The Uncertain Promise of Law: Lessons from Bhopal*. Toront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3.
- Chandler, Alfred D., Jr., ed. *The Railroads: The Nation's First Big Busines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5.
- Chappell, Tom. *The Soul of a Business: Managing for Profit and the Common Good*.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3.
- Clarkson, M.B., ed. *The Corporation and Its Stakeholders: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8.
- Clawson, Marion. *New Deal Planning: The 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 Colclough, Christopher, and James Manor, eds. *States or Markets?: Neoliberalism and the Development Policy Deb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Colvin, E. "Corporate Personality and Criminal Liability," *Criminal Law Forum* 6 (1995), 1-44.
- Cossman, Brenda, and Judy Fudge, eds. *Privatization, Law, and the Challenge to Feminis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2.
- Court, Jamie. *Corporatesteering: How Corporate Power Steals Your Personal Freedom... And What You Can Do About It*. New York: Tarcher/Putnam, 2003.

- Crawford, Margaret. "The World in a Shopping Mall." In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ed. Michael Sorkin. New York: Noonday Press, 1992.
- Cray, Charlie. "Chartering a New Course: Revoking Corporation's Right to Exist," *Multinational Monitor* 23, nos. 10 and 11, October-November 2002.
- Crespi, Gregory Scott. "Rethinking Corporate Fiduciary Duties: The Inefficiency of the Shareholder Primacy Norm." *Southern Methodist Law Review* 55 (2002), 141-155.
- Crooks, H. *Giants of Garbage: The Rise of the Global Waste Industry and the Politics of Pollution Control*. Toronto: Lorimer, 1993.
- Curio, E., and Strudler, A. "Cognitive Pathology and Moral Judgement in Managers."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7 (October 1997), 4.
- Damm, Kenneth W. *The GATT: Law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ganiz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 Davis, Mike. "Fortress Los Angel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Urban Space." In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ed. Michael Sorkin. New York: Noonday Press, 1992.
- Deetz, Stanley. *Democracy in an Age of Corporate Colonization: Developments in Communic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 Derber, Charles. *Corporation Nation: How Corporations Are Taking over Our Live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New York: Griffin Trade, 2000.
- Derber, Charles. *People Before Profit: The New Globalization in an Age of Terror, Big Money and Economic Crisi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2.
- Dobbin, Murray. *The Myth of the Good Corporate Citizen: Democracy Under the Rule of Big Business*. Toronto: Stoddart, 1998.
- Dodd, Edwin Merrick. *American Business Corporations Until 186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 Dodd, Edwin Merrick. "For Whom Are Corporate Managers Trustees?" *Harvard Law Review* 45 (1932).
- Downs, Alan. *Beyond the Looking Glass: Overcoming the Seductive Culture of Corporate Narcissism*. New York: Amacom, 1997.
- Drucker, Peter F. *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 New York: John Day, 1946.
- Drucker, Peter F. *The New Society; The Anatomy of the Industrial Order*.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0.
- Easterbrook, F., and D.Fischel. "Limited Liability and the Corpor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52 (1985).
- Easterbrook, Frank H., and Daniel R.Fischel. "Antitrust Suits by Targets of Tender Offers." *Michigan Law Review* 80 (1982), 1177.
- Enr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nual Report," Houston, 2000.
- Estes, Ralph. *Tyranny of the Bottom Line: Why Corporations Make Good People Do Bad Things*.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1996.
- Everling, Clark. *Social Economy: The Logic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1997.
- Feigenbaum, Harvey. *Shrinking the State; The Political Underpinnings of Privatization*.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vember, 1998.
- Fones-Wolf, Elizabeth A. *The Selling of Free Enterprise: The Business Assault on Labor and Liberalism 1945-196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 Fort, T. L. "Corporate Constituency Statutes: A Dialectical Interpretation." *fifteen Journal of Law and Commerce* 257 (1995).
- Fox, D.R. "The Law Says Corporations Are Persons, But Psychology Knows Better." *Behavioural Sciences and the Law* 14 (Summer 1996), 339.
- Frank, Thomas. *One Market Under God; Extreme Capitalism, Market Populism, and the End of Economic Democracy*.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1.



Friedman, Milto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Friedman, Milto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13, 1979.

Friedman, Thomas L.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0.

Friedrichs, David. *Trusted Criminals: White Collar Crim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6.

Fudge, J., and H.J. Glasbeek. "A Challenge to the Inevitability of Globalization: Repositioning the State as the Terrain of Contest." In *Global Justice, Global Democracy*, ed. Jay Drydyk and Peter Penz. Winnipeg: Society for Socialist Studies/Fernwood, 1997.

Galambos, Louis. *The Public Image of Big Business in America, 1880-194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8.

Galbraith, John Kenneth. *Amer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2.

Galbraith, J.K. *The Socially Concerned Toda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8.

Giddens, Anthony. *Runaway World: How Globalization Is Reshaping Our Lives*. London: Profile Books, 1999.

Giddens, Anthony, and Will Hutton, eds. *On the Edge: Living with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0.

Glasbeek, H.J.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ovement: The Latest in Maginot Lines to Save Capitalism." *Dalhousie Law Journal* 11 (1988).

Glasbeek, Harry. *Wealth by Stealth: Corporate Crime, Corporate Law, and the*

- Perversion of Democracy*.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2002.
- Glasbeek, H.J. "Why Corporate Deviance Is Not Treated as Corporate Crime: The Need to Make 'Profits' a Dirty Word." *Osgoode Hall Law journal* 22 (1984).
- Goldman, Robert, and Stephen Papson. *Sign Wars: The Cluttered Landscape of Advertising*.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6.
- Gray, John. *False Dawn: The Delusion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Granta Books, 1998.
- Gray, Rob. *Accounting for the Environment*. Princeton, N.J.: Markus Wiener Publishing, 1993.
- Greenwood, D. "Fictional Shareholders; For Whom Are Corporate Managers Trustees?"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69 (1996).
- Greider, William. *One World, Ready or Not: 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 Greider, William. *Who Will Tell the People: The Betrayal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 Hadden, Tom. *Company Law and Capitalism*.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7.
-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Hawkins, Mary F. *Unshielded: The Human Cost of the Dalkon Shiel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7.
- Hawkins, Paul. *The Ecology of Commerc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3.
- Heilbroner, Robert. *Twenty-first 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 Norton, 1992.
- Herman, Edward. *Corporate Control, Corporate Power*.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Herman, Edward S.,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and Toronto: Pantheon Books/Random House, 1988.
- Hertz, Noreena. *Silent Takeover: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Death of Democracy*. New York: Free Press, 2002.
- Hicks, A. "Corporate Form: Questioning the Unsung Hero." *Journal of Business Law* (1997), 306.
- Hinkley, Robert. "How Corporate Law Inhibits Social Responsibility." *Business Ethics*, January-February 2002.
- Hirst, P., and G. Thompson. *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Governance*.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6.
- Horwitz, Morton J. "Santa Clara Revisi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Theory." In *Corporations and Society: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eds. Warren Samuels and Arthur Miller.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7.
- Horwitz, Morton J.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1780–186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Hunt, B.C.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in England, 1800–186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 Hurst, J.W. *The Legitimacy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in the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0–1970*.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70.
- Ireland, Paddy. "Capitalism Without the Capitalist: the Joint Stock Company Shar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Doctrine of Separate Corporate Personality."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17 (1996), 63.
- Ireland, P. "Corporate Governance, Stakeholding and the Company: Toward a Less Degenerate Capitalism?"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23 (1996).
- Ireland, P., I. Grigg-Spall, and D. Kelly. "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Company Law."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14 (1987), 149.

- Irwin, Douglas A. *Against the Tid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Free Trad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Jones, Barry J.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State*. Manchester, 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 Karliner, Joshua. *The Corporate Planet: Ec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97.
- Kayden, Jerold S.,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Municipal Art Society of New York. *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 The New York City Experienc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00.
- Kelly, Marjorie. *The Divine Right of Capital: Dethroning the Corporate Aristocracy*.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2001.
- Keynes, John Maynard.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In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9: *Essays in Persuasion*. London: Macmillan, 1972.
- Keynes, John Maynard.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36.
- Kingwell, Mark. *The World We Want: Virtue, Vice, and the Good Citizen*. Toronto: Viking, 2000.
- Klein, Naomi. *No Logo: Taking Aim at the Brand Bullies*. Toronto: Knopf Canada, 2000.
- Korten, David C. *The Post-Corporate World: Life After Capitalism*.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2000.
- Korten, David C. *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 2nd ed.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2001.
- Krugman, Paul. *The Accidental Theorist and Other Dispatches from the Dismal Science*. New York: Norton, 1998.



- Kuttner, Robert. *Everything for Sale: The Virtues and Limits of Market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 MacIntyre, Alisdair. "Utilitarianism and Cost-Benefit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Relevance of Moral Philosophy to Bureaucratic Theory." In *Values in the Electric Power Industry*, ed. Kenneth Sayre.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7.
- Maitra, Priyash. *The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ism in Third World Countries*.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6.
- Mander, J. "The Myth of the Corporate Conscience." *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 81 (Spring 1992), 56.
- Mander, Jerry, and Edward Goldsmith, eds. *The Case Against the Global Economy*.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96.
- Manning, Peter K., and Brian Forst. *The Privatization of Policing: Two Views*.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Marchand, Roland. *Creating the Corporate Soul: The Rise of Public Relations and Corporate Imagery in American Big Busines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Mark, Gregory A. "The Personification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in American Law."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54 (1987), 1441-1483.
- McQuaid, Kim, "Young, Swope and General Electric's 'New Capitalism': A Study in Corporate Liberalism, 1920-1933."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36 (1977), 323.
- McQuaig, Linda. *The Cult of Impotence: Selling the Myth of Powerlessness in the Global Economy*. Toronto: Viking, 1998.
- Meiksins Wood, Ellen. *Empire of Capital*. New York: Verso, 2003.
- Minda, G. "Democratic Pluralism in the Era of Downsizing." *California Western*

- Law Review* 33 (Spring 1997) , 179.
- Minow, Martha. *Partners, Not Rivals; Privatization and the Public Good*. Boston; Beacon Press, 2002.
- Mintz, Morton, and Jerry Cohen. *America, Inc.; Who Owns and Operates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Dial Press, 1971.
- Mitchell, Lawrence E. "Cooperation and Constraint in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Corporate Morality." *Texas Law Review* 73, (1995), 477-537.
- Mitchell, Lawrence E. *Corporate Irresponsibility; America's Newest Expor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Mitchell, Neil J. *The Conspicuous Corporation; Business, Public Policy, and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 Mokhiber, Russell. "The Death Penalty for Corporations Comes of Age." *Business Ethics*, November 1, 1998.
- Mokhiber, Russell, and Robert Weissman. *Corporate Predators; The Hunt for Mega-Profits and the Attack on Democracy*. Monroe, Maine; Common Courage Press, 1999.
- Molnar, Alex, and Joseph A.Reaves. "Buy Me! Buy Me!; The Fourth Annual Report on Trends in Schoolhouse Commercialism; Year 2000-2001." Education Policy Studies Laboratory,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 Monks, Robert. *The Emperor's Nightingale; Restor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Corporation in the Age of Shareholder Activism*.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98.
- Moore, Michael. *Downsize This! Random Threats from an Unarmed American*.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96.
- Moore, Michael. *Stupid White Men. . . and Other Sorry Excuses for the State of the*



- Nation!* New York: ReganBooks, 2002.
- Muller, Jerry Z. *Adam Smith in His Time and Ours: Designing the Decent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 Murray, Andrew. *Off the Rails: Britain's Great Railway Crisis*. London: Verso Books, 2001.
- Nader, Ralph. *Cutting Corporate Welfare*.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0.
- Nader, Ralph. *Crashing the Party: How to Tell the Truth and Still Run for President*.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2002.
- Neufeld, Rodney, Allison Campbell, and Andrew Coyle, eds. *Capitalist Punishment: Prison Privatization and Human Rights*. Atlanta: Clarity Press, 2003.
- Ohmae, Kenichi.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 Palast, Greg. *The Best Democracy Money Can Buy: An Investigative Reporter Exposes the Truth About Globalization, Corporate Cons, and High Finance Fraudsters*. London: Pluto Press, 2002.
- Palmer, Bryan D. *Capitalism Comes to the Backcountry: The Goodyear Invasion of Napanee*. Toronto: Between the Lines, 1994.
- Pearce, Frank, and Laureen Snider. "Regulating Capitalism". In *Corporate Crime: Contemporary Debates*, ed.F.Pearce and L.Snider.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5.
- Pearce, Frank, and S.Tombs. *Toxic Capitalism: Corporate Crime and the Chemical Industry*. Toronto: Canadian Scholars' Press, 1999.
- Pickering, Murray A. "Company as a Separate Legal Entity." *Modern Law Review* 31 (1968).
- Public Citizen. "Blind Faith: How Deregulation and Enron's Influence over Government Looted Billions from Americans."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001.

- Ramanadam, V.V., ed. *Privatization and Equity*. London: Routledge, 1995.
- Reason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Privatization 2002: Putting the Pieces Together, 16th Annual Report on Privatization*. Los Angeles: Reason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2002.
- Rebick, Judy. *Imagine Democracy*. Toronto: Stoddart, 2000.
- Rifkin, Jeremy. *The Age of Access: The New Culture of Hypercapitalism Where All of Life Is a Paid-for Experience*. New York: Tarcher/Putnam, 2000.
- Rodengen, Jeffrey L. *The Legend of Goodyear: The First 100 Years*. Fort Lauderdale, Fla.: Write Stuff Syndicate, 1997.
- Rodrik, Dani. *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 Romano, Roberta, ed., *Foundations of Corporate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Rosenberg, Hilary. *A Traitor to His Class: Robert A. G. Monks and the Battle to Change Corporate America*.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99.
- Rosoff, S.M., H.N.Pontell, and R.Tillman. *Profit Without Honor: White Collar Crime and the Looting of America*.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8.
- Ross, Andrew, ed. *No Sweat: Fashion, Free Trade and the Rights of Garment Workers*. New York: Verso, 1997.
- Roy, William G. *Socializing Capital: The Rise of the Large Industrial Corporations i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Sassen, Saskia.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Essays on the New Mobility of People and Money*.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 Sassen, Saskia. *Losing Control?: Sovereign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 Savan, Leslie. *The Sponsored Life: Ads, TV, and American Culture*. Philadel-



- 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Schiller, Herbert. *Culture Inc.: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Schlesinger, Arthur M., Jr. *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8.
- Schlosser, Eric. *Fast Food N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1.
- Sclar, Elliott D. *You Don't Always Get What You Pay For: The Economics of Privatiza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 Scott, Walter. *The Waverley Novels: The Bethrothed*, vol. 19. Philadelphia: John Morris & Co, 1892.
- Seavoy, Ronald E.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Business Corporation, 1784 – 1855: Broadening the Concept of Public Service During Industrialization*.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2.
- Sennett, Richard. *The Corrosion of Character: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Work in the New Capitalism*. New York: Norton, 1998.
- Shiva, Vandana. *Water Wars: Privatization, Pollution, and Profit*. Boston: South End Press, 2002.
- Shorris, Earl, ed. *A Nation of Salesmen: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 and the Subversion of Culture*. New York: Avon Books, 1994.
- Simon, David R. *Elite Deviance*, 7th ed. Boston: Allyn & Bacon, 2001.
- Simpson, Sally S. *Corporate Crime, Law, and Social Control*.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Singer, P.W. *Corporate Warriors: The Rise of the Privatized Military Indust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 Smith, Adam. *The Wealth of Nation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94.
- Smith, D.Gordon. "The Shareholder Primacy Norm." *The Journal of Corporation*

- Law* 23 (1998) , 277.
- Smith, Toby M. *The Myth of Green Marketing: Tending Our Goats at the Edge of Apocalyps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8.
- Smith, Thomas A. "The Efficient Norm for Corporate Law: A Neo-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Fiduciary Duty." *Michigan Law Review* 98 (1999-2000) , 214-268.
- Snell, Bradford C. "American Ground Transport: A Proposal for Restructuring the Automobile, Truck, Bus and Rail Industries." Report presented to the Committee of the Judiciary, Subcommittee on Antitrust and Monopoly, United States Senate, February 26, 1974.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 Soros, George. *George Soros on Globalizatio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Books, 2002.
- Stiglitz, Joseph.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W. Norton, 2002.
- Stuart, D., "Punishing Corporate Criminals with Restraint." *Criminal Law Forum* 6 (1995) , 219.
- Suleiman, Ezra N. *Dismantling Democratic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Sunstein, Cass. *The Partial Constit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Swope, Gerard. *The Swope Plan: Details, Criticisms, Analysis*. New York: Business Bourse, 1931.
- Symposium, "Is the Good Corporation Dead?" *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 87 (Fall 1993) , 9.
- Tabb, William K. *The Amoral Elephant: Globalization and the Struggle for Social*



- Justi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1.
- Tedlow, Richard S. *Giants of Enterprise: Seven Business Innovators and the Empires They Buil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1.
- Teeple, Gary.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Social Reform: In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urora, Ont.: Garamond Press, 2000.
- Testy, Kellye Y. "Linking Progressive Corporate Law with Progressive Social Movements." *Tulane Law Review* 76 (2002), 1227-1252.
- Tonelson, Alan. *The Race to the Bottom: Why a Worldwide Worker Surplus and Uncontrolled Free Trade Are Sinking American Living Standard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2000.
- Tysbine, Alex. *Water Privatization: A Broken Promise*. Washington, D.C.: Public Citizen, 2001.
- Useem, Michael. *The Inner Circle: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Business Political Activity in the US and U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Vogel, David. *Kindred Strangers: The Uneasy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Business i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Wallach, Lori, and Michelle Sforza. *The WTO: Five Years of Reasons to Resist Corporate Globalization*.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0.
- Weaver, Paul H. *The Suicidal Corpora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8.
- Weiss, Barbara. *The Hell of the English: Bankruptcy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Lewisburg, Pa.: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 Welling, Bruce. *Corporate Law in Canada*, 2nd.ed. Toronto: Butterworths, 1991.
- Wells, Celia. *Corporations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2nd.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Wolff, M. "On the Nature of Legal Persons." *Law Quarterly Review* 54 (1938).
- Yergin, Daniel, and Joseph Stanislaw. *The Commanding Heights: The Battle for*

-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8.
- Zunz, Olivier. *Making America Corporate, 1870–192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